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作者简介



姜瑾，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1956年12月出生，江苏海门人。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从事大学英语教学26年，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出版专著两本，主编、参编教材四部。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内容涉及社会语言学的多个方面、语言与医学的交叉学科及英语语言教学。现正从事生态语言学方向的研究。

序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与社会学科的交叉领域。它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同时也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考察语言”。它最基本的出发点就在于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主张把语言放到其得以产生和运用的人类社会的广大背景中研究和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可算是一个独立、完整同时又范围广泛、边缘模糊的学科，研究方法多变，研究手段互异，研究模式具有兼涵并包的特色。社会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社会语境中活生生的语言使用现象。虽然该学科从确立至今还不到半个世纪，但其内部整合性不断增强，边缘有所扩大。它独特的学科性质及与其他学科结合形成新的交叉学科的能力不断发展并备受关注。

由于社会语言学的学科特点是应用性、本土性、时代性及广泛性，因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丰富多样，可以涉及语言的各个层面、社会的各个层次、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各个部门、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覆盖一切可能的将语言与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研究，可谓是“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性研究近年来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分别在法律语言、广告语言、诊断语言及广义的语言教学与研究等领域得到充分实现，生态语言学的部分研究方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社会语言学的延伸拓展研究。本论文集作者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对社会语言学的应用性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因而开始了连续不断的研究过程。研究肇始于对英语实际使用中普遍存在的语言变异现象，即“东非英语”的研究，随之延伸到医生语言及医患对话言语行为，外语教育与双语教学，最近从多语文化着手开始拓展到生态语言学方面的探索。

本论文集主要以三方面的论文为主题。第一大主题是对生态语言学及语言变体的研究，这一主题包括了作者在英国剑桥做访问学

者过程中对与社会语言学有极大交叉面并备受欧洲语言学界和官方关注的生态语言学的初步研究，科研成果包括对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综述，对英语通用和语言生态之间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论述，对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持续性现象的多角度分析，以及对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的多语现象中所展现的民族或种族语言认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描述了在非洲工作期间感到颇为有趣的“东非英语”这一英语变体的文化特征，陈述了网络交流语言符号的应用，以及对目前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研究中的一大亮点，即双语教育的纵横探索。第二大主题是将社会语言学与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心理学相结合形成交叉学科研究，科研成果包括与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健康传播专业的合作课题问卷调查报告，对作者本人在医院工作亲身经历以及对苏州各大医院门诊室录音从语言学角度的分析，以及二十年医学院工作中对医生语言修养问题的调查研究。通过个案分析表明：在医院诊所语境中，由于存在认知模式和知识背景方面的差异，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话语交际可能产生障碍，还可能诱发另一个社会语言学因素——权势概念的产生。论文主要分析探讨医患间的话语模式及言语行为和交流沟通最后达到解决问题之目的。第三大主题为社会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英语语言教学，其中包括英语语言教学中语言政策、规划、内容、形式、语境、交际目的等语言教学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关系，文化渗入，语言测试中语言学习者认知、结构、功能三者之间的关系，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的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的不足之处、教学策略、未来教学改革的方向以及对大学英语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方面提出的一些建议和看法。三大主题显示了对语言、社会、生态的社会语言学动态研究。

姜　瑾

2006年12月于苏州

目 录

语言生态学研究纵横谈 …… (1)
英语通用与语言生态 …… (17)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持续性 …… (27)
多语现象中的语言认同 …… (36)
"东非英语"特征之浅见 …… (48)
双语教育面面观 …… (56)
网际交流语言符号:网民的 LINGUA FRANCA? …… (68)
医生语言——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突破 …… (84)
医生语言修养之管见 …… (97)
医患晤谈中角色的冲突与和谐 …… (105)
失语症患者语言康复中社会因素的临床调查 …… (117)
医学英语术语概论 …… (126)
The Use of Maxims for Cooperation in Chinese Medical Interviews …… (141)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 Assessment study in Patients Preference for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 (154)
从"模拟国际会议"看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 …… (175)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 (183)
加强翻译教学　促进文化交流 …… (191)
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石化现象"之探讨 …… (198)
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学习动机及其相关因素的定量分析 …… (211)
迁移作用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 …… (225)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双向交流 …… (231)
论大学英语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 …… (240)

语言生态学研究纵横谈

姜 瑾

摘 要 语言生态学是语言学领域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支，是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之间的互相作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本文论述了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历史、国外语言生态研究现状、国内语言生态学研究视角以及语言生态研究发展趋势。语言生态学的建立是将语言学与社会及自然学科结合形成边缘学科或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果，是语言学理论和应用价值的不断完善，是全球化形势下人类与自然新型关系和人类语言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语言生态学的应用研究对保护语言多样化、语言持续性及和谐社会将有相当大的贡献。

关键词 语言生态学，语言和环境，互相作用，和谐社会，濒危语言

一、引言

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又称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是语言学领域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分支。英汉语言学词典将它定义为“人种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等学科领域中对语言和环境——即使用它的社团——之间的互相作用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对语言生态的关注源于人类对自然生态遭受破坏后导致生

态危机所产生的思考。语言生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的族群、社会、文化及地理环境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就好像自然界特定生物和非生物的生态。生态语言学借鉴生态学研究的原理来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当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豪根(Einar Haugen,1972)在斯坦福大学学报发表论文《语言的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论述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的概念时,他对此术语的定义是“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他认为真正的语言环境是将该语言作为交际语码或符号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自此开始,“语言生态”作为一种隐喻渐渐地为语言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者所接受。19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AILA)的学者更多地讨论了语言生态问题,并产生了另一术语: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在世界各国研究者孜孜不倦的努力下,语言生态学研究现已超出其简单的隐喻意义,渐渐衍化为一种崭新的语言生态观,将语言现象放在生态文化背景中看成一个整体的开放型生态系统,研究语言符号系统的生态性质与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强调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依存关系以及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基础理论体系与应用理论体系正在得到不断的完善。

语言生态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但从根本上来说它的主要任务有两大类:一是语言与环境的关系;二是语言多样化问题。它更着眼于语言变化发展过程中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正如豪根所说,语言生态研究覆盖了大多数语言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语言使用中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它的内涵也包括了普通人对语言发展和维持的普遍关注,它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科学,它超越了对语言的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而更多的是前瞻性(predictive)或治疗性(therapeutic)研究。该学科的建立是将语言学与社会自然学科结合形成边缘学科或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果,是语言学理论和应用价值的不断完善,是全球化形势下人类与自然新型关系和人类语言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语言生态学的应用研究将对保护语言多样化、持续性

发展和谐社会将有相当大的贡献。

二、语言生态学研究的历史

早在 1912 年萨丕尔(Edward Sapir)就进行了"语言与环境"的反思。虽然他当时没有将语言环境与生物生态环境作隐喻类比,但是他最早企图将语言学的研究超越对语言结构、发音、词义等的描述,建立语言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语言的词汇才能最清楚地反映讲话者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一种语言的整套词汇确实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所关注的观点、兴趣、职业的复合性创造,从人们随意使用的语言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征和社区文化特点"(Sapir,1912)。对于萨丕尔来说,自然环境就包括了"地理特征、气候雨量"以及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如一个地区的动物群(fauna)、植物群(flora)及矿物质资源等。更重要的是萨丕尔关注的不限于一种语言,而是多种语言之间、多种语言与文化之间、多种语言与它们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提出了语言与自然和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提出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意识到了他本人所称的"文化语法相互作用的广泛多样性",以及各个领域的"方式计算"、"实物概念"和"性别语言中不同的社会态度和语言结构"等。而时至今日,语言生态学的基本概念还是"相互作用和多样性",因此,即使萨丕尔当时没有明确提出语言生态学或生态语言学的隐喻或学科理论,但他还应该被看成语言生态研究的开拓者。

豪根在 1970 年的一次国际语言学会议上首次提出语言生态的概念,将人们对语言研究的思路引向将语言作为索引来参照的世界。他认为"语言一般只存在于使用者的大脑中,只有在语言使用者相互之间产生关系并与周围的自然社会环境相关时才起功能作用",因而部分的语言生态也属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而某个语言生态体系状况主要由学习、使用、传播该语言的人们决定。

继豪根之后,翻译学家史特纳(G. Steinei)于 1975 年又提出了语言多样化问题。"为什么全世界人类的消化道进化和功能都一样,

每一进化阶段错综复杂的过程和背景也大致，而这种既一致又各具特色的哺乳动物不使用同一种语言呢?”史特纳努力想用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概念来解答语言多样化进程之谜。自有史以来，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框架内，人类把讲着成千上万种无法相互理解的语言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语言多样化究竟有没有在世界的某些地区“妨碍人类进步”?“思维和语言表达的发展”对语言多样化赋予更好的结果还是妨碍其不断地进化?他在世界各地研究了多种语言，然而还是没能解开复杂的语言多样化之谜，最后他非常合理地解释出“翻译的存在就是因为人们讲着不同的语言”。

韩礼德(H. A. K. Halliday)在1990年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发言的论文《新的定义方式——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中论述了生长、性别和物种在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结构中的自我表现形式，并提出语言学研究不能忽视语言生态进程中的作用，提出将语言研究作为生态考察的一个组成部分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语言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新模式，而生态语言学也成为语言生态研究的另一个等同术语。

上述语言生态研究的开拓创新者的种种观点都典型地突出了生态语言学的两大主题供语言学家继续拓展，即伴随着日益加剧的濒危语言问题的语言多样化研究方向和伴随着污染、物种灭绝和环境恶化问题的语言与环境的关系研究方向，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在全世界各国不仅在语言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学术界展开，而且受到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及普通人群的重视。

三、国外语言生态研究现状

目前语言生态研究在欧美各国及日本备受学术界和官方的关注。其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奥地利语言学家，Wirtschafts大学的R. J. Alexandar，Graz大学的Alwin Fill；丹麦语言学家，Odense大学的Jørgen Chr. Bang，Jørgen Døør；美国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France C. Verhagen及日本语言学家宫冈伯人等。他们在前人对语

言生态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语言生态学理论及研究方向，进一步充实完善了生态语言学体系，使之日趋成熟。

从当前国际上对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趋势来看，下列焦点问题可以说是该学科的研究拓展。

1. 语言多样性、持续性及社会和谐

对语言多样性的重要性的认识起源于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生物多样性包含了三个层次，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而语言多样性也可以说是包含了该三个层次的类比。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巨大资源和财富。语言多样性是人类在发现世界、适应世界、发明生存技巧的过程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基本条件，起了储存器的作用。一种语言的消亡意味着它所储存的知识文化的灭绝。因而语言多样性意味着文化多样性，与非人类世界的自然多样性紧密相关。

语言持续性观点基于语言多样性和语言复苏的研究，源于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思考的隐喻。与社会经济持续性一样，语言持续性与保持整个社会的动态变化发展及社会和谐有极大的关系，因为语言持续性是人类语言系统当前模式的逐渐变革过程，这种变革的目的是避免人类在全球化形势下双语或多语使用过程中不同的文化种族抛弃自己的语言以保持语言接触中的生态动态平衡发展。各种语言相互影响，语法词汇相互借鉴，各社区文化生态得到不断延续。总之，语言多样性是语言生态形式保持健康活力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生态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语言多样性的持续能促使和谐社会的形成和维持。社会语言学先驱 J. Fishman 曾告诫道："当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的时候，世界的末日也就要来临了。我们的语言是神圣的，当它消失时，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综观历史，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和民族为语言的主导地位之争或语言的存在与消亡而进行了民族争斗、战争，甚至造成国家分裂，而当年的殖民主义者也将对语言的霸权作为控制该地区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样，一个国家的独立自主也将民族语言的

优势视为标志之一，如非洲各国在独立后确定的官方语言。因此，对语言多样化和持续性研究有助于抵制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现象，在接受外来语的同时尊重民族语言的自然地位，正确处理好本土语言和外来语之间的关系，传承世界语言的生态链，保持语言文化的生态平衡，以保证整个人类社会既动态发展又稳定和谐。

2. 保护濒危语言

生态语言领域对濒危语言的保护视点起源于社会语言学家Fishman的专著《逆向语言转换：对濒危语言支持的理论实践基础》(*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red Language*, Fishman 1991)，把那些即将消亡的语言称为"受到威胁的语言"(threatened language)，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表达方式RLS，即逆向语言转换，其意思为希望通过采用人工参与的方式改变语言不断消亡的局势，它的本质和目标在于保持语言的多样性，更注重解决问题的方法。RLS还提出了实施该工程的八个阶段，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濒危语言恢复到正常状态。1992年美国阿拉斯加大学的Krausse教授将世界现存的语言划分为垂死的、濒危的和安全的三种。"鉴于任何一种语言的消失都会构成对人类无可挽回的损失"，1993年11月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会议上将保护挽救濒危语言列为"一项极其紧迫的任务"，将其接纳为直接管理的项目，为全球对濒危语言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美国语言学家David Crystal十分强调濒危语言研究的应用性属性，甚至还提议创立一门应用保护语言学(applied preventive linguistics)，以期通过这门学科将濒危语言理论、描写以及方法等方面的成果应用于每一种具体的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拯救。著名社会语言学家J. A. Fishman所编著的论文集《濒危语言能拯救吗?》(*Can Threatened Language be saved?*)收集了世界各地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对全世界濒危语言关注和研究的成果。Andrew Dalby的专著《濒危语言：语言消亡将如何影响我们的未来》

(*Language in Danger: How Language Loss Threaten our Future*)指出了每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消亡的现实状况,论述了语言消亡与人类发展的关系、语言对于人类储存知识的重要性,以拉丁文的消亡为例探索了语言如何在人类追求自身的发展进步过程中被曾经使用并主导的社区所抛弃,分析了全球化进程中语言与民族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现状,并强调人类保持语言多样化不仅是为了语言本身,更重要的是为了人类的未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2003 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又召开了国际语言学专家的会议,对濒危语言的鉴别定下了 9 条标准,提出了保护濒危语言活动的具体建议,对各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全面展开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同世界各地对濒危的动植物保护和拯救的成果一样,语言生态中对濒危语言的保护和拯救也初见成效:曾经消失的希伯来语如今已经复活;一度濒危的爱尔兰语也正在恢复;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日本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都成立了专门基金和相应的学术研究机构,对濒危语言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一些非洲国家也开始加入保护当地濒危语言的行列。这些国家的研究资料表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政治、经济、战争、宗教、移民、文化等种种原因,先后已有一千多种人类语言从地球上消亡。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现存的六千八百多种语言到本世纪末将有 50%甚至 90%不再被使用。在人类看来,每种语言都是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口中含的文化活化石,而一种语言的消亡将导致它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和所代表的文化的丢失,从而导致全世界多姿多彩文化画面的缺损。因而,当今对濒危语言的研究、保护和拯救已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有关国家政府、语言研究机构、高校语言学教师等高度重视的课题,同时也成为生态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一个研究热点。

3. 从生物学角度理解语言生态的含义

从生物学角度理解语言生态的含义,研究语言在生态环境中的进化、作用和影响,是语言生态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在生态语言学这个研究视角上,语言学家更多的是给予对语言和语言实践的批评性

研究，对环境语篇的分析批评、语言对生态环境的作用、生态语法以及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等。

早在1970年，豪根在谈到“任何特定语言与它所处的环境的相互作用”时，就将这种关系比作特定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语言学家 L. Jenkins(2000)在他的《生物语言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语言的知识、使用和进化与环境的关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语言学家 Saliko S. Mufwere (2001)的论著《语言进化生态学》是近年来在该领域里以克里奥尔语向英语的演变发展过程为例评述语言进化的代表性著作。作者认为“如同寄生物种一样，语言在使用者个体间的交际行为中形成”。语言接触使语言特征得以竞争、选择、传递，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适应是物种变化的结果，语言接触和相互适应是进化的核心，个体习语间的接触是进化的基本因素，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是进化的接触场所。语言进化过程受语言内部生态结构和外部生态环境的影响，是一个语言特征竞争——选择的重组机制。这一进化机制适合于一切语言的变化，而语言进化体现的多样化与差异性正是不同生态因素作用的结果。

国际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于1990年在希腊塞萨罗尼基举行的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强调了语言与生物生长状况(growism)、种类特征以及物种形成之间的关系，并告诫应用语言学家切不可忽视研究对象在不断增多的环境问题中所起的作用。从那时候开始，研究者对语言在各种生态问题中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生态角度进行了话语批评和语言系统的批评。许多语言学研究者对语言系统中词汇的构成、词汇的含义变迁及语篇结构进行了微观分析，指出语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某些名词的命名可直接导致该物种的命运，如 Mühlhauster(1983)调查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语言中动植物的名称，发现由于受外来语的影响，澳洲大陆上许多有袋小动物的名称因带有“鼠”字样而使人们产生误解，将它们当成“鼠”类加以捕杀而导致这些小动物濒临灭绝。人类给事物

命名的依据往往以人类的行为准则来规定其他生命物质的属性和作用，因而很多动植物词汇及其对它们的解释以及涉及它们的物主代词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痕迹，导致人们的各种联想，从而决定物种的消亡或生存。从语法方面来看，把空气、水、石油、煤炭等物质用作不可数名词，也同样反映了人类潜意识中认为自然资源无限的观念，但从生态观来看，这些物质是不可再生资源。语言生态批评家认为语言系统应该生态地建构世界，而不应该纯粹体现以人类为中心的生物世界观。

生态语言学的语篇分析从生态学角度对语言中社会文化的生态意识及行为进行分析批评。由于语言反映人类的意识形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进程，因而语篇结构的形式选择和使用往往由人的意识形态决定，以实现对社会的某种操纵和控制。生态语言学家 R. Alexamder，A. Coatly，J. Døør，J. Bang 等对有关环境、动植物、食物以及有关环境的产生、政论和商务文本等的语篇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解释人类的生态意识如何通过语言结构的调整、词语的选择等来实现对现实的隐匿、抑制或转换实施来达到控制、操纵社会生态之目的。

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是目前许多语言生态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Luisa Maffi 编著的论文集《论生物文化多元化：知识与环境之链接》中所收集的论文从多个角度论述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化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依从和相互关联。美国和英国的人类学家、生态学家和语言学家研究了全球数百个地区的土著族群和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发现“生物多样化程度高，文化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如非洲热带雨林的雨季分布与生物多样化、文化多样化、语言多样化有密切关系；太平洋婆罗洲岛上物种丰富，居住的四十多个土著民族使用着一百多种语言，因为“生物多样化的环境能形成丰富多样的食物有利于人类生存和进化；生态多样化形成了人类种群的多样化，从而促使文化多样化和语言表达多样化”，可归纳整个生态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人类对大千世界的认

识只有依靠多种多样的语言表达，而每种语言就是一种可利用的知识库。生物环境越丰富，人类可利用的知识库就越多，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也就越强。Mühlhauster 创造的一个术语“共生境”(co-vironment)栩栩如生地囊括了生物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之间的共生关系。

四、国内语言生态学研究视角

我国国内语言生态学研究相对起步较晚，较多的是借鉴国外语言生态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但最近几年在语言学界有迅速发展的势头，出现了较高质量的应用研究型论文。范俊军(2005)可以说是语言生态研究理论在中国国内应用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成果归纳总结评述了国外生态语言学的种种理论与实践，也对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详尽透析，特别详细地罗列了我国境内部分濒危语言的使用和分布情况，提出了保护语言生态的对策与建议。

从国外学者的研究资料看，地球上生物多样化程度高的地区，也是人类族群文化和语言密集的地区。中国幅员辽阔，生物资源丰富，五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语言，而同一民族内部的方言更不计其数，语言资源极其丰富。每种语言或方言都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的记录传承，各种生物生态区就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除汉语的方言区密集繁多以外，少数民族的世居地更是我国的重要生态区也是语言生态区。而从语言生态观来看，语言多样性的衰退也会引起生物与文化生态的衰变。尽管由于国家政策的扶持和保护，我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断发展，迅速与现代化、信息化接轨并在民族团结和现代化建设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目前人们正在形成的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传统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中没有意识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语言多样性。由于目前在全球化形势下的语言大同流行趋势，评判语言能力的片面价值观都着重于对国际通用语和国内标准语使用能力的评判，使得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和汉族

各族群方言已经灭绝或正处于受侵蚀或濒危状态而很少受人关注。

2001年10月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召开了"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在民族学家、语言学家及文化语言研究者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努力之下，对濒危语言的保护已列入政府确立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范俊军博士(2005，2006)对我国濒危语言的研究颇深，在论文《关于濒危语言的几点思考》和《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中大量列举了我国境内部分濒危语言的使用和分布情况，指出我国语言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1) 少数民族语种的灭绝和濒危；(2) 由于标准语和共通语以强大优势向土著语言和传统语言的传统交际领域渗透和扩展导致的双语双方言区的语言单极化；(3) 由于各类经济移民现象导致的局部语言岛和方言岛的同化与消亡；(4) 由于强势语的直接移植造成的弱势语言的结构整合力发生衰变；(5) 由于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原因促使弱势民族和族群的母语权受到压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濒危语言的研究不是纯粹的个人学术行为，而是社会服务行为，其目标是抢救、保护、振兴和发展作为人类非物质遗产的语言。

国内还有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英语全球化与语言多样化的矛盾统一问题；语言通用与文化多元问题；对汉语语言系统的生态观的剖析；语言的自然选择规律与协同进化过程的探讨；从微观角度的对语言教育、双语教学的生态环境的分析研究；以及更多的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的保护研究专著和论文等。这些足以证明语言生态学研究已在我国各地全面展开，正成为我国语言文化研究者关注的热点、焦点和亮点。

语言生态研究将语言及环境看成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关注的重点在语言内外的生态结构，将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依存关系作为基本论点，我国国内对语言生态的研究也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范俊军博士(2005)还提出了我国保护语言生态的对策和建议，即重视并积极开展语言生态的调查与评估，加强民族和地方族群的母语教育以及语言规划规范工作，及着力保护土著民族和族群的

自然和社会生态的完整性以保证语言资源和语言活力。从生态科学看,多样化程度高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和谐性,因而同样可以推导语言文化多样化的社会更趋向于和谐稳定。语言与人类和其他生物共生存,人类必须像保护自然生态一样保护语言生态,这样也能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在我国,一方面为了发展本民族的经济并与全球文化沟通交流,必须接受国际强势语言;另一方面,在普及国内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正在努力保护蕴涵一个民族部落区域的智慧、宗教、风俗、历史及各种生物名称和人类行为的已经或即将成为弱势的语言和各种方言,保留不同民族和区域人群的语言认同归属标志,保证我国多元化文化生态的延续,维持积累了数千年的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尽可能最大限度地保持语言的多样性,促使自然多样化与人文生态多样化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同样,对语言与物种之间的关系,有学者也开始进行研究,如范俊军博士指出:《现代汉语词典》对"狼"的释意是"性残忍而贪婪……伤害人畜,对畜牧业有害……毛皮可以制衣褥",这是人的主观印象,人类中心主义的解释,极易造成该物种的消亡。目前网络上一些网友也对某些字典中对一些动植物名称的注解发动了挑战,认为过多的对这些名称的注解中放人"肉细腻鲜美"或"是珍贵的食品"的字眼也对人们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导致这些动植物消亡的原因之一,应该进行修改,注释中应多考虑对动物的保护。生态语言批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涉及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对此也开展了更广泛、更民间的探讨。

五、语言生态研究发展趋势

语言生态学的学科体系发展到目前为止也只有三十年左右的历史,然而它已具备了基本完整的基础理论和广泛的实践应用领域,成为一门"以探究语言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为中心,研究人类语言的生态性质,探讨语言运用的生态伦理,揭示语言发展的生态规律"的独立学科。更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应用性研究属性。它的主要研究课

题方向得到不断扩展，从语言与环境关系和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共存的课题，到语篇中环境问题的展现，语言系统如何揭示生态和非生态的观念及作为生态体系的语言生态系统持续性等等。语言生态学要研究的方向众多，要解决问题的任务繁重，因而，Terralingua，一家服务于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拯救濒危语言的国际性组织，在 1996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会议上提出了语言生态研究要解答和解决的问题。

(1) 生物、文化、语言的多样性是有关联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关系是什么？

(2) 在世界各地的土著和其他部落团体中，可用来证实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证据是什么？什么样的人类活动及机构设置能导致这种关系的维持或断裂？

(3) 传统生态学知识的流失和保护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4) 在这类知识的获得、积累、维护和传播、传承过程中，语言的角色是什么？语言的消亡对此有何影响？

(5) 社会经济因素在语言变化过程中的环境知识与行为变化中有什么作用？

(6) 由于不同的语言文化模式以及知识体系相互接触而产生摩擦、冲突，其认知基础是什么？

(7) 这些文化是如何影响个人及社会的选择与决策的？

(8) 怎样才能把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用最佳方式反映到有关民族生态知识文化与消亡的研究中去，并采取旨在保护生物文化多样性的宣传？

(9) 这些成果如何能够用最佳的方式传递给部落团体，以使其决策时参考？

(10) 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知识来教育公众，使得他们意识到这种全球性的对于语言文化多元性的威胁以及与濒危的生态系统的关系？

如同世界各地环境保护者千方百计拯救濒危动植物一样，语言生态研究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理论完善和实地研究的深入来动员全社会保护语言多样化资源，维护语言公平，树立词语释义的生态观，减少语言环境污染，消灭语言歧视，阻止语种消亡，保证语言功能与语言健康进化。实际上生态语言研究中拯救濒危语言的 RLS 工程已初见成效。一度消亡的希伯来语的复活、一度濒危的爱尔兰语的康复就是极好的例证。我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工作也在全面展开。总之，从学科发展看，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可从更微观处如生态语音、生态文字、生态语法、生态词汇、生态语篇、生态修辞、生态语用、生态语言规范等细微分支进行微观研究；从社会效应看，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必定对人类的进步、生态的持续、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Crystal, D. *Language Deat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Dalby, A. *Language in Danger: How Language Loss Threaten Our Future* [M]. The Penguin Press, 2002

[3] Fill, A. & Muhlhausler, *The Ecolinguistic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muum, P. (eds.). 2001

[4] Fill, A. 1998. *Ecolinguistics: State of Art* [A]. In Fill A. & Muhlhausler P. (eds.). 2001

[5] Fishman, J. A.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 [M]. Philadelphia: Mulltilingua Matters

[6] Fishman, J. A. (eds). *Can Threatened Language Saved?* [M]. Clevedon: Multilingua Matters LTD, 2001

[7] Halliday M. A. K. 1990. *New Ways of Meaning: The*

Challenge to Applied Linguistics [J].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6. Also in Fill A. & Muhlhausler, P. (eds.). 2001

[8] Haugen, E. 1972. *The Ecology of Language*[A]. In Fill, A & Muhlhausler, P. (eds.). 2001

[9] Jenkins, L. *Biolinguistics: Exploring the biology of Languag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 Maffi, L. (eds). *On Biocultural Diversity: linking language, knowledge, and the environment* [C]. Smithsonia Institution Press, 2001

[11] Mufweme, S. S.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Evolu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 Muhlhausler P. 1983. *Talking about Environmental Issues* [A]. In Fill, A & Muhlhausler, P. (eds.). 2001

[13] Sapir E. 1912.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A]. In Fill, A & Muhlhausler, P. (eds.). 2001

[14] 范俊军. 生态语言学研究评述[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4)

[15] 范俊军. 我国语言生态危机的若干问题[J]. 兰州大学学报(哲学版),2005(6)

[16] 范俊军. 关于濒危语言的几点思考[J]. 语言学研究,2006(4)

[17] 黄知常,舒解生. 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研究的新视角[J]. 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2)

[18] 李丽生. 英语的全球化与语言多样性[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1)

[19] http://www. barcelona2004. org

[20] http://www. terralingua. org

On the Researches in Ecology of Language

Jiang Jin

Abstract Ecology of language, also called ecolinguistics, is a newly-emerged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its environment in the fields of ethnolinguistic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The paper comments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research state abroad, the study range at home, and the implications and perspectives of ecolinguistic study.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theory is the resul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the constant perfection of linguistic value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 demands for the new-typ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anguages and social cultures under global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will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to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in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Ecology of language;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interaction; harmonious society; endangered language

英语通用与语言生态

姜 瑾

摘 要 英语在全世界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并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势语言引起了人们对英语通用和语言生态维持之间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英语发展到通用语言的地位的历史追溯，对英语通用对语言生态是否有影响的资料实例分析，以及对语言生态的自然选择与协同进化进程阶段的理解，论述了英语通用和语言生态之间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并阐述了在语言的自然进化过程中人为因素和各国语言政策的参与作用。

关键词 英语通用，语言生态，强势语言，自然选择，语言政策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间语言和文化的融合与渗透也在加速进行中。英语作为一种快速传播的国际化语言铺天盖地而来，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对英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发展趋势有两种看起来似乎截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语言通用；一种是多语持续。持支持语言通用观点者认为，语言通用有利于民族间交流和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需求。由于英语在全世界不断扩大传播范围，成为当今世界的强势语言，在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很多领域通用,他们觉得应该用英语来替代其他语言达到世界语言大同。而支持生态语言学的多语持续观点者认为,语言多样性是保持语言生态形式健康活力的基础,是文化生态延续的前提;担心英语的大范围延伸传播会给全世界的语言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久而久之英语会取代各种本土语言,或成为唯一的国际通用语言而使其他弱势语言加快消亡的速度,从而英语文化也将取代本土文化,因此他们极力反对并阻挠英语的传播。其实,这两种观点完全可以在一个空间内共存。世界上的通用语言和语言生态都是社会发展的需求,是自然选择和协同进化的结果。只要人类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有意识地作出相应的努力,完全可以既确立英语通用的地位又保持语言生态平衡。

二、英语作为通用语言的地位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地位主要由两大因素决定:一是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初英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二是 20 世纪中叶至今美国的经济强盛。两者对语言传播的努力都包括了物质和非物质的资源。丹麦学者 Robert Philipson 在《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一书中对当前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现象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纵观了英语语言本身的进展,并从历史、文化和现代经济等角度着手分析了英语为什么及如何发展成为今天唯一的国际强势语言的原因及途径,讨论了英语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并且还用了大量篇幅描述了英语教学对英语在全世界形成主导地位的贡献(Philipson,1997)。

在摆脱诺尔曼人的统治后,资本主义在英国得到了不断发展。到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国力强大,开始大肆对外扩张殖民,因而殖民主义文化渗入各个英殖民地,英语就担任了承载文化的重任,开始被传播到全世界各地。在当时的英殖民地国家,英语被看成是权势、贵族、财富的象征,学会并能使用英语是殖民地人们摆脱贫困、提高地位、获得主流社会认可的便捷途径之一。这样,到了 20

世纪初，英语已在全世界的英殖民地得到普遍传播，成为“日不落帝国”的语言，为将来英语发展成为全球通用语创造了先决条件。20世纪60年代，原英殖民地国家相继宣告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并不意味着文化意识的独立，更不等于语言的摒弃。由于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多方面原因，许多原英殖民地国家仍然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之一继续使用，甚至在那些国家还起着优势语言的作用，是政府部门、公安系统、学校教育、科技贸易和国际交流等主要用语。

美国的科技、经济强盛使得近几十年来英语在全球主流语言中占据榜首地位。由于在科技、教育、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贸易的不断扩大和经济的强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因特网和信息技术的全球应用，美国英语更是得到了比当年作为英殖民主义象征的英国英语更为广泛的普及。

目前，英语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是母语，是主流语言；在南非、新加坡、肯尼亚、坦桑尼亚等七十多个国家是官方语言之一；在欧洲大陆的国家，虽然英语既不是母语，也不是官方语言，但还是约定俗成地将它用作为教学语言和经贸语言；此外，包括中国、俄罗斯、以色列等一百多个国家选择了英语作为第一外语。大多数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绝大多数的科技信息用英语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所有的计算机软件源代码均是英语格式。英语已成为国际交往、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金融财务、政治外交、文化娱乐等事业全球交往的当然工作语言，它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优势主导语言。

三、英语通用对语言生态的影响

英语在全世界的传播和通用语言的地位究竟是否影响到了语言生态的平衡和语言多样性的持续？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者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丹麦语言学家菲力普森用“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来形容英语的霸主地位和不断普及。他认为英语在全球的传播主要是出于政治经济的目的，所使用的手段是利用英语教育的丰富资源，从师资、教材等向全球输出，因而削弱阻止了弱势民族语言教育，而且他还认为英语的传播有损于民族母语的学习，使其他语言边缘化且渐渐地被英语取代(Philipson，1997)。国际著名少数民族语言问题研究专家斯库特奈布·坎格里认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以牺牲民族母语教育为代价的英语全球化的教育政策扼杀了其他语言(李丽生，2005)。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克里斯特尔(Crystal，2000)在专著《语言的消亡》(*Language Death*)里以翔实的资料论述了当今全世界语言消亡的进程和事实。世界现存的语言有六千多种，超过一亿人使用的有八种，依次为汉语、西班牙语、英语、孟加拉语、印地语、葡萄牙语、俄语和日语。其他语言的使用者相对较少，不到一百人使用的语言大约有五百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1 年的报告也指出，世界上现存的六千多种语言有一半以上正处于消亡边缘。美国语言学家克劳施根据调查分析数据后得出结论，目前现存于世的六千多种语言中有 40%～75%是濒危语言。到 21 世纪末将有四千多种语言不再被人们使用(李丽生，2005)。

但是那么多语言的濒危和消亡与英语的不断扩展究竟有多大关系呢？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没有发现很多的直接证据说明英语的普及通用是语言消亡的罪魁祸首。所见的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北美大陆印第安语衰亡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唯英语教育和语言同化的结果，原有的 2 200 多种语言现在只剩下一百多种，而且现在使用的人数相当少。大不列颠土地上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凯尔特语(Celtic)也受到了英语的强势影响，使用的人越来越少，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但这些例子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产生的，诸如菲力普森所归类的核心英语国家。但是在另一些将英语作为二语的“周边英语国家”，如一些非洲国家、印度、新加坡等国家，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之一，也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用于国际贸易、科

技等领域的主要语言，但是那些国家还是在努力维持甚至挽救复苏自己的民族语言或群族母语，如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虽然受英国殖民统治多年，英语的渗透已进入社会、文化、政府、教育、生活等各个方面，然而就笔者在该地区工作两年的经历看，当地语言不但没有被英语的影响所压灭，反而比殖民时期更加受重视，有更多的实用功能。在政府部门、国民议会、警察局、医院、社区，随处可听到的更多的是斯瓦西里语，新闻媒体都用英语和斯瓦西里语两种语言，同样的报纸就有两种语言，官方语言也是这两种。为了振兴民族语言，这些国家独立后学校实行的是双语教学。在街头巷尾，英语和斯瓦西里语交织的广告比比皆是，如“Fund rising dinner party”，“Disabled Kiosk”，“Whole sellers of hardwear”，“Shekilango Nescafe”，“New Sikinde Tea”等等。在人们的日常交谈中，不时地会听到英语和斯瓦西里语的语码转换和语码混合。其实人们将英语已经看成他们的日常交流的部分语言，并非当作某种语言霸权主义的象征。在欧洲的非英语国家、以色列、日本、俄罗斯等国家，英语不属于那些国家的官方语言，但英语教育非常普及，人们对英语的掌握也相当好，但是英语永远不可能代替其母语，以色列政府竭尽全力让希伯来语复活说明了在一个独立国家，英语不可能代替一个民族的本民族语言，人们将英语作为主要外语的学习和接受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和获得高科技信息技术资源以使自己的国家更加富裕强大。

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英语的学习、英语文化知识的普及是越来越广。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掌握英语并吸收英语文化中优秀的东西，人们花相当多的时间学习英语，学校也抽出了相当大的比例的课时用于英语教学，教育管理部门还出台了有关双语教学的某些条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汉语教学似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自卑心理、实用主义、反传统思想的强力影响下，我们从社会到个人都被淹没在英语的洪流中，再加上网络的影响日渐扩大，语言仿佛拼图游戏，可以随意编改，汉语看起来似乎处在危机之中。但是人们还是在努力地保护自己的语言，汉语教

学也没有因此而放松。国人都意识到普通话是我们的通用语言而英语属于我们所需要的外语，它的主要功能是工具型的，用于我们的国际交流和科技引进输出及贸易进口出口。中国政府也会制定相应的语言政策在接受英语文化的同时来保护汉语和各民族地方语言。不管未来的社会发展如何，也无论中国有多少人学习英语或精通英语，英语永远不可能取代汉语，英语文化也不可能在中国超越中华文化。“当前在英语与汉语的‘对话’中，看起来英语似乎处于强势地位，而‘汉语’则声音微弱，这种不平等的局面有历史、经济等等众多复杂的原因，不可能在朝夕之间改变。既然我们尚无力改变目前的状况，那就要在固守母语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去学习英语，以兼容并蓄的心态来对待英语以及西方文化，加强中西方的语言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国的和平崛起为提高汉语的地位，进而打破‘英汉对话’中不平等的局面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王岩平、甄芳，2004)。很多学者认为，面对客观存在的“英语霸权”，与其批评“英语热”，不如呼吁各阶层在重视英语的同时，切实可行地重视汉语，在对内对外的汉语教学中强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传播，注重语言教学的人文精神。在强调汉语学习的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好“英语”与“汉语”学习的关系。汉语不仅包括语音、词汇、语法规则等等，还包括附着于语言之上的文学、文化、思想等等。不管是中国人学英语或其他外语，还是外国人学汉语，目的都是为了国际间在政治、文化、经济诸多方面的交流。交流应该是平等互动的。事实上，从长远来看，社会真正需要的是学贯中西、英汉兼擅的人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汉语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会越来越重要，总有一天，汉语会与英语真正处于“平等对话”的地位。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一天而付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印度独立后学习使用英语的人有增无减，但印度认为，这是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并鼓励人们学习英语和接受英语文化。该国的科技领域进步明显，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同时民族语言文化仍得到了持续进化，维持了绚丽多彩的特色，形成了多元文化下的语言持

续。由此可见,尽管英语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学习英语的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取向,虽然英语发展到今天属于自然选择的结果,但英语不可能是一意孤行地"制造殖民意识的场所",也不可能被用来"控制人们的头脑"。因为语言是由人们的理智行为所使用的,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普及对语言生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的语言政策,如果处理得当,英语完全可以和各国的语言生态协同进化。

四、自然选择与协同进化

语言的进化犹如自然界生物进化一样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存在发展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告诉人们任何生物只有经得住自然变迁、优胜劣汰的考验才能生存、发展、壮大,语言也同样如此。与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历史上曾经普及的语言相比,英语正是遵从了生物进化的自然法则才有了今天的普及地位的。

首先,由于英语民族开放的心理,英语从不排斥外来词的进入,也不阻止语言结构随着社会使用的需求向简单化的调整。由于从世界各国其他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英语的词汇量是世界现存各语言词汇库中最庞大的,也是最丰富多彩的。从英语词典的词汇构成来看,它吸收了包括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与它属同语系的词汇,也接受了从俄语、汉语、日语等不同语系的语言的词汇;濒临消亡的古拉丁语和被世人认为最难学会的希腊语在英语中还得到了一席之地,它们被润改为英语词汇的字母发音组合或与英语词汇结合派生出了大量的词汇用于生物、医学、化学及许多现代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虽然英语只有一套词汇和一套相对简单的语法条例,但它所衍生出的包括英语方言在内的英语变体(variety)不计其数,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就存在着不同的英语变体,而对这些英语变体的存在,英语从不以"不标准"或"低水平"为由横加干涉,相反英语的宽容姿态使得"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成为当今世界必不可少的而且是朝气蓬勃、多姿多彩的一种新的语言生态趋势。

其次，由于英语核心国科学技术的领先使得英语作为传播工具得到了全世界史无前例的认可，特别是在电子信息领域，英语词汇所代表的往往就是高端信息技术的成果。在社会节奏加快，社会高度民主信息化的时代，大量的英文简化缩写词在网络世界大受欢迎。当年英语的传播是由于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经济实力雄厚致使它对外扩张而实行殖民侵略的结果；而当今美国英语的更广泛传播也是由于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后来者居上，国力强盛，资本输出力度不断加大，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连续渗透，生物、医学、电子信息等领域的高端技术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有识之士为了进入这些领域而努力学习英语以掌握语言工具。近年来，英国虽不如美国科技领先，但在 20 世纪后期将英语教育领域设计成了不需要大量资本投人却可得高额获利的市场。英语核心国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领先的科学技术和良好的教育资源也被充分发掘利用，这些国家的语言变体随着他们的先进科技产品也被源源不断地渗透进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综上所述，英语发展到今天，具有世界通用语言的地位是依靠使用该语言的群体民族和他们的经济实力做强大后盾的，是“适者生存”进化理论在人类生活和语言进化中的实际科学展示，也是语言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英语在全世界的传播并不是被各个国家全盘吸收或全面接纳的，就像全球化并非人们所认为的完全美国化或西方化。英语在全世界各国被选择性地学习和接纳，在使用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发音、词汇、语法结构等的变异。语言变异是任何一种语言进化的必然途径，就像自然界的生物一样，而各个国家使用的英语变体或多或少都受到本土语的影响或渗透。“世界英语”现象表明了英语和它所携带的文化并没有一成不变地进人其他国家，而是被当地民族批判地接受，在两种语言的交互和不同文化的冲突调和中互相适应、兼容吸收，才形成了今天的“非洲英语”、“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等各种夹杂着本土文化和本土语言特征，反映了不同人种民族的情感、意向的英语变体。“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也是基于

英国英语之上的，但也有着明显的区别，语言的使用中携带的还是当地的文化特色，这使英语的使用比纯粹的英国英语更加绚丽多姿。

英语到今天成为全球强势语言和国际通用语言是语言生态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应该有的积极的科学的态度是尊重语言的自然地位，同时也要采取措施防止弱势语言和本民族语言的衰变或消亡，在接受英语的同时处理好英语与本土语的关系。每个民族必须有开放的态度，学习和掌握带有先进科技信息的强势语言，同时也要保护本民族语言，坚持本民族语言的传授和扩大本民族语言的传播，使人们的知识更加丰富，智慧愈发深广。

语言永远处于动态进化中，如同世界上任何生物形式一样，有其发展、成熟和衰败的不同进化阶段，靠的是自然选择来保护良种。目前世界各国在反对英语垄断的同时也能尊重语言的自然地位，因为目前人类的共识是学习英语并吸收优势语言中的强势成分对发展本民族经济、丰富本民族文化是必要的，也是极其有益的。语言的进化和普及是自然选择，而保持语言的生态平衡需要人类的参与，需要各国政府的努力。要鼓励民族语言和各种语言的学习，要在语言生态中做个“适者”就必须紧跟时代的前进步伐，发展本国的国力，有效地保护民族语言，调整人们意识形态中的语言价值观，使得通用语言和民族语言互补互助，相得益彰，努力保持语言文化的生态平衡。人类完全能够做到既接受通用语言，又保持语言生态。很多国家的双语和多语的持续现象就是极好的证明。

参考文献

[1] Crystal D. *Language Deat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2] Hoffman C. & Ytsma J. Trilingualism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3

[3] Philipson R. *Linguistic Imperialism*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朱风云.英语的霸主地位与语言生态[J].外语研究,2003(6)
[5] 李丽生.英语的全球化与语言的多样性[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1)
[6] 王岩平,甄芳.英语霸权时代的汉语命运讨论综述[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6)

English as Lingua Franca and Linguistic Ecology

Jiang Jin

Abstract The constant spreading of English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its status as a dominant language has lead to some different opinions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nd sustainability of linguistic ec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of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nd linguistic ecology, as well as the human involvement and language policy of world nations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natural evolution of languages through searching back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into the world lingua franca, analyzes some data to see whether English has really effected linguistic ecology and to comprehend the process in natural selection and co-evolution of linguistic ecology.

Key words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linguistic ecology; dominant language; natural selection; language policy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语言持续性

姜　瑾

摘　要　多元文化生态中的语言持续性是语言生态保持健康活力的基础，是文化生态得以延续的前提，是人类精神世界和知识经验得以传承的保证，也是和谐稳定世界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将经济持续性与语言持续性进行类比，探讨了语言持续性与语言通用性之间的矛盾统一之辩证关系，分析了多元文化生态中的语言接触现象，并用实例证明了语言持续性对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语言持续性，多元文化，语言生态，社会和谐稳定

一、引言

语言持续性(language sustainability)是近年来在生态语言学领域内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之一。"持续性"(sustainability)概念起源于对长期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经济发展而忽视所有的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最后导致的资源缺乏并明显地有害人类生活的行为和结果的批判，而语言持续概念来自于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研究者在全球化形势下的各民族多元文化相互作用(interaction)和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中对语言多样化维持的忧虑和对语言霸权主义的批评。将语言系统比作生态系统的一种隐喻，就像人类持续生存需要自然生物多样化一样，生态语言学对语言持续性的研究也是基于语言多样性(diversity)和语言复兴(revitalization)之上的。

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不断消亡灭绝一样，多种语言的共存可能会受到各种压力和不平等的威胁以致影响它们的继续存在。生态语言学对语言持续性研究的任务是捍卫各种不同的语言在同一持续性区域内共存，在多元文化平等的背景下协同进化而非相互威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持续性折射了文化生态的完整性以及人类家园的和谐性。

二、语言持续性与语言通用性

“持续性发展”观点的创造者要求人们在经济增长迅猛和区域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尊重自然、结合自然并与自然呈动态同步发展的趋向。然而，既不放弃物质经济的发展又能保证多样物种的生生不息无法用法律手段来控制，它需要的是人的价值观念的改变和道德环境的支持。即使只是为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人类的继续生存，也需要人类在改善物质生活过程中不去大肆毁坏环境，而是与大自然生态保持平衡一致。这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生存法则。当持续性观点用于语言现象时，该法则可用于同样的类比。随着全球化形势的不断扩大和发展，由于经济原因强势语言(dominant language)不断地传播，人类对语言的进化发展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有必要放弃他们的原始语言而采用发达国家或全球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以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文化。赞同者觉得只有全球交流的语言才是人们寻求发展、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重要交际手段；而另一种观点则坚持语言多样化的代代相传，认为只有永久性地维持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才能够保持独特的民族认同(identity)以避免传统的语言生态系统被分解、毁灭的命运，防止它所带来的文化传统的消亡和社会贫困，因为语言属于文化生态范畴，除了担当人类的交流工具的任务以外，它还执行了很多其他的亚系统功能任务：它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志，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每种语言的持续意味着它所承载的文化及人类智慧的传承。这两种观点初看来似乎无法调和、相互对立、互不相容。然而，黑白分明、势不两立的语

言观显然不利于语言生态的平衡进化，也不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能否将这两种对峙的语言观统一起来朝着语言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呢？生态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持续性应该是人类当前语言模式的一个逐渐变革过程，其目的是满足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双语(bilingual)和多语(multilingual)的需要而不抛弃自己的本土语言文化”(Boada,2005)。就像经济持续性发展不否定人类社会物质需求和现代化进步同时也保持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一样，语言持续性接受人际和群体间通用语言的交流沟通同时也坚持民族语言、本土语言和母语的延续，实现两种或多种语言交叉互补，将双语或多语能力和使用相结合以拓展更大的交际范围并保持和推动民族和本土语言，这是保持语言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手段之一。

多种语言现象维持和进化的道德伦理与自然环境的物种维持相似。在错综复杂的人类社会交际中，多样语言的交际功能有极大的保护价值，它不仅关系到了语言表达方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维持了一个民族的语言意味着维持了这个民族的正面自我表现意象，获得了更强的民族自尊。区域性语言能表达的物质和概念不一定能被通用语言所演绎，很有民族内涵的知识有时只能在民族语言的使用中才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芒；而学习强势语言，吸收强势文化中的有用成分，加强与外界的交流沟通，扩大视野，对于发展本民族经济、丰富本土语言是必不可少的。承认强势文化，接受通用语言，同时也尊重本土语言的自然地位才是持续性和谐社会的积极科学态度。因此，语言规划者和语言政策制定者必须创造一种平等的语言生存环境，既能容许国际通用语的流入与存在，又能保证本民族语言的生存，这样才能有利于多种语言的积极存在和持续性的动态发展。

三、文化生态中的语言接触

持续性宗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生态系统背景。维持语言持续性必须采取正确的态度和实施恰当的行为来了解区域和全球文化动态以及社会语言生态系统内的各种因素，也就是研究“语言氛

围”(linguisphere)(Boada,2005)。语言生态是基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及各因素的相互关系之上的。维持语言的持续性必须尊重语言的自然地位,正确处理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国际交流日益便捷多样的当代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人类的流动和交往早已超越了民族、国籍或人种的界限,因而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两种或多种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人类的优秀文化本来就属于人类共有,只要处理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多元文化的形成就能使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

多元文化生态中的语言持续性不仅仅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继续使用,更重要的是在同一个交互面上人类的心理、社会认知、接触和认同。语言接触是人类从古到今语言动态化进程,是指同一地区或邻近地区交往频繁的不同民族的语言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甚至相互融合的语言状况,而目前这种动态进程已经扩大到全球范围。持续性语言接触过程中对外来语理性接受的同时保持本土语的稳定进化,它可以分为横向语言接触(horizontal language contact)和纵向语言接触(vertical language contact)两种(Boada,2005)。

纵向语言接触是指该语言群体没有离开过本族疆土,而是由于历史上的政治整合而从上层结构带有官方特征的语言不影响整个语言群体的双语或三语或多语接触。这种语言接触的持续原因有多种,主要来自政治和人口两方面。历史上,某些民族在实施了武力或文化征服时,将该文化的载体——语言强加给被征服民族作为官方语言,要求当地人学会并使用该语言,并提高它的社会价值,将其作为现代物质进步的象征,也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然而人口众多、居住密集的当地民族在用官方语言与统治阶层交往的同时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语言,非洲各国的语言状况就是典型的例子。历史上,当非洲一些国家沦为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的殖民地时,强势语言随同这些国家的政治意识、文化物质一起移植到了这片土地上,但由于当地的各部落土著民族除了在和殖民统治者交流时被迫用强势语言

外，部落种族间的交流仍然保持着本土语言，因而未能造成整个语言群体放弃原住民语言而启动语言消亡进程的后果。20世纪60年代，在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后，各国采取了相应的语言政策保护扶植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在非洲大地上到处都可以看见由于该语言接触类型所造成的多语现象和多语维持。如位于西非的几内亚比绍的三语现象(trilingualism)：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奇日奥尔(Kiriol)语为民族接触语言或称为族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而原住民的部落语言有多种多样。他们的母语是原住民部落语言，这是他们生来就自然习得的种族认同语言。即使移居到城市里，来自同一部落的人群也用母语以示共同文化背景，然而该语言功能有限，主要用于家庭和传统的礼仪庆典如婚礼、葬礼、或收割庆祝等，有时当地官员为了触动民族精神或需要更多选票时也会偶然使用该语言。奇日奥尔语为第二语言，它的功能在于在不同的语境用此语言时的民族自豪感，社区及家庭内部的语言异化，它更多的是用于不同部落间的贸易往来，儿童常在幼年时就开始接触该族际通用语。葡萄牙语只能在正规学校教育中获得，该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和外国人交流。在东非，坦桑尼亚在获得独立后将英语和斯瓦希里语共同定为官方语言，同时各部落群体都有自己的方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功能，有时在一个交际场合多种语言混合使用。纵向语言接触的实例在全世界有很多。

纵向语言接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自然多语现象(natural multilingualism)。自然多语是指一个人出生于原先存在的多语环境中，如南非、印度等国家。在南非，一个幼儿出生的家庭内父亲讲一种部落语言如Xhosa，而母亲讲的是另外一种Soth，其与儿时的玩伴玩耍及与同龄人的交往时很快就学会了当地人普遍使用的交际语(language for wider communication)，上学后学校的教学语言多为英语。这种群体成员自然地意识到多语习得，本能地接受多种语言，以对它们不同程度的掌握运用于不同的场合。这是这类语言群体典型的自然多语现象，在很多国家常见(Olshtain&Amitai，2003)。

横向语言接触是指两种或多种语言直接或面对面的关系，其因

素和动机是复杂多样的，主要是经济原因。相对而言它较难保持语言的持续性。在当代世界，人们从原住地搬出以寻求更好的生存和更高质量的生活。人口数量、经济、文化、科技等都是该类语言接触中能否保持多种语言持续的先决因素。横向语言接触形成时语言政策的支持倾向，语言群体的经济地位、政治意识形态及媒体舆论导向等都可能成为语言接触中多语持续的相关因素。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也是横向语言接触最典型的国家。

横向语言接触所形成的是变迁多语现象(transitional multilingualism)。这是新的文化背景所形成的多语现象，个人和群体对多语的感知与对自然多语不一样。变迁多语来自大小群体的移民，从一个国家移居到另一个国家，抛弃了原来家乡的文化、语言和社会背景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作为暂时或永久的移民，为了生存，他们在保持自己的第一语言的能力的同时努力学会作为生存技能的一种或数种新的语言，以进入新居住国的主流社会。持多种语言的人对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情感和掌握程度。由于每人在每日的语言接触中都会感到几种不同的语言知识适用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需求，如家庭、工作、教育、职业等，当人们的生活模式相对稳定时，这种多语模式也就相对持续了下来。

无论语言接触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语言生态需要的是多元文化中的多语持续，而语言的生态平衡有助于文化生态平衡。“适者生存”的大自然生态法则也可用于语言文化生态。如印度独立后使用英语的人有增无减，因而在全球化形势下，该国的科技领域进步明显，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而本民族的各种语言和文化也得到了保护和延续，文化语言生态繁荣，形成了多元文化中的语言持续。

四、语言持续性与社会和谐稳定

经济持续性概念是试图拯救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而不是企图破坏生物圈的背景。同理，语言持续性的理念是希望人类发展自身、相互沟通而不毁坏身份认同的语言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资源。

人类学家米德·戴维斯说过:"文化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如果剥去语言和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人们所剩的就只有孤僻、绝望和愤怒了。如果你失去一种文化,你虽然不会失去现代化,但你失去的却是一整套对人类生存意义的诠释。"(朱风云,2003)历史上对语言持续性的干扰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政治经济的整合和大规模的移民。虽然说语言进化的总趋势很有可能是部分语言的消亡和语种的减少,但是人类有责任也有能力来减慢这种消亡和减少的过程,通过给予经历了不同历史的语言群体更好的自我语言评价体系来掌握人类语言持续的命运,尽可能保持语言生态平衡。

有一段圣经故事告诉人们,诺亚的后代曾试图造一座通往天堂之塔,在这座塔里所有的人都只讲同一种语言,然而上帝对他们的设计大为不满,破坏了他们相互之间交流的共同语言。这个故事形象地表达了语言多样化是圣明的旨意,因而也统治了西方人的语言观,使得人们认为语言多样化是天经地义的。张公瑾先生指出"只要世界政治是多极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世界语言就必然是多样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文化的传承工具,是整条语言生态链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人类历史上一些土著语言的消亡导致了当地传统种植知识的失传,不但导致了农作物的歉收,也剥夺了后人对该土生植物的了解,更中断了人们对当地自然环境的描述。简而言之,语言多样化的持续就是文化生态的持续,语言文化和人类相生相伴,保护语言文化生态就是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

保持语言多样性持续与保持社会持续稳定有极大的关系,也对社会和谐起很重要的作用。瑞士是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瑞士德语区是典型的等语区。该地区的人们接纳标准的德语,绝不是外国的强加或政治上弱小的结果,而是语言群体本身的自我决策,他们完全自愿地选择或摒弃,该稳定和谐地区的人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呈现着他们正面积极的个体和群体自我意象(Boada,2005)。从根本上来说,人类要保持语言持续性必须将外来文化和语言作为与本身价值观的参照,而非简单的不对称强势或取代,才能保证语言多样性

平衡的传承，从而保证和谐的语言生态持续发展。

多样性程度高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和谐性，同理，稳定而和谐的社会必然是文化多元化和语言多样化共存的社会，正如著名社会语言学家 J. Fishman 指出的那样："当所有的人都说一种语言时，世界的末日也就要来临了。我们的语言是神圣的，当它消失时，生活中美好的东西也随之而去。"多种语言的持续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是语言生态保持健康活力的基础，是文化生态得以延续的前提，是人类精神世界知识经验得以传承的保证。因而，多元文化中的语言持续性也是和谐稳定世界的重要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1] Boada A B. Linguistic sustainability and Language Ecology [A]. Language & Ecology March 2005, Http://www.terralingua.org

[2] Fishman J A. *Can threatened Language Be Saved?*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3] Hoffman C. & Ytsma J. Trilingualism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3

[4] Olshtain E. & Amitai FN. Being Trilingual: Is there a price to pay? [A], in Trilingualism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C], ed. by Hoffman, C & Ytsma J,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3

[5] 朱风云. 英语的霸主地位与语言生态[J]. 外语研究，2003(6)

Linguistic Sustainability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

Jiang Jin

Abstract Linguistic sustainability in multicultural context is the foundation of keeping a healthy and dynamic linguistic ecology, the premise for the continuation of cultural ecology, the guarantee for the impartment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the human mental world, as well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symbols for a harmonious and constant world. The paper makes an analogy between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and linguistic sustainability, discuss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uistic sustainability and language as lingua franca, analyses language contact in multicultural ecology, and proves the importance of linguistic sustainability for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Linguistic sustainability; multicultural context; linguistic ecology; harmonious society

多语现象中的语言认同

姜　瑾

摘　要　多语现象包括任何语境背景下人们交替使用几种语言或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不同的语言，它起源于各种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基于横向和纵向的语言接触，是维持人类语言持续性，保持语言生态平衡，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保证之一。语言认同是人们是在多语现象多元文化的社会内通过清晰或刻意地使用某种语言来表示民族或种族归属的身份认同。本文探索了多语现象的研究背景，分析了个体多语能力的社会心理因素，论述了个体多语现象中的语言认同特点，并深入探讨了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多语现象下语言认同的必然性和特殊性以及对此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　多语现象，语言认同，个体多语能力，语言接触

一、简述

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是指由于某种政治或社会原因，一个言语社区或个人同时使用三种或更多的语言的现象(劳允栋，2004)。从生态语言学领域看，多语现象是维持人类语言持续性，保持语言生态平衡，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保证之一；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多语现象起源于各种历史和文化的发展，基于横向和纵向的语言接触。个人或社区的多语现象可包括任何语境背景下人们交替使用几种语言或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不同的语言，从国际优势语言

到族际通用语，从一种标准语言的各种变体（variety）到各部落群体的土语方言。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能使用三种或更多种的语言表达不同的需求，同时也接受对话中的双方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的事实。

多语现象又分自然多语（natural multilingualism）和变迁多语（transitional multilingualism）。前者是指一个人出身于现存的多语环境，如家庭内部父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讲不同的语言，社会需求使他们学会一种或两种或更多通用语言，就像在南非、印度等国家，儿童通过自然语言习得练就了多种语言表达能力；而后者是群体或个人由于远离本土文化后暂时的客居或永久的移民为了生存学会其他非母语语言的结果。

语言认同（language identity）又称民族语言学身份认同（ethnolinguistic identity）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它的研究涵盖了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所研究的大范围内容，是指某个人或某言语群体通过清晰或刻意地使用某种语言来表示民族或种族归属的身份认同。讲话者所使用的语言等于告诉人们讲话者的地位、身份、民族、种族、国籍甚至根土文化（Blonmaert，2005）。在社会语言学看来，这种语言身份认同是言语社团归属感和民族种族归属感的结合。对语言认同的研究更是涉及到个人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等特性和社会包括民族、人种、文化等方面的因素。Aronin（2002）认为，"由于事实上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个人特征的定义，有必要借鉴认同概念来研究多语现象"。本文要论述的是在全球化形势下的多语现象与语言认同之间各具特色又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多语现象的研究背景

多语现象包括了个体的多种语言能力，同时也是言语团体以平等地位进行多种语言接触时的状态，结果是在社会交往中几种语码都被交替使用，因而多语现象是获得几种非本土语言的过程和结果，也是民族间相对固定的广义语言生态存在的必要条件，对多语现象

的动态研究可基于不同的角度如地理分布、社会焦点等，对多语现象和语言认同多方面的关注起源于并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一方面，虽然人们离开本土去寻求更大的发展，但是他们在异国他乡潜意识中有一种对本土身份难以割舍的情愫。随着人口的不断流动，经济移民的日益增多，因而在来自各民族的移民进行交往时，语言成了他们自我表现、身份维持、眷恋原住地文化并向人们展示出生地身份的途径之一。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外来文化的侵入和外来优势语言的不断扩展，当地民族坚持对地区性语言的维持以延续身份认同，各种语言被有多语能力者使用在不同场合，为不同的需求起不同的功能作用。这样，全世界各国的多语现象比比皆是，如在欧美各国的华人移民家庭都鼓励儿童学习中文以传承中国文化，认同民族归属，一般华人移民的孩子都会讲几种语言；在以色列的俄国移民用希伯来语或阿拉伯语作为在当地的生存语言和与当地人的族际通用语，用英语作为国际交流语言，在家庭内部和同族人之间用俄语或俄语方言；在德国由于 20 世纪中叶大量从意大利和土耳其劳动力移民的涌入，多种族和多语现象特征明显，在语言接触过程中本来单语的移民言语群体不但通过学校教育和语言习得学会了居住国的民族语言和官方语言，而且还通过与其他移民言语群体的接触不仅学会了其他语言，还形成了某种特殊的意大利—土耳其—德语这种个体多语现象（pluralingualism），用于多民族的城区街坊和第二、三代移民之间或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完成了从变迁多语到自然多语的过渡，形成了多语使用者的语言知识库，运用于不同场合的交际和语言身份认同；台湾地区正在努力发展原住民区生态文化，维持原住民十几个少数民族的语言生态，一般年轻人都能够讲三种以上的语言，即本民族语言、闽南语或客家话、国语和英语。该地区的语言政策是全民学好国语，既保护语言认同、语言生态及文化生态，又维持民族之间交流通畅，也扩大发展国际贸易往来（Lee，2003）。事实上，语言背景和语言文化由于人们的多语能力和各种语言的不同功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在通行多种

语言的社会里，年轻人找到了新的具有首创性的途径来获得语言并运用他们活用言语知识库内的各种知识，并将库内各种语言协商相处，也能处理好语言认同”(Hoffman，2003)。

对多语现象的探索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但更多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应用语言学和社会文化学的平台之上。然而随着对多语现象研究的深入，所涉及的领域更多，范围更广，再也不能仅限制于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学的框架内。生态语言学家豪根将多语现象看作为一种“多双语”，是维持语言生态平衡的重要保证之一；心理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研究者也给予了极大关注，因而对多语现象的研究融合了多种学科的努力。Aronin&Laoire(2003)将对个人和社会从单语到多语循序渐进的语言现象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学科总结归纳列表并分析其间关系。

表 1 展现的是社会和个人从单语到多语所涉及的领域学科的交替更新的增加。从横向看，单语—双语—多语中每栏所涉及的领域学科项目数量增加，复杂性增大，每增加一种新的语言意味着新的文化的渗入。社会和语言之间的纽带是多元化、多方位、多层次的，新的社会语言结构的复杂性需要调整研究方法，需要更多的学科领域支撑来重新审视重新解释。这是一种社会内部不断变化的动态语言结构，而语言学的中心任务应该放在多语现象这一社会的日常规范之上。从纵向看，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语言能力、言语行为和语言功能与语言现象中单语、双语和多语生成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相呼应，它们的交合点是身份认同，因而个体语言能力研究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侧重点则从语言现象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地理、语言政策与规划等转移到语言学习、心理生理、文化交际、语言学习/习得等更对个体化行为研究的学科。

表1 与语言和社会相关的研究学科和领域

社会	[1] 单语现象	[3] 双语现象	[5] 多语现象
	哲学 人类学 语言学 认知 教育 语言教学	社会学 社会语言学 人口统计学 政治 地理 移民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社会学 社会语言学 人口统计学 政治 地理 移民 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个人	[2] 单语能力	[4] 双语能力	[6] 多语能力
	心理学 交际 语言学 教育 语言学习 语言习得	心理语言学 神经生理学 心理学 交际 社会身份认同 文化身份认同 语言文化之接触吸收 移民 语言学习 语言习得	心理语言学 神经生理学 心理学 交际 社会身份认同 文化身份认同 语言文化之接触吸收 移民 语言削减 语言学习 语言习得

(Aronin & Laoire,2003)

三、个体多语能力的社会心理因素透析

早在 1981 年 Hamers 将双语现象(bilingualism)和双语能力(bilinguality)作了区别解释,双语能力被假设为一种个体的语言心理状态,能够获得两种语码来进行社会交际,所获得的语言能力程度各异基于如心理、生理、认知、社会、文化、动机、经济、教育等多方面的因素。多语现象(multilingualism)是指社会上的多语形势,而多

语能力(multilinguality)更侧重于讲话者的内部语言结构调整,是多语现象进程中的“产品”,也是个人活用言语知识库(speech repertoire)内的积存。

霍夫曼(Hoffman, 2003)认为“三语能力包含了来自三种语言系统的语言各因素以及在三语背景下的作用能力,如语码选择、语码决策和语码转换”。Genoz 使用了一个术语“个人多语现象”(individual multilingualism),意为个人多语能力的习得,认为“个人的多语能力可被理解为有能力恰当地并有效地使用几种语言来进行口头和书面交际的能力”。因而个人多语能力可归纳为个人对多种语言的储存和使用,包括某个人对某种语言不完整的能力、相对熟练、部分流利及不同场合的运用。个人的语言意识、语言策略和使用机会等是个人语言能力存在和有效使用的内在复杂特征。

多语能力也受语言认知行为、社会等级、职业选择、生活机遇、语言环境、教育程度、成长意识、家庭氛围、职场行为及生活方式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是个人在多元化社会中生存发展可利用的重要资源。多语能力也包括了个人的认知能力、获得知识的潜力、对文化背景的理解力和偏好、受现实社会的影响及作为语言学习者或语言习得者的自我意象等。多语能力并非自我存在,而是由语言持有者所处的社会语言环境所造成的。多语的使用涉及到多种文化背景,因而社会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对多语结构和多语能力的具体应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汉语对全世界所有的华人来说都是本土语,但是真正在多语环境中使用的时候,它的地位、功能、场合、时间和“质量”则明显不同。在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汉语(台湾地区称国语)是优势语言,是通用语言,每人都觉得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在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用汉语是天经地义之事;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汉语属于官方语言,虽然政治地位很高,但是在当地的实际使用功能范围相对就狭窄了许多;而在世界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汉语只能在华人家庭和某些特定社区在交往中使用。又如俄语,只有在俄罗斯它既是官方语言又是优势语言,其他语言即使人们掌握得再好也处于从属

地位，但是在其他前苏联各国，俄语不但失去了官方语言的地位，而且还可能使人们产生某种政治联想，它的地位被降级到只能在家庭和社区内的交际使用；相反在以色列的俄国人用俄语与同族人交际，它属于生存语言之一，还能用于餐馆服务、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生活服务、学校教育以及大街小巷的布告广告等（Sposky，1999）。事实上，个体多语能力是多语现象的生态统一体在个体身上的具体表现，构成了普遍的多语现象中具体的个体语言特征，也可以被看作是多语使用者的语言身份认同标志。

四、个体多语现象中的语言认同特点

每个人所拥有的多语能力取决于多种语言体系的输入、学会各种语言的潜力、掌握各种语言的水平及对每种语言的使用，因而个体多语现象（individual multilingualism）意味着个人多语获得的过程和结果。由于个体多语现象是语言生态的一个统一体，它所展现的语言认同特点有着自然界生物圈内生态现象的基本动态，有着变化、波动、输入、吸收等不同阶段，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持多语者也会调整自己的语言结构来体现不同的语言身份认同。国际著名社会学家Castell（1997）把身份认同看成是在全球化形势下需要认真分析的一个中心问题，指出"在高度民主现代化的社会里，人们的一种普遍感觉是身份的获得既重要又成问题"。语言不仅是个人身份认同的标记，更重要的也是对该种族群体身份认同的客观标记，每个想得到归属感的成员都会使用该语言来作为表现认同的自然特征。个体多语现象中的语言认同也是人们在无根基的异国他乡与异族语言接触中寻求身份认同的一种潜意识，而这种语言认同的参照是个人生活的特定环境，也就是说，个人语言生态特征存在于整个社会的宏观语言生态中。

个体多语现象与语言身份认同的多方面因素交织，如情感、态度、偏好、焦虑、认知类型、个体特征、社会纽带、文化影响及参照群体等，在语言接触的背景上展现了个体人际社会交往动态，并根据语言

的社会功能来分辨身份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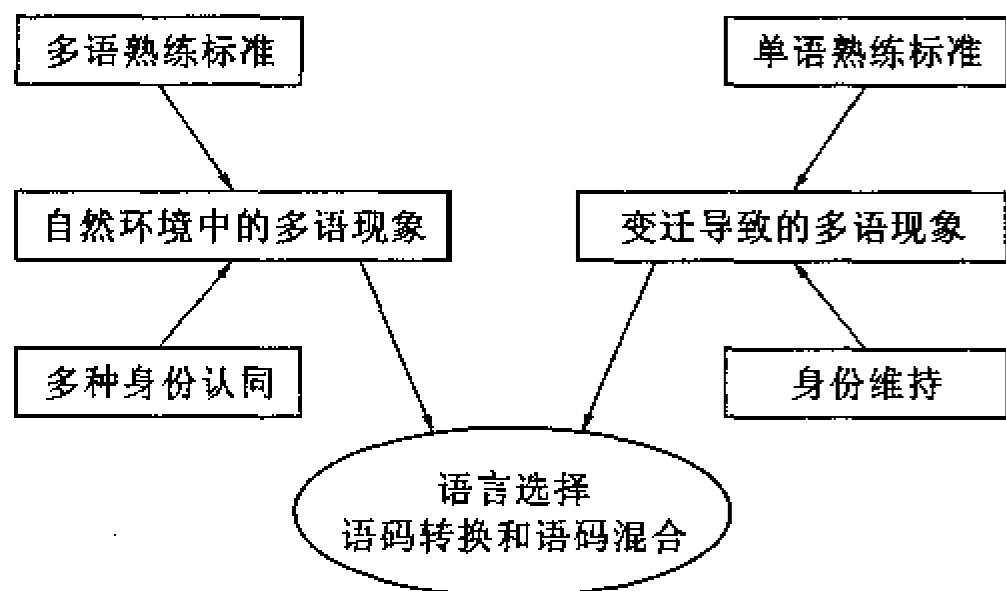
个体多语现象中语言认同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复杂性。作为身份认同的框架，它的言语内容成分较多，其中有优势语言核心（dominant Language constellation）和周围语言（peripheral language），以及服务于这些语言使用的听、说、读、写技能（Aronin&Laoire，2003）。而这多种语言在个体内部又相互交叉，相互关系作用，如在一种语言结构中插入另一种语言的结构或词汇，在讲话的过程中从一种语言转换或切换到另一种语言，混淆同语系或不同语系的语言使用，或用一种语言的形式进行另一种语言的学习等等，各种语言在生命的不同时间被激活使用，并不断地进行内部交换。有时在个体多语现象中就很难严格地区别其语言身份认同，无法用某种优势语言的流利与否来分辨讲话者的身份。

波动、变化和不一致是语言认同的另几大特点。时间的推移影响了个体语言生态所涉及的语言掌握水平，即一些语言被强化了，一些语言被略带而过，更甚至有一些语言被置之脑后。各种语言使用的技能和从各种语言系统内获得的知识也会交叠、波动和替换，使用的频率和地位也会有相应变化，同样，多语使用者的语言身份认同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在跨文化移民的过程中，种族文化身份的变化通常不是突然的，新移民在新的居住地必须不断地对涉及到他们的成员资格和原文化价值观的各种次身份的微妙结构重新认识，才能渐渐地在讲话中体现语言身份认同。人体只能在一个时间占领一个空间，而自我身份可以分裂于旧的和新的位置，并渐渐地被居住国或居住地的主流移民文化所取代。人从单语到双语或多语的发展进程伴随着新语言的获得产生了新的情感变化，进而导致了不断更替、调节和波动的行为，因而多语使用者内部身份的交替和变化是他们的认知潜力的发展结果。由于多语使用者根据对身份认同的需求来选择语言认同，结果是某种语言被使用，某种被激活，而有可能某种语言会永久地储存于个体的言语知识库里面。

语言功能的不平等是语言认同的又一特点。多语使用者可能用

一种语言与朋友交谈，用另一种进行商务应酬或国际交往，再用一种作为工作语言，家庭内部可能还用另一种语言，甚至在同一件事务的处理中也可能用不同的语言。如在以色列的俄国人可以读一篇希伯来语的文章，用英语进行科学研究，而用俄语来讨论同样的主题以求更深层的理解。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样的语言掌握在不同的地区使用所获得的语言认同是不一样的。如东非英语在达累斯撒拉姆是能力、地位的身份象征；在内罗比等东非城市是高贵身份的资源；但是在伦敦和纽约往往被看成是英语掌握不完美，受教育程度不高的身份认证。因而多语使用者在不同的语言使用过程中不断地为了社会文化背景对身份认同的需求进行语言内部的自我调节，对几种语言进行转换使用以保持语言功能的适用与自我表现意象的平衡，以选择或弃用某种语言来平衡形势同时也维持个人身份地位的平衡。

语言知识的拓展和身份认同的拓展是一致的。从常识来解释，学会的语言越多，延伸到其他生活工作领域的机遇就更多，所开发的技能和知识也就越多，升迁发展的趋势就越大。通过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交往，社会身份和地位也会被拓展。因而，个人多语现象和语言认同之关系犹如自然生态系统具有纵横交错、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特点。多语现象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可借用 Olshtain & Amitai (2003)所归纳的图表来直观地解释。



(Olshtain & Amitai, 2003)

从一方面来看，多语现象是开放的、自由的、平等相处的一种社会氛围，将掌握每一种语言都看成是与个体社会文化需求的协调，鼓励个人的语言学习和语言选择，对每一种语言的交际功能都赋予很高的价值。多语能力实际上是丰富并扩大了个人的活用言语知识库(Olshtain & Amitai,2003)。另一方面，个体必须在社会内有社交、经济和教育的行动能力。语言政策应该保证任何成员的机遇来提高他们所实践的语言的熟练程度以保障他们所需的社会活动能力，以打下成功人生的基础，同时也必须允许他们的其他语言系统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表达他们身份认同和民族智慧知识。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环境下的多语现象和身份认同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也是动态变化的，任何在这社会上有此需求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在多语环境下人们讲话过程中经常性的语码转换就是有多语能力的个体潜意识中对身份认同的需求的语言表达方式。

五、结论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多语现象不能仅仅看作一个人学会几种语言的表象，它是在全球化形势下多元文化背景中特殊而又普遍的语言现象；语言认同也不能简单地归纳为“你是谁”、“来自何方”、“干何工作”，而是通过语言符号来表述自己社会民族身份认同的言语行为。通过对多语现象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能更深更广地探讨对语言认同结构的描述，而从语言认同角度来看待人们学习和使用新的语言使得多语使用者获得更复杂的观点并在全球迁移的大环境中对个体身份的经历有更细致的洞察。

个体多语能力和个体多语现象是社会语言生态环境中的微生态环境，与个体语言认同密不可分，有其内部复杂性和依赖性。对多语现象和语言认同的研究对维持多语知识库的语言规划有一定的平台作用，也能促进社会语言学和生态语言学学科建设，更是语言持续性和多样性研究及保持变化中的社会内人际关系和谐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Blommaert J. *Discourse: Key Topics in Sociolinguis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Hoffman C. & Ytsma J. *Trilingualism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 [C].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3

[3] Aronin L. & Laoire MO. *Exploring Multilingualism in Cultural Context: Towards a Notion of Multilinguality* [A], in Trilingualism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C], ed. by Hoffman C. & Ytsma J.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3

[4] Olshtain E. & Amitai FN. *Being Trilingual: Is there a price to pay?* [A], in Trilingualism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C], ed. by Hoffman C. & Ytsma J.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3

[5] Lee HC. *A Survey of Language Ability, 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Attitudes of Young Aborigines in Taiwan*[A], in Trilingualism in Family, School and Community[C], ed. by Hoffman C. & Ytsma J.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3

[6] 劳允栋. 英汉语言学词典.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Multilingualism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Jiang Jin

Abstract Multilingualism originat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the history and indicates

that people use different languages alternatively in the same language context or in different language contexts. It is based on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language contact, and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approaches to ensure the human language sustainability, to keep linguistic ecological balance and to continue human culture. Identity is a way people demonstrate their national and racial identity belonging with articulated or purposeful language express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n multilingualism, analyzes the social and mental elements in individual multilinguality, comments on the features of identity in individual multilingualism and discusses the uniqueness and importance of study on linguistic identity in multilingualism under the situation of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multilingualism; linguistic identity; individual multilinguality; language contact

“东非英语”特征之浅见

姜　瑾

摘　要　英语的各种变体引起社会语言学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发展，“东非英语”成为一种比较特殊的英语变体，夹杂着当地的语言文化。本文从英语在东非的渗透历史着手，论述了“东非英语”的发展进程和各种特征。

关键词　东非英语，英语变体，特征

当今世界，英语已成为全球通用语言，英语语言变体(variety of English)被全世界各国都使用。在印度洋沿岸的一些东非国家，尽管经济还不太发达，但英语的使用却相当普及，他们使用的基本上是一种“非洲化的英语”(Africanization of English)，英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之一，也是除当地通用语斯瓦希里语以外的第二通用语言。由于受多种因素，诸如历史、区域、种族、受教育程度、经济情况、年龄、人种等的影响，他们对英语的使用有他们独到的特征。笔者作为一名援外医疗队的翻译，在当地工作生活了两年之久，在与当地人民的接触中，对“东非英语”这一绚丽多彩的英语变体有着直接的体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获得了更多的新奇感受。

一、“东非英语”史话

“东非英语”起源于1840年奴隶买卖兴旺时期。英国政府派员驻桑给巴尔等地，以迫使苏丹国王缩小奴隶买卖出口海岸，同时一批

英国传教士也相继进入东非沿岸各国，终年白雪皑皑的 Kilimajaro 山顶又引来了大批英国旅游观光者。有些人常年在非洲旅行生活并对东非的地理概貌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在多年的考察后绘制了第一张东非地图；英国人 Speke 发现了东非第二大湖，命名为"维多利亚湖"(Victoria Lake)，并作出了此湖即为"尼罗河"的发源地这一举世瞩目的发现；英国传教士和旅游者为当地各部落人群带去了从牙刷到药品等非洲人从未见过的物品；他们与当地人接触，相互学习语言，显示了双语的雏形。同时苏丹国王与英国政府的友谊不断加深。随着国内部落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国王愈来愈多地寻求英国政府的"保护"；英国政府下决心终止当地阿拉伯人的奴隶买卖行为而出动武力来到东非。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掘、商业开始发展，英国政府派一批使者来到东非沿岸各国，为当地培养了第一批教师。渐渐地，奴隶买卖市场改建为基督教堂；英国军官指挥着各地的武装力量；英国商品出现在部落集市；英国使者为当地人编写了第一部斯瓦希里语词典和第一本斯瓦希里语法书。1865 年英国人编写的《斯瓦希里语手册》(*Handbook of the Swahili Language*)和《语法练习册》(*Swahili Exercises*)到目前仍在使用；英国成为它们的"保护国"(British Protectorate)；自然而然，英语就成了当地国家的第二语言和官方语言。到 20 世纪中叶，一些国家相继独立，然而出于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等原因，英语还是它们的官方语言之一，使用范围极广。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东非英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语体。

二、双语现象

在东非一些国家，有一种斯瓦希里语与英语共存的现象。以坦桑尼亚为例，1965 年坦桑尼亚独立后，出于政治原因，政府规定学习、使用、发展斯瓦希里语，但出于历史、经济等其他原因，老一代接受的是英语教育，新一代为了今后上高校、出国留学、找工作、做生意，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也开始搞了改革开放后，欧共体许多大公司为这个国家搞经济建设项目，求职者需拥有流利英文，因此，英语

对当地人来说不但没有减少学习使用的动机，反而更加重要。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双语现象，在家庭、邻居、教堂的语言交流大多用斯瓦希里语，而在医院、建筑、商业、甚至军队，由于均有外国专家的指导帮助，英语或双语现象较为突出。在我们工作的医院里，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双语现象：医生与护士用英语讨论病例，护士和医生向病人用斯瓦希里语解释病情，中国和其他各国医生在使用英文的同时也学会了一些当地的斯瓦希里语以更好地和病人沟通和解释病情。在一些华侨家庭还出现了多语现象，这些家庭大多为福建、广东移民，家庭内部用家乡方言，与邻居交谈用斯瓦希里语，与欧美人沟通用英语，和我们交谈更有趣，老人用的是广东普通话，而年轻一代则用英语。

当地人受英语教育较早。由于环境熏陶，他们在学会读写英语之前就会几句简单的对话。小学开始开设较少的英语课时，到中学课时渐渐增多，大学教育全用英语。英语教师大多数为来自英国的志愿者(volunteers)，学校图书馆里大多数书是国际机构捐赠的英文原版读物。卫生学校、师范院校和中高等专科院校的主课教师大多从国外聘请。因此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如教师、医生、护士、行政部门官员、商人、职员及经常与各行各业打交道者如司机、电工、警察等通常多为双语使用者。英语成了援非各国专家和当地人民交流的纽带。这是由于历史、政治、经济、贸易等多方面交流因素所造成的特殊双语现象。

三、语音特征

当地人由于受种族口形及斯瓦希里语的影响，加上很少学习国际音标，基本上按照斯瓦希里语的发音规则来拼读英文单词，如Mkuani，Mwalimu，他们将 banana 时发音完全标准，但他们经常把[e]、[a:]、[ɛ]等音混淆，China 会讲成"qina"，intravenous 会读成"interavi:nas"，在尾音[l]后面常添加元音如 hospital 会讲成"hospitali"，"th"字母组合只发"t"的音，draw，tree 等词也会变成

"deree"或" teree", climb, bomb, comb 等词最后的字母"b"也会发音。这主要还是斯瓦希里语的字母拼读方法，将每个字母的发音都很清楚地发出来。时间略久，也不难理解。倒是以这种方法，我们学会了基本的斯瓦希里语与当地人交流。

四、语域特征

1. 书面语

书面语存在着官方与非官方的区别，也受教育程度高低的影响。下面两段实例可以展现它们的区别。

A. On behalf of our people, our country and our party, I greatly appreciate the work the Chinese doctors have done here and express our heartiest thanks to your government for all kinds of support, doctors, medicine, medical instrument, and all the necessities for the hospital and for our people. Both our countries belong to "the third world" and we are good friends. Friends should help each other and China is a good example to us. Chinese doctors here have overcom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worked whole heartedly for our people and saved many patients lives. We'll try our best to supply them with all kinds of facilities available to improve their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 so that they can do even more for our people...

B. Dear friends everywhere in China. By the power of God we are thanking very much for to enable Chinese doctors to help us in to build our hospital and cure our people. All your lovely and kindness we don't forget it. Chinese doctors are very good, polite lovely and kindness.... Last we are very thanking our God to make good chosen of the doctors to come here work at Abdula Mzee Hospital and to be

with us. Also we are sure that all the things you make here we shall remember all the time. Our God we are sure that is with you every tie and every where...

A 例摘自当地卫生部门的致谢辞，B 例取之于当地人的感谢语，二者内容大同小异，但文风大不一样。B 例虽然谈不上语言结构正确，但内容热情洋溢，意思表达的非常明确。但无论从单词拼写到语法结构都有明显的错误，但他们并不在意，这与普通平民百姓接受英语程度较低且走出校门后很少接触书面英语而最多简单的口语交流有关。A 例中无晦涩难懂的词汇，语法正确、句型完整，这是当地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的书面英语的共同特征。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对专业英语的使用毫不含糊，以他们的病史记录举例说明。

...Heart as before—grossly enlarged with defused apex impulse in mid-axilla. Systolic and diastolic murmurs as on admission. Auricular fibrillation continues...

这主要是他们一般学完基础英语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专业上，很少有人进行语言研究或文学修养的熏陶，但所表达的内容一目了然，清晰整洁，完全符合医学专业英语中病史的书写格式。

2. 口语

口语趋向简洁化。下例对话可以展现这一特点。

A. Death?

B. Nil.

A. Admission?

B. Three. One fever 39.5℃. Diagnosed malaria. Chloroquine used as usual. Female ward, bed 19. One fracture, falling down from clove tree. Splints used, Male ward, bed 10. One abdominal pain, diagnosed appendicitis. Operation done. Male ward, bed 28.

A. Anything else?

B. O-P-D 9, treated and went home.

A. Others?

B. Female ward bed 3 had a minor problem and solved. Others slept well.

A. That's all?

B. That's all.

A. Thank you. Now ward round.

这是医院晨会交接时的例行对话，将夜间总值班的所有内容向早班医生汇报：病人、性别、病情、治疗、床位等，言简意赅，发音中不带有美国黑人英语的模式。其他场合的对话也基本如此。

另一个特点是夹杂斯瓦希里语。当地人尊称妇女为 Bibi，因此就出现了 Bibi Wang, Bibi Pepper, Bibi Fatuma，他们称翻译为 Mwalimu，当地语意为 Head Teacher，如"Hello, Mwalimu, do you like some kamba(龙虾)?"很多斯瓦希里语单词已经成了东非人使用的英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为有些物质或生物是当地特有的产物而无法用英语的单词来替代，但有些来自欧美国家的东西也无法找到对应的当地语词汇，只能用英语的词汇夹入斯瓦希里语的句子。中国政府援助非洲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常年与中国专家一起工作的本地人也就发明了一些更为特殊的表达方式，例如有急诊电话只说"Surgeon O-P-D"，"Post ready"意为邮局有信件。另外他们还学会了讲"好"，"快"等单音节汉字。

3. 语言与文化的悖逆

英语结合非洲风俗习惯是别有一番风味和情趣的。当地人非常有礼貌。知书达理者每天早上与我们见面时总将左手放置右臂上，人略向前倾斜，长时间握手问安："Hello!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How is everything? How about your health? How about your family?..."初去者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礼。其实这是按当地风俗用英文表达的一种礼节。信伊斯兰教者认为左手是不干净的，一般不用来碰客人，一连串的问候语是从斯瓦希里语的问候语逐句对应翻译而来，握手是向外国人学会的，问候时间长在当地看来是尊敬亲热

的表示，这是典型的“土洋结合”的礼仪表示。他们嘴上经常讲“Ladies first”，出门在外也遵守这一西方风俗，为妇女让座、开门、提行李，轮船码头见到的是女性都在男性前面排队，公共汽车上往往是女性坐在座位上而男性则站在车门口，但是到了家中却是另一番 women last 的习惯：妇女不准进教堂，一夫多妻制，向族中长老提出就能赶走妻子，离婚了还要一个月的保留权等等。这些都是外人无法理解的两种不同语言和语言所携带承载的文化带来的语言和文化的矛盾。

4. 语言与性格

常用语能表现人的性格。当地人性格随和、耐心、诚实、讲话也不失婉转。如果要向你讨清凉油时，他们会说：“I have some problem, can you help me?”“My mother got a slight headache, she wants a vix or two to help.”这时候他们提出请求时常用的 roundabout way。

另外，在一些地区，人们的时间观念相当淡薄，因此常用口语中也明显带有这一性格特征。例如，每次寒暄就要花上好几分钟，从来听不到 Hi 就匆匆而过的，也无人强调“Be on time”，他们很少讲“Time is money”，也不用“punctual”、“exact”等词；“Maybe”代替了“Sure”，常挂在口头的是“Wait please”、“Don't worry”、“No hurry”等等，他们好像乐意“wait and see”，在似火骄阳下排队秩序特好，无人争先恐后。“Stress”似乎与他们无缘，他们从不来去匆匆、分秒必争，生就一副悠闲性格，不着急，不上火，给人以一种田园牧歌式的轻松愉悦感。然而生活的慢节奏也导致了工作的低效率，这恐怕与这些地区的贫穷落后有关。但愿他们“Hurry up”，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早日摆脱贫困，跟上全球发展的步伐。

参考文献

Tunginie S. *A short History of Tanganyka* [M]. Dar es Salaam Publication, 1995

Some Special Features in Eastern African English

Jiang Jin

Abstract Varieties of English has lead to great interests by sociolinguists. Through the evolution of more than 100 years, Eastern African English has become a rather special variety of English interacted with local language and culture. This paper begins from the history of English penetrating into East Africa and discusses the processes of Africanization and features of Eastern African English.

Key words Eastern African English; variety of English; features

双语教育面面观

姜 瑾

摘 要 本文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角度回顾了双语教育的发展史，对当今世界各国双语教学的不同模式进行了客观评述，分析了不同模式在不同要求的双语社会中的教学目的和优势所在，提出了在不同的双语教学模式中的二元文化导入问题，强调了双语教育规划中的师资培养目标，同时也讨论了双语教育的必备条件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 社会语言学，双语教育，二元文化导入，师资培养

一、引言

双语教育(bilingual education)从社会语言学观点来看，是指"在学校里运用第二语言或外语教学知识性科目"(Garcia，1997)。从广义上看，双语教育涉及到二语或外语的普及和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双语教育甚至多语教育受到了世界各地众多语言研究者和语言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关注。1999 年美国教育部双语教育和少数民族语言事务办公室(OBEMLA)属下的跨文化发展研究协会对全国的双语教育课题规划进行了全面评估，同时制定了新的双语教育政策规划改革方案并提高了对双语教学的质量要求 (Montecel & Cortez，2002)；加拿大的沉浸式强化训练教学模式(Johnson & Swain，2002)被语言教育研究者视为双语教学的典范；欧洲学校五十多年双语或多语教学工程的开展赢得了语言学与社会

学双优之声誉(Housen,2002);非洲各国的双语教育体系和多语形势与其政治、文化及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亚洲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各国政府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不断革新,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双语教育的长期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国家或地区语言使用中的双语制和多语制(胡文仲,2001)。中国目前的教育改革中正在进行双语教学的尝试,语言学界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本文将从社会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角度对双语教育进行历史和现实的客观评述,分析当代世界双语教育的目的和类型,从而探索双语教育必备条件和发展前景。

二、双语教育史话

双语教育的历史可追溯到18、19世纪的美国经济文化。当时一些民族学派语言学团体 (ethnolinguistic group) 将他们自己的非英语语言誉为超越新大陆英语的文化标志,是公司和贸易的商业象征,因而在19世纪的美国由民族学派语言学团体所建立的双语学校比比皆是,这些学校里的教学采取两种语言:该团体所确认并通用的语言以及新大陆主流语言即英语。同时在世界各地此类民族学派语言学团体为许多学校提供了双语教学的资源。然而,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共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并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出现,双语教学被终止,代表着少数征服者语言团体的单语教学为全世界教育系统所接受(Garcia,1997)。

20世纪60年代的全世界政治形势导致了世界各国双语教育规划的开展。非洲国家的独立,亚洲、欧洲及美洲国家本土文化生命力的日益强大,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全世界移民动态分布从某种意义上引起了全世界各民族对种族渊源和种族地位的更大兴趣,从而导致了所谓的“弱小”民族保卫并继承传扬本民族语言的极大欲望,单语教学由于其语言排他性而受到公开批评指责 (Garcia,1997)。这样,从20世纪60年代初,特别在早期的学校教育阶段,母语与主流语言共同使用成为学校教学发展的新趋势。美国于1968年制定了《双语教育法案》,以保证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生与拥有英语背

景的学生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加拿大1967年制定的《官方语言法案》使"沉浸式英法双语教育规划"得以实施；曾经坚持单语教育的欧洲国家和地区如大不列颠、西班牙等也开始了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学方法，威尔士和西班牙分别在1967和1978年将双语教育措施列入法案(Montecel & Cortez,2002)；1974年新西兰政府将毛利语设为除英语以外的第二官方语，毛利血统的新西兰人学校都以两种语言授课(Platt,1991)；1973年菲律宾宪法规定英语和菲律宾语均为官方语言并在学校教育中采取了双语教学，为亚洲国家学校的双语教育或多语制的成功积累了经验；印度的许多学校都采用了三语教学，即英语、印地语和本土语言均可用于学校非语言课程的教学(Sahgal,1991)；非洲许多国家自独立起对自己国家的语言政策进行了调整，比如在坦桑尼亚，对初入学的孩子用母语教学，到小学四年级开始加入斯瓦希里语和英语，随着年级的升高，不同语言的课时量不断变化，到高校用英语教学的课程占很大的比例，英语和斯瓦希里语成为该国的官方语言，母语作为种族语言的标志，斯瓦希里语成了不同种族部落间进行社会、商业、文化交流的族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而英语则成为政府部门公事、外交、执法或正轨教育等方面使用的高效率语言(Kanyoro,1991)。中国教育部于2001年颁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要求"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专业以及为适应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的金融、法律等专业，更要先行一步，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紧接着许多有条件的省市也提出要"将英语确定为部分课程的教学语言，并逐步使其成为与普通话地位相同的教学语言"。双语教学目前亦已成为教育改革的热点，各地教育部门及大、中、小学都有跃跃欲试之趋势，方兴未艾。

三、横观双语教学模式

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二元文化或多元文化国家的学校根据本国的

具体情况实施了双语教学。不同的国家实行的双语教学有不同的模式，粗分为沉浸式强化训练教学（immersion program）；维持性双语教学（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过渡性双语教学（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双向/多向性主流双语/多语教学（two/multi-way mainstream bilingual/multilingual education）；以及主流语言＋导入外语/二语课堂（Mainstream ＋withdrawal foreign/second language class）等（Garcia，1997）。

沉浸式强化双语教学方案最初由加拿大魁北克省所设计，其目的是为了让母语为英语和法语的学生都能流利地使用两种主流社会语言。此教育规划的极大成功使该教学方案得到迅速传播并为其他国家的教育部门所接受，同时它也被进一步设计为将学生培养成为能使用两种较高社会地位的语言的双语使用者。学生的整个受教育过程全部由双语教师承担，所有的课程讲解均使用双语。美国在西班牙移民社区也成功地实施了双向性双语沉浸式教学（two-way bilingual immersion program）模式的实践。对初入学的孩子以 90%西班牙语对 10%英语的比例教学，逐年以 10%的量更替，到五年级时两种语言在课程设置中的比例达到 50∶50。美国教育部门对双语教学评估证明无论是小语种（minority language）使用者或大语种（majority language）使用者都从中受益匪浅，掌握了高水平的双语表达和读写技能（Montecel & Cortez，2002）。

维持性双语教学体现在对持小语种民族学生用两种语言授课，两种语言被划分开来（compartmentalization），不同民族的教师用不同的语言上课。这种教学的目的在于维持发展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历史，同时也让学生全面地掌握主流社会的语言和文化，既为少数民族继承丰富发展本民族语言创造条件和机会，又符合主流社会繁荣兴旺社会文化多样性之前景。加拿大以“遗产语言双语教学”之名义支持维持性双语教学；美国的公共教育基金对此支持不大，而为此目标的私立移民学校较多，这种双语教学培养出的学生两种语言的读写和表达能力较强。非洲许多国家独立之初为了重振民族文化和民

族精神，采用了维持性双语教学，而后逐渐转向中小学以本民族语为主要教学语言而大学和高等院校以英语教学为主。

过渡性双语教学一般需要具体教育规划和大量教育资源。这类教学模式在美国最普遍。上学之初用母语，由双语教师将主流语言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逐渐各科教学中两种语言共同使用，不作任何划分，最终，学生从双语教学课堂全部转向使用主流语言的单语课堂。美国是移民国家，英语是进入主流社会的语言，这种过渡性课堂教学语言转向合乎国情，与每个学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各国的过渡性双语教学和世界经济导向极有关系。在国际交往中最常用的语言就是从教学语言过渡到结果最终使用的语言。新加坡独立增加了国民受教育的机会。一开始学校教学语言以汉语为主，英语作为二语继续存在，但几年后，各种族背景的学生都纷纷转向用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课堂和学校，最终导致目前英语成为学校教学的主流语言和第一国语，而汉语、马来语及泰米尔语仅仅成为强制性第二语言(Platt，1991)。

主流双语或多语教学模式主要在欧洲国家的学校盛行，这种教学法是在整个学生学习过程中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主流社会语言进行教学，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卢森堡。由于当时有许多各国官员的孩子进入当地学校却又无法用统一的语言教学，因而就制定了各学校使用欧共体成员国的官方语言的教育规划。这些学校的孩子属“高度流动性儿童”，随着父母工作的变迁而经常更换学校，但孩子本身的母语只属于本国的官方语言如英语、法语、或德语等，而在那个语言社区只能属于少数人使用的语种。为了让学生同时掌握两国或多国官方语，学校根据本校学生的不同情况分为数个语言区，总共包括11种欧洲国家的官方语如丹麦语、荷兰语、英语、法语、芬兰语、德语、希腊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瑞典语。开始进入这些学校时，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用该国的官方语言进行教学，同时开始二语或第三种语言的学习，逐渐教学由单语转向双语或多语，各语言区的学生群体也开始混合。这种教学法的成果是大多数学生将

本国的官方语言作为母语，同时又能不同程度地熟练使用两种以上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官方语言。如今这类学校已成为由欧共体成员国各国教育权威部门属下的公立教育机构（Housen，2002）。它与其他双语教学的不同之点在于所有的教学语言对各语言民族团体来说具有相等的社会价值（Garcia，1997），充分利用儿童学外语的有利条件，较早地让儿童接触外语，在小学阶段加大外语的分量，使用外语作为教学语言（胡文仲，2001），培养出的学生既有双语或多语语言能力又有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另一种双语教学模式是在各国教育规划中最常见的，即主流语言＋导人外语/二语课堂，其目的是教该国持主流社会（mainstream society）语言的学生学会一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此类双语教学其实就是加强外语教学。学校各主要课程均用本国语言授课而由专门的外语教师进行外语教学和强化训练，学习外语的课程设置常常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对双语表达的需求有关，学习时间的长短和教学策略视个体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和对学习结果的要求而定。除此之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主流语言＋辅助性外语/二语课堂（mainstream＋supplementary foreign/second language classes）（Garcia，1997），作为课后或周末对学校系统教学外语或二语课程量不足之补充。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目前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辅助性英语课堂。课后、周末或假日，各年龄段的学生甚至成人都到这类学校付额外费用以学到更多的英语知识，根据学习者个体目标或经济、精力的投人获得不同的学习效果和双语能力。在中国，这种现象尤其突出，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发挥该语言的功能性作用，作为通向学术成功或事业成功之路的工具。

四、双语教学与二元文化导入

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美国、加拿大及欧洲国家双语教育规划中所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在培养学生双语或多语能力和表达技巧的同时不能疏忽二元文化（biculture）或多元文化

(multiculture)的导入和理解,将教授多样文化的经验和价值观视为日常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双语教学课堂应该是跨文化交际的场所。各民族的学生都深受本民族语言文化的熏陶,行为举止都带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课程设置必须反映且珍视学生的文化修养。教师应该想方设法将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和共同点与所授课程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培养学生的双语能力。

学校帮助学生塑造个性,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同时,学校还是使得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得以代代相传的主要场所,多元文化背景是双语或多语课堂的一个重要问题。学校双语教育中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途径导入二元文化。正式的文化导入应该在课堂教学中介绍所用语言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政治、政府、民族、种族、科学、艺术、音乐、体育运动等知识以及教授如何在这个社会生存和适应社会环境的需要等;非正式的文化导入是在学校的各个场合有意识地灌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人们的行为举止、生活习惯、礼仪礼节以及如何在细节问题的处理中培养自己在不同社会的社交能力和优雅举止等,同时也要向学生导入不同文化的差异和对比,如不同的价值观、宗教信仰、理念观点、喜好偏见等,以达到从多层面、多角度来培养学生的二元甚至多元文化意识,在本民族文化与外语或二语文化之间建立起相互协调和双向沟通的良好框架结构,宣传推广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增强对外语或第二语言国家或民族文化的理解,克服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各种心理和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促进两种语言和二元文化的双向适应和交流,使双语教育中二元文化和谐共处,兼并交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双语教学时更要注意二元文化导入,学会文化移情(empathy),充分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主流社会语言文化,达到民族团结和多元文化共同发展之目的。若使用外语进行知识性课程的教学也必须注意文化意识培养和目标语国家文化的导入,将两者文化的差异进行对比,同时探索人类文化的共同根源,减少交际中文化迁移带来的失误,使得语言表达

更加得体。同时还要防止文化过分适应(cultural overadaptation)倾向，尽可能避免在双语表达中出现“中国式外语”或“外国式中文”，缓解非语言能力问题所导致的语用石化现象(pragmatic fossilization)(Trillo,2002)。

五、双语师资培养目标

优秀的师资是双语教学规划成功的保证。双语教学绝不能理解为教师在课堂上经常进行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即用两种语言交替讲课。只知道如何用两种不同语言词汇来进行互译课程术语的教师不能充当合格的双语教师。如同双语教育是一个长期规划一样，双语师资的选拔和培养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制订全面的教师培训计划。一些国家双语教育成功的经验证明，双语教师必须有足够的学历资质，有两种语言的熟练表达能力，对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甚至两国历史地理知识有全面了解，必须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包括两种语言和学校其他课程的新发展，适当地了解一些学生的母语知识，有计划定期地接受教学法、教学策略的培训，能将两种语言的文化和社会语用特征视为学术成就的宝贵财富，经常开展现场教学科研活动，并且经常寻求双语领域和语言学专家的帮助和支持。

在中国目前的双语教学尝试阶段，“确实有条件的学校”若要用外语教学知识性科目的话，教师本身的语言文化素质是绝对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所用的师资必须是精通外语的专业教师，无论教授任何科目，都必须能使用符合该科目教学规律和学科特征的教学用语进行解释、分析、论证、答疑等；同时，学生也要有相应的外语能力和用外语思维的能力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做出反应并配合开展所有的课堂活动。接受短期英语培训后的教师如果只能通过汉语思维用英语单词拼凑出来的表达方式来讲课，非但不能用在中小学非语言学科的课堂教学中，而且还会对这些学科教学的整体内容的完成有所妨碍，长此以往会在不同程度上使学生养成不符合外语表达习惯的语言行为，不利于学生外语水平的真正提高。在全方位的语言

输入和输出及动机无法得到基本保证的时候，正规的外语语言教学课是必不可少的，这有助于学生减少与各种非标准语言变体接触的通道，保证所学所用外语的准确(accuracy)、精确(precision)和得体(appropriateness)(Housen,2002)。中小学双语教学应以语言教学课程中的外语导入法为主。在一元文化的环境里从事外语教学，除了要有较高的语言能力外，教师要经过专门化的外语教学培训，要有尽可能丰富的外语文化背景的知识，要懂得该把哪些内容带进课堂，要能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能推断出学生的感情和需要。因为评价学生在课堂上的文化适应水平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自己的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同时能承认并赞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他们必须拥有全身心的奉献精神，对学生有高度的责任感，了解学生的个性，对学生有着高度期望，组织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在语言教学的同时注意非语言学科知识的渗入。教师必须有能力组织引导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的社会交际形式的语言课堂和校园活动以弥补语言输入及输出的不足。

高等院校或中学能用两种语言授课的非语言类专业学科教师必须接受过用母语和英语严格的双语沉浸性强化培训，了解有关语言学知识及其文化关联性，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教学的需求及社会文化大环境的需要不断调整教学策略，以颇具特色的双语教学风格展现两种语言和两国文化共享的学科内涵特征，能提供足够的超越纯外语学习过程的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强化，扩展语言输入的途径和类型，而且能增加引进基础词汇和语言行为的多种机会；同时也对所教学生的认知学习风格、交际学习风格、关系学习风格和动机学习风格等对课堂学习风格有所了解和有所影响，从而组织有意义的课堂教学，采用变化多端的教学策略，所教内容应符合当今世界科技的发展，使学生通过对该专业用双语学习和研究迎接世界最先进的学术挑战和科技革新。

六、双语教育的发展前景

双语教育是长远规划，是全社会的任务。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需求应该采用不同的双语教学模式，一种模式的成功经验不能生搬硬套到所有的双语社区。对双语教育的评估不仅仅是各地区、各学校、各年级标准测试的成绩，更重要的是顺应环境要求和形势发展的开放性评估。各国的双语教学成功经验证明双语教学能促使学生在学术、文化和语言等多方面发展，同时它的成功取决于所制定课程的多方面多种因素，其中很多超越了语言规划设计者的预想。对于教学的评估也应该从多方面因素考虑。美国教育部门常常将双语教学称为"素质双语教育"，并认为双语教育的成功来自于多种教学实践的结合、学生积极参与的效果、全社会的支持以及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挑战，"一个成功的双语教学规划能开拓学生语言和文学潜力，引导他们走向成功的学术成就，培养他们社会文化的综合素质，也能对整个社区的人文素质施加积极向上的影响"。当今世界，单语社区正逐渐消失，双语制或多语制社会将取而代之。各国、各民族和种族都希望与外界交流，融入社会，因此，双语教学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从全世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角度来看，双语教学将促进新科学技术的传播，有利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向经济一体化、文化全球化发展。从社会语言学来看，双语教学能保护多种语言，特别是弱小和少数民族的语言，使各种语言变体和种族方言完整地保持下来，继承和发展民族语言文化，减少语言消亡，使后代既能继承文化遗产又能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未来社会需要掌握多方面技术的专家，也需要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才，更需要将语言才华和高科技能力相结合的未来社会建设者。双语教育应参照各国不同的具体情况和民族分布状态制定切实可行的语言规划和双语教育规划。精心设计的双语教育规划必须将外语教学与用外语教学的性质与方式区别，同时在语言实践中有机结合，尽量在每日课堂内外都创造两种语言交际的机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师资力量开展不同模式的双语

教学，制定统一的教学质量要求，符合社会对主流语言和外语或二语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Garcia O. *Bilingual Education*, [A] In Florian Coulmas,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C]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7

[2] Housen A. 2002, *Process and outcome in the European Schools Model of Multilingual Education*, [J] Vrije Universiteit Brusel and Fund for Scientific Research-Flanders,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Online, Volume 26, Number 1 (Available at http://brj.asu.edu/v261/articles/ar2.html)

[3] Kanyoro R M. 1991 *The Politics of English Language in Kenya and Tanzania*, [A] In Jenny Cheshire,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 Kramsch C.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5] Montecel M. & Cortez J. 2002 *Successful Bilingual Education Program: Development and the Dissemination f Critéria to Identify promising and Exemplary practices in Bilingual Education wt the National Level*, [J]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Association,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Online, Volume 26, Number 1. (Available at http://brj.asu/v261/articles/ar2.html)

[6] Platt J. 1991 *Social and linguistic Constraints on Variation in the Use of Two Grammatical Variables in Singapore English* [A]. in Jenny Cheshire,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7] Sahgal. 1991 *A Patterns of Bilingual Settings in India*

[A]. in Jenny Cheshire, *English Around the World*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8] Samovar L & Porter R. 2000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9] Trillo J. The Pragmatic Fossilization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Non-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J]. Journal of Pragmatics, 2002, 6: 769~784

[10] 胡文仲. 2001 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得与失[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1(4)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Bilingual Education

Jiang Jin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growth of bilingual education from the sociolinguistic aspect, comments on the different models and their societal aim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examines their advantages at different societies of bilingualism, analyses the importance of biculture input in bilingual education, emphasizes the teachers' quality training for bilingual program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prospects of developmen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Key words sociolinguistics; bilingual education; biculture input; teachers' training

网际交流语言符号：网民的 LINGUA FRANCA?

姜　瑾

摘　要　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网络语言符号正不断改进更新以适应各地区各行业各层次人们的需求。国际互联网上创造出各种语言变体使得网际交流符号成为全世界各民族网民的 LINGUA FRANCA。本文探讨了网络语言符号的文化象征意义，通过实例考证了网络世界语言符号的特征，并从网际交流情感符号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探索其任意性和相似性，概述了网络语言符号的全新文化创意及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特征。

关键词　因特网，网际交流，语言符号

一、引言

半个世纪前，美国的一位科学管理专家 Vannenar Bush 预言了信息社会的到来并设想了拥有一个叫做 Memex 的案头文件库和资料库。而当今世界，因特网不仅实现了这一美丽的梦想，还使人们的信息交流变得更加快捷通畅，"上网"成了信息经济时代人们生活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因特网世界浩瀚无垠，正是因为它能接纳全世界各民族、各地区、各种肤色、各个阶层、各行各业的人。但是，不同民族或社会结构中的个人，无论特点多么相近，没有一门共同的语言也无法做到沟通，这样，网民们"被逼得造出，除了他们自己几乎不通

用、除了他们自己无用处的一系列言语文字来了”（陈原，2000）。网络语言变体应运而生，全世界语言的广泛多样性背后所隐藏的普遍特征使语言符号的功能在网上被发挥到极致，网际交流的语言符号成了全世界网民的族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网上典型的跨文化交流使得每一个上网的人对网络语言符号的发展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因特网符号是在因特网的全球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随着因特网的迅速发展，网络上的新技术、新观念、新名词的各种表达法层出不穷，也带来了因特网各类语言符号的络绎不绝的诞生，显示了其自身的特色与活力。

语言符号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跟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其形式的演进与人类知识形态的演化息息相关。由于因特网语言符号是在网络的全球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网络语言也正在不断改进更新以适应各地区、各行业、各层次人们的需求。网上的信息交流不受国籍、地区、行业的约束，打破了时空限制，网络语言符号的文化象征意义也能被网民普遍接受，又由于网络的全球化特征，网络符号正在不断改进更新以适应各地区、各行业、各层次人们的需求。网络符号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以它自身的灵活性、趣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展现了它特有的活力与魅力。网络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语言符号世界，网上典型的跨文化交流使得每一个上网的人对网络语言的发展都作出了相应的贡献。网际交流的语言符号成了全世界网民的族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而网上语言符号的灵活多样性、经济性、分析性、理据性及其丰富的主导特征又展现它的全新文化创意和学科交叉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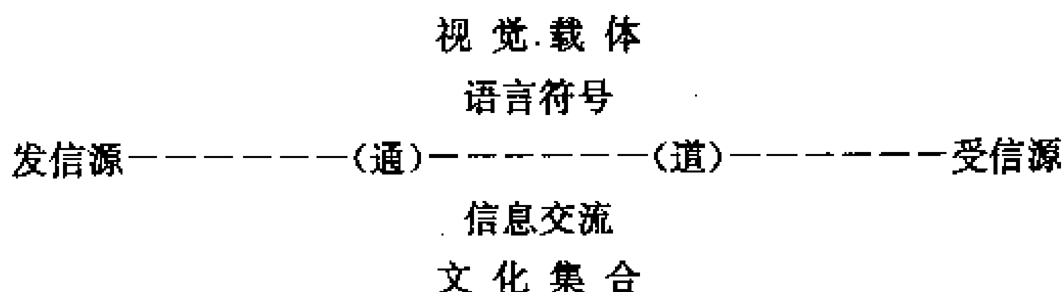
二、网络语言符号的文化象征意义

语言发展的两大特征，丰富复杂化及专门化，均在因特网交流中显示了出来。它既有“能够正确反映所有不时新起的变化的极柔软的立体的言语”特征，又体现“社会专门化的结果”。语言符号伴随着

人类社会的形成而产生，跟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其形式的演进与人类知识形态的演化息息相关。语言发展的两大特征，丰富复杂化及专门化，均在因特网交流中显示了出来。它既有“能够正确反映所有不时新起的变化的极柔软的立体的言语”特征，又体现“社会专门化的结果”(陈原，2000)，在网上，人们的信息交流全部倚仗语言符号作为载体，其功能被发挥到了极致，网络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语言符号世界。

由于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第二语言，又因为美国是计算机的发源地，英语理所当然地成为因特网的通用语。在网上，80%以上的信息靠英语来储存，绝大部分的指令用英语发出。然而，以英语为基础的网络语言符号为适应网络交际快速简捷的需要，以更准确、精确、高效并经济地达到交换信息、交流思想的目的，创造了由首字母组合、数字、标点符号和电脑键盘上及软件符号栏中一部分符号组成的简短的线性排列，以此来迅速地传递更多的信息。与计算机术语(geekspeak)，即计算机专家在编程等过程中所用的一种特别的包含许多专门词汇的术语不同，因特网语言符号为上网者在聊天、收发电子邮件时使用的一种由字母、短语、符号和数字的特殊组合进行交流的语言，可称为“网上用语”(netcroynym)，“网络俚语”(netspeak/cyber slang)，“电脑语言”(cyber language)，或“计算机俚语”(computer slang)等。

因特网上语言符号的主要功能是承载各种各样信息的交换，这种信息交换是由五个要素构成的，即：发信源、受信源、通道、信息代码和上下文。在使用网络语言符号交流的过程中，发出信息者为发信源，接收信息者为受信源，网络为通道，语言符号便是信息代码，网民的共同知识为上下文。在因特网上，所谓的上下文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集合，只有在这种文化集合之内，信息代码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其交际功能如下图所示：



因特网上的交流由于缺少语境的信息,因而也就打破了人们日常生活中所遵循的礼仪规则,形成了自身认可的网上行为规范。在双向实时连续的交流过程中,双方不断地接收反馈信息,不断地调节修正交流的方向和内容。网上交流有着口语和书面语的双重性质,但语言符号和视觉载体是信息交流的唯一媒介。因此,网络语言就形成了它独特的文体风格。人们借助于符号进入网络世界,有意义的符号系统为网民展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在符号世界中遨游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客观世界中遨游。因特网这一现代认识工具以它的高速度和高精度加工、处理着各种信息,然后在它的终端源源不断地以符号形式显现出它所输出的新信息;人们面临着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的信息,自己又在不断地向外界输送着信息,使整个社会成为信息社会。最终,网络语言全球化导致网络文化全球化及信息全球化,网络语言符号象征了信息文化和信息技术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是信息革命的新产物和新技术。因而,网络符号与网络知识相互促进、相互作用、不断发展,因特网传播的新科技信息越多,语言符号也就越丰富。

三、网际交流的语言符号特征

与人类以高等动物的特性去占有或使用更多的空间、时间和各种物质材料相反,人类的最高等智慧结构正在不断地引导人们使用尽可能少的时间、空间、物质、能量去完成越来越复杂的思维活动,从而创造并积累更多更好的知识和信息。网络语言符号的独特性和新颖性与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及电脑网络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英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第二语言,又因为美国是计算机的发

源地，英语理所当然地成为因特网的通用语，并被趣称为网络世界语言之旗舰(flagship)。以英语为基础的网络语言符号交流者为适应网络交际快速简捷的需要，以更准确、精确、高效并经济地达到交换信息、交流思想、让受信源迅速获得最大的信息量之目的，使用首字母缩略，数字、标点及各类符号的混合组成的简短线性排列来传递无穷无尽的信息就是因特网世界里语言符号的特征。网络使用者和网际交流者尽可能用最经济的手段简洁明了地传达必要信息，用首字母缩略组合表示网络结构名称就是这类语言符号特征的典型例子，如：

ABE （软件名）DOS 系统中常用这种软件把非纯文本文件(binary file)转换为纯文本文件(ASCII file)，以便通过电子函件方式发送

AUP （Accepted Use Policy）网络使用规则

ACS （Asynchronomous Communications Server）异步通信服务器

ADSL （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异步数字用户线路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ANSI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美国国家标准学会(在计算机领域，该学会为程序语言、电脑屏幕显示、网络交流等制定了各项标准)

CALL （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机辅语言学习

CCITT （ Comité Consultif International de Télégraphique et Téléphonique）国际通信标准委员会(一个致力于制定国际通用的通信标准的国际性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有关调制解制器的各项标准都是该组织制定的)

CD-ROM （Compact Disc-Read Only Memory ）激光磁盘

CGI （Common Gateway Interface）通用网间连接界面软件

CI$ (CompuServe Information Service）计算机服务信息服务公司(这是人们给美国最大的在线网络服务公司之一起的绰号。该公司名称的缩写应为 CIS，用美元符号代替字母 S 是讽刺该公司服务费用昂贵）

DEK (Data Encryption Key）数据加密钥匙

dpi (Dots Per Inch）点/英寸（dpi 值是衡量打印机、扫描机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

IAB (Internet Architecture Board) 因特网体系内部结构

SATAN (Security Administrator Tool for Analyzing Networks) 保安员网络分析器材(该软件原设计目的是帮助系统管理员分析网络系统的安全程度以提高网络的可靠性，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软件却被黑客们用于探查入侵目标安全防护措施中的薄弱环节，因而称为“撒旦软件”，既与发音相似，又符合文化隐喻）(曹岭岚等，2000)

上述网络系统常见语言符号可归类于观念知能范畴，语言符号约定俗成的本质使每一个符号跟同一语言内部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将这些语言符号同人们认可的某种概念联系起来，通过某种默契取代了被称谓的事物。又由于对电脑网络和社会文化及专业知识的了解，网民对所有的缩略语言符号的内涵能清楚地区别理解，达到清晰明了、简捷速成的目的。

四、网际交流语言符号的构造原则和趣味性

符号就是用一种事物来代替另外一种事物。在这里“代替”含有“替换”和“代表”的双重含义，甚至还含有用某种事物预示另一种事物的意思。符号可以最广义地理解为结构，或者说符号是各种同类结构的共同代替物。符号包括符号功能、符号形式和符号内容，而符号功能是否能实现又要取决于符号形式是否能被对方接受及符号内容是否能被对方理解。符号其实是人类彼此之间的一种约定，在这种约定中，某种物质的结构形态被约定为代表某种事物或某个抽象

概念。

网络语言符号在维持网络世界的运行的同时也在创造网络世界。它在组织事物和概念时所遵循的原则可称为双重构造原则。

第一重构造是通过抽象建立范畴,并按照级次体系安排这些范畴。世界本身并无代表复数、单数、双数、生命体、人类、质、量、领属、限定、施事、受事、及物性、颜色、亲缘关系等等范畴的客体,然而这些范畴却作为普遍成分出现在各种语言当中。虽然并非在任何语言里总是以相同的形式结构出现,它们却是一组可能出现的成分。(陈原,2000)每个成分在这个组合里都各占一席之地,而网络语言符号也能简练精确地将这些客体范畴呈现于网上。

第二重构造在语言内部实现。语言通过它完成不同层次的内部组织,结成网络整体。在词汇内部,一个符号,特别是一个语义场的所指物是靠区别鉴定的。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共时方面来看,一门语言的音位系统和语法系统都通过互动关系相联系,而这一关系跟外部现实并无对应物可言。语言作为产生意义的模式,其独立于外部现实的自主性便靠这两个系统营造起来。网络上的纯视觉文字符号在某种程度也能展现上述两种系统的构造原则。

在人类的认识发展中,不断出现了表达上和交流上的新需要促使新的符号形式的衍生,与计算机术语(geekspeak),即计算机专家在编程等过程中所用的一种特别的包含许多专门词汇的术语不同,上网者在聊天,收发电子邮件时又创造出一种由字母、短语、符号和数字等的特殊组合进行交流的语言,这不仅为信息的传递提供了新的简洁的手段,而且为思维活动的进行也提供了由下而上的更加方便操作工具,存在于人类大脑中的原有知识对于表达符号的选择作用,使得特定的符号形式与特定的知识形态之间形成了特定的联系,使不同形式的符号系统成为不同知识形态的载体。除了为实用目的而设计之外,网络语言符号另外还有一些装饰着易学,单纯,规则和合乎逻辑等优点的理想语言的浪漫主义创造,造成“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例如:

@%&$%&	Bad Words	坏词
AFAIK	As far As I know	据我所知
JASE	Just another system error	只是又一个系统故障
CUL8R	See you later	回头见
E-ME	E-mail me	(用电子函件)写信给我
FYI	For your information	供你参考
F2F	Face to face	面对面
2L8	Too late	太迟了
(G)	Grin	笑
IMHO	In my humble opinion	依鄙人之见
IYKWIM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假如你能理解我的意思
LTNC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
MYOB	Mind your own business	不要多管闲事
NRN	No reply necessary	勿需回函
O&O, OnO	Over and out	(谈话)结束了,下网了
PMFJI	Pardon me for jumping in	原谅我插一句话
SOHF	Sense of humor failure	缺少幽默感
YAWIA	You are welcome in advance	预先表示欢迎
WYSIWYG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所见即所得
ZZZ	Bored / Sleeping	厌倦了/困了

(曹岭岚等,2000)

上述例子仅为网话集的一小部分,而网络俚语词典正在网民的丰富联想和创造发明中不断扩大。这些符号获得了上网者的共识,从抽象的语言符号到具体的言语所指,作为一种契约被人学会。学会符号的过程迅速而牢靠。网民们借助诸如此类的网络语言符号进行共时网上交流,快速、便捷,将音符与字符巧妙地结合,凭借符号所创造的概念形成了一个解译性网络,代表着网络语言自身的脉络,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的文体风格,随着上网人数的增加得到了不断的补充和传播。非标准的语言在网络交流中看起来饶有风趣,相互之间都能理解对方的情感。比如,非洲的朋友在电子邮件中以某种特有的英语变体来表达对中国朋友的问候:"Hallow Mr. Wang, U OK?

I Ok now. ... I hope to visit U next trip. OK? CUL8 and good by!"如果说上述邮件为个别英语水平有限者的网上表述特色的话，那么，可口可乐公司为推销新出的产品柠檬味冰芬达所打出的广告："Tell your M8s, Fanta Tastes GR8"(告诉你的朋友们，芬达口味棒极了)，更为风趣幽默，令人回味无穷。

五、网际交流情感符号的任意性和相似性

符号作为思想的载体，外在地表达了人的思想，也是人的思想的创造活动的产物。在一个符号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是'相等'而是'对等'，即两者形成相互联合的相互关系。人的思想创造符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思想的有意识支配下，通过实践的力量创造出自然界原本不是现成存在的新的物质形式，如语言文字等；还有一种方式是将自然无相称地拿来，使其失去其原有的使用价值而被赋予只有人的思想才能把握的意义(王一川，1995)。这里是指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种情形：在语言符号里，能指与所指属"结构性关系"，这是语言；而在非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属"联想式整体"，仅仅构成符号。网络语言符号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符号载体，网络情感符号属于后者。

由于网上纯文字交流缺乏身体语言的表达，网民们又创造了网络非语言情感符号。形似的情感符号出神入化，既能反映说话者的心态和脸部表情，弥补了无法面对面交流的缺憾，又能此时无声胜有声，让话语接收者似乎能听到对方的语调。更绝的是所有的符号只需用键盘上的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的灵活组合便能准确地表达和传送各种面部表情信息，使人们在网上的交流更人格化，更富有人情味。它属于人类的符号，符合人类社会非语言交际过程中共同文化作用的形象思维，展现了无声的动姿和无声的静姿。面对冰冷的电脑键盘和屏幕，人们在相隔千万里的交流中也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产生心灵的共鸣。

情感符号(emoticons)可粗分为下列几部分：

1. 情绪部分

:—) 这是最普通的基本笑脸,通常加在句尾或文章结束的地方,表示开玩笑的意思

:—D 非常高兴地张嘴大笑

:′— 大笑

;—) 眨眼睛笑

|—D 呵呵笑

|—P 捧腹大笑

:—9 舌头舔着嘴唇地笑

|—) 笑得看不到眼睛

:—[带着吹毛求疵的嘲讽式微笑

:—] 傻笑

(;)—) 哈哈! 这是一个小蛙人,戴着潜水镜在偷笑

:—/ 犹豫不决的笑

:—% 银行家、股票玩家用的笑

:—< 难过的时候苦笑

:—O 哇......

~~:—(极度愤怒,都快要爆炸了

>:— 眉毛都竖起来了,已经快发狂、要气炸了

:~) 喜极度而泣,笑出眼泪来了

~~~~>_<~~~~ 大声哭,用力哭

(:—...... 哇! 心碎

(:—& 暗示这个人正在生气

2. 状态部分

#——) 一夜没睡了,眼睛都皱成一团了

? —(被谁打了,眼圈都黑了

●_● 熬夜变成熊猫

? _? 瞪着充满疑惑的眼睛,茫然

..@_@||||.. 头昏眼花
~~~~

:—{ 抿着嘴,一副如泣如诉的神情

':—) 早上没睡好,刮胡子把眉毛剃掉了一边

(—_—) 神秘笑容(这个不需转头看)

:—#| 这张笑脸上有着浓密的胡须

:—/ 犹豫不决的笑容

:—1 平淡无味的笑

:—6 刚吃了酸东西的笑容

:—{) 留着胡子的笑脸

:—j 暧昧的笑容

:—e 失望的笑容

:—\ 无奈的笑容

}:—) 翘起的头发

}(:—(戴着卷卷的假发

&:—) 头发是卷曲的

(@_@) 醉了

(:—* 暗示这个人在生病、反胃

(:—(愁眉苦脸

(:—|k— 打着领结,戴着礼帽,大概是要参加什么重要的约会

(0—— 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 抱歉,这是秘密,我答应人家不说的,我嘴巴被贴上了封条了

=^—^= 脸红什么?

(:—& 暗示这个人正在生气

:—(悲伤或者生气的脸

(^_^)? 什么意思?

>>d(' _ ')b<< 正戴着耳机听音乐

:—@ 留着络腮胡子

:—=) 留着日本式的胡子

:—<) 留着八字胡的笑容

3. 动作部分

(:ˉ(跟谁打架了，鼻子被打歪了？

^_＜ @_@ 挤眉弄眼

:—q 正在抽烟

:—Q 吐舌头

:—x 嘴巴被封起来了

[:—) 戴着耳机在听音乐

|—(正在打坐练功

:—\ 既抛媚眼，又撇嘴角

＞—r 哈！扮鬼脸

⊙.⊙ 睁着眼睛看着你

\(^o^)/ 举手欢呼

p(^o^)q 双手握拳

＞＞@()@ 鱼儿水中游

＞＞d(' _ ')b＜＜ 带着耳机正在听音乐

4. 类型部分

^(oo)^ 猪头

^. .^ 可爱的蝙蝠

=^.^= 猫咪

！@！装死的猪仔

[:|] 机器人

*:o) 小丑

3:=9 哞……这是一头牛

*:o) 小丑

(:＜) 吹牛大王

*—(闭着眼睛的独眼巨人（希腊神话）

o—) 睁着眼睛的独眼巨人（希腊神话）

q“(^_^)”p 元气娃娃

{^o～o^} 老人家

^O^ 一只可爱的小猪

i—) 独具慧眼的侦探

:{ 悲伤的小朋友……

*<|:—) 圣诞老人

(:I 理论家

^—^ 快乐的人儿

(参见 NETSLANG DICTIONARY)

除此以外,在最近各国网络语言符号的变体中常见的有"数字符号",如:39 代表着英语 Thank you 在日本的发音变体 SANKYU;而 88 为全世界通用的 Bye-bye。在科技发达的日本,网际交流中出现了更多的在原有网络语言符号基础上的网络符号升级变体,如:在 :—)表示微笑的基础上出现了;—)表示皱眉头;高兴的符号(^^)逐渐升级为很高兴,(^—^),非常高兴(^O^)直至 高兴极了(*^o^*)和胜利者的得意 (^o^)V;而表示尴尬流汗则为(^^;);道歉 m(_ _)m 似乎有点有口难言之意;悲哀者哭丧着脸显示着(T_T);受惊吓后不知所措整张脸就是一个(@ @)(Tan Kawa,2000)。这些新变体更栩栩如生,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上网者所喜爱,符合人类文化共性。有时网络话语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在因特网世界之外的社会里人们交流的信息的载体,如微笑':—)'符号创始于网络,但现在常在书面信件中出现表示幽默或开心,通常加在句尾或文章结束的地方或表示开玩笑的意思。

无论是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都有其任意性和相似性。说任意,这只是因为网络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约定俗成,但"不是任何个人能随心所欲自行决定的,它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并经过时间的检验而得到固定,在使用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朱永生,2002);说相似,那更因为网络情感符号在书面符号形状与社会文化意义之间建立起的某种自然联系使得整个网络语言符号让人觉得形似神似,过目难忘,这正是网络语言符号系统生机勃勃的原因所在。

六、结语

人类的符号承继了自然结构及植物、动物的符号，人类在客观条件和主观愿望的允许或驱使下，又借用或创造了更多更准更有效的符号。符号活动是指意义的产生、传达和阐释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任何符号，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都可以进入包罗万象的因特网络，网络语言符号在维持网络世界的运行的同时也在创造网络世界。目前，网络语言符号主要为普通网民快速交流信息所用，而非各专业领域发布高科技信息的媒介载体；但肯定的是，随着因特网上的交流越来越发展，更多的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将进入网络，人们在不断的使用中也会创造出更多更新的网络语言符号以满足社会和科技不断发展的要求。

(1) 符号类型的更替和增加反映着人类认识层次上的跃迁和演变。

(2) 符号数量的增加反映着人类认识总和、知识总量的不断增加。人们借助已有的符号进行认识活动，当他们把握了新的对象，作出了新的认识、而已有的符号又不能精炼地表达时，就会创造(即约定)新的符号来指称新把握的对象。随着人类所把握的新对象越来越多，人类符号总量的数目也必然越来越大，反映着人类所积累的知识越来越多。在科技发达的民族中，词汇量越来越多，科学符号层出不穷，是知识膨胀、信息爆炸的一个重要表现。

(3) 对已有的符号意义进行修正、改变，用新的意义去代替旧的意义反映着人的知识更加全面、正确和完善。(肖峰，1989)

人们所接受的信息往往需要重新表达出来，这种需要导致了人类符号的诞生和发展。在因特网上表现为吸收信息方所能接受的并理解的方式就是网络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符号应该准确或真实地传递信息。任何一种行业，任何一门学科都使用着大量的专用标志或符号。目前，网络语言符号主要为普通网民快速交流信息所用，而非各专业领域发布高科技信息之媒介载体；但肯定的是，随着因特

网上的交流越来越发展，更多的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将进入网络，人们在不断的使用中也会创造出更多更新的网络语言符号以满足社会和科技不断发展的要求。

目前，这种网络语言符号特色现象也成为语言研究者和社会问题研究者的争论热点：网络语言究竟是特定文化氛围中语言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创新思维之表现，还是对标准化语言的随意降格、胡编乱造、甚至可能导致未来的语言文字混乱不堪的严重后果？然而，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多元化的社会里多元化语言符号的出现也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必然结果。总的来说，网络语言符号是人类"跟着感觉走"与"跟着理智走"的结合，是典型的文学与科学的融会，是抽象的理性思维与艺术的形象思维的合作，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历史悠久的语言符号的共鸣，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符号美学的组合在因特网将全球的网民联结的工具。肯定的是，随着网络世界的扩大，在不经意中，更多更生动的符号将传递人类更丰富的情感色彩，将为语言符号领域展现一道更靓丽的风景线，也将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一个有趣的实验基地。

参考文献

[1] Claude Hagège 著，张祖建译. 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学科的影响. 北京：三联书店，1999

[2] 曹岭岚等. 英汉因特网常用词汇手册.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3] 陈原. 社会语言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4] 顾佩娅等. 漫游 INTERNET 英语世界.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5] Miki Tankawa "In Japan, (* ^o^ *) Means Happines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May 9,2000

[6] Netslang Dictionary from Yahoo. com

[7] 王红旗. 生活中的神秘符号.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8] 王一川. 语言乌托邦——20 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9] 肖峰. 从哲学看符号.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0] 朱永生. 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相似性.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1)

Linguistic Symbols in Internet Communication: Lingua Franca for Netizen?

Jiang Ji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net language is growing fast to mee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netizen from different ranks and societies. Internet language variety can be called lingua franca in the net world. 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cultural significance, studies its applications, and probes its 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s in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

Key words Internet; net communication; language variety

医生语言——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突破

姜 瑾

摘　要　医生语言是一种相当特殊和非常艺术的语言表达,是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言语行为。对医生语言的研究不仅是对医患之间实际使用的语言的描述,也是对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实际使用过程的解释,涉及到心理、生理、医学、社会学及哲学等学科,是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新突破。本文论述了医生语言的跨学科特点,探讨了在医院内有声语言、无声语言和书面语言的修养内涵,概述了医患晤谈中的语言学理论的临床应用,并分析了医生语言和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医生语言艺术应该与医疗技术一样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的结论。

关键词　医生语言,跨学科交叉研究,社会文化

一、总论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无处不用的交际工具,其价值已远远超过本身的纯交际功能。人类特有的语言信息系统被成功地应用到各个科研领域为现代科学服务,在科学整体化、抽象化、物化、社会化的今天所起的辅助、促进、甚至基点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因此,除语言学家探讨语言外,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人员也从各自最感兴趣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语言,探讨语言现象。从语言学和社会文化学角度对医生语言的研究可以说是

跨学科交叉研究的一个新突破。

二、医生语言的跨学科性

医生语言是一种相当特殊和非常艺术的语言表达，是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言语行为。医生的语言艺术在新医学模式中的功能之一是针对病人的心理和社会特点，通过语言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来说服病人，帮助病人提高与自身疾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同时医生语言也是治疗的中介手段，是诊断处理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医德机制在医疗过程中的最佳实现。因而，医生语言有其跨学科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医生语言的研究不仅是对医患之间实际使用的语言的描述，也是对语言学理论在语言实际使用过程的解释。在解释过程中涉及到心理、生理、医学、社会学及哲学等学科。

语言是个魔方，在当今注重医患关系及医学模式的转换时期，医生语言魔方组合得当发挥其黏合作用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医院这一特定环境中，尽管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物理、生化辅助诊断手段日趋先进，但诊断和治疗的基础仍为晤谈，即医患门诊会话。它能在医患之间确立起合作关系，探查出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所查不出的问题，也能治疗许多昂贵药物治不好的心理疾病。医生语言体现了医疗职业道德，显示了医生个人的素质修养，反映了医务界的精神文明程度，是医疗中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医生的精神世界、知识水平、道德情操、为人处世等方面的素质与修养，甚至也可以看到整个医务界的医疗准则，医生语言修养是医生在长期的勤奋学习、认真的社会实践及艰苦的自我陶冶、磨砺中不断提高、不断完善的过程。与诊治、手术的技能一样，医生语言修养是一个医生职业生涯成功与否的基本保证之一。

最近二十多年来，语言界、医学界及医德伦理研究者通过研究论证，认为医患之间语言交际成功与否也是衡量一个医师业务能力的一个方面，是治疗的基础。1989 年 3 月世界卫生组织医学教育联合会在其福冈宣言中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技

巧。缺少共鸣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的表现。医生必须理解什么是病人。在医疗实践中必须充分重视病人的感情。要掌握这些，应当在整个训练期间，甚至过了训练期间还必须继续下去。”现在国外许多医学院已开设医患晤谈训练课程。在中国这一议题也被列人现代行为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的一个章节，越来越受到重视。医患晤谈中由于医生的主导角色，对于病人的康复和医疗费用的减少等方面，医生的语言艺术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医生语言修养三要素

医生语言修养需要三个方面的陶冶，即有声语言、无声语言和书面语言。有声语言即言谈，主要指医生与病人在门诊晤谈中如何运用语言艺术来探查问题和解决问题，也是医生与医生之间，医生与护士之间的语言交际，还包括医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国际国内同行介绍时的口头表达；无声语言即体语，是指医务人员接触病人时的举止行为以及表情衣着等等；书面语言包括医生所写出的病史病历，诊断、鉴定证明，处方等文字记录，也包括关于医学方面的来往信件、医学论文等等。这一切，是医生除医疗技术外的人文素质对外展现的一个重要部分。

1. 有声语言

在与病人的交流过程中，医生语言任务及要求可归纳为如下七点：

(1) 医生语言必须符合病人的需求，并能启发病人谈出内心对疾病的感受，同时通过语言交流使医生掌握所需的病人病情的第一手资料；

(2) 医生语言必须显示医生的专家职业水平和独到的洞察力，通过观察，医生要了解并能解释清楚病人的疾病起因及目前身体状况；

(3) 医生语言必须表示出对病人体质状况和精神状况与工作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之关系的理解与尊重；

(4) 医生语言必须尽可能地扩大专家鉴定的作用,即尽可能详细地解释诊断的结果,让病人接受所作出的医疗决定;

(5) 医生语言应该致力于表达情感内涵,力求与病人产生心灵的共鸣;

(6) 医生语言必须公开地反映出互惠互利、互相平等的原则,从而在病人感到民主、平等和受尊重的前提下,使晤谈朝着实现双方共同期望的方向发展;

(7) 医生语言应该帮助晤谈双方克服固定框架模式的角色,以使晤谈双方都有一种权利感和自由感来感受和体会那种特殊的交流与沟通。

由于医生语言的特殊性,病人听后会掂量一番,因此会不同程度地引起病人的反应,使之发生微妙的心理变化以至于影响病情的发展。只有医学科学方面准确无误的语言才能显示其真诚和严谨,向病人提供一种语言行为的保证,使病人产生信任、尊重甚至依托感而更愿意合作。医生语言要简洁明了,这是职业需要。用简明的语言引导晤谈方向,解释病情事实,做好思想工作并有效地利用时间,是语言艺术在医疗过程中的具体展现。恰到好处的医生语言能帮助病人理清由于病痛而引起的复杂纷乱的思绪,使病人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有个清楚的了解。反之,吞吞吐吐的语言表现优柔寡断的迹象,使病人不仅怀疑诊断的正确性,也怀疑医生的业务能力。再则,医生语言必须感情丰富,要富有感染性,用词妥当。医生语音的变化,语调的高低,都能向病人体现医生的职业能力和道德修养。医生说话时温和恳切,柔顺悦耳的语气会使病人觉得温暖亲切,从中得到说服、开导、安慰和鼓励,会对病人的身心康复起到药物所起不到的作用。

除了在与病人交谈过程中的语言外,医生还必须在与同行及护士的交谈中注意用词庄重、严谨、言辞有度,充分显示自己专业形象,拥有的良好教育、语言修养及儒雅风度。在将自己的医疗研究成果向国内国外同行介绍时,更需要对语言进行推敲,斟词酌句,同时不失机灵幽默,不但将成果向外推广,而且用语言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一

个内涵丰富的高大形象。

2. 无声语言

医生的仪表、举止、表情、手势等均对病人心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仪表是一个人的外部形象，是人的容貌，衣着、举止和表情的统一，但它绝不是孤立存在的外部因素，而与人的思想、品德、学识等有极密切的关联，是人的精神面貌的体现。医生职业在人们心目中是很高尚的，医生理应端庄整洁、表情和善、态度从容。这是一种职业形象。仪表美具有感染力，能给交往中的对方舒畅、亲切和明快之感。医生的举手投足间大有学问。服装整洁体现了人的文化素养；表情亲切体现了医生对病人的体贴安慰；举止端庄是一种人格的自我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在医生和病人初见面时，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点一下头甚至坐的位置身姿均可作为建立医患关系的表示，能鼓励病人畅所欲言，为准确的诊断和完善的治疗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样，急诊室里医生全身心的投入，干净利落的处理，有条不紊的安排能使病人家属和尚清醒的病人产生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儿童医院护士服装由白色改成粉红与淡绿就显示了希望、生命、温暖与勇气。

3. 书面语言

书面语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语言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而留下的永久性的痕迹，也是自古以来医疗实践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医生的书面语要求非同一般的文字书写，有其鲜明特点和特殊要求。它要求医生语言不仅要符合文字书写的统一化和规范化，还要符合医学的科学性。医生所用的书面语种类繁多，临床上主要有各种应用文书，包括病历、病程记录、手术记录、会诊记录、转科记录、出院记录、死亡记录以及各种护理记录，各种各类检查的报告、记录等。尽管这一切都是实事求是的记录，但遣词造句同样需要技巧。病案记录上任何一个微小的误差都

可能给诊断和治疗带来不利因素，甚至导致错综复杂的医疗纠纷，酿成无可挽回的经济损失及社会负面影响。因此，医生的临床书面语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字迹清晰，一目了然，符合规范和标准。用目前流行的术语来讲，提高病案书写质量，能加强医院医疗质量的管理，提高诊断水平和治疗效果。

除临床书面语以外，医生还应在医学学术文献的书写方面有所造诣，主要体现在医学论文的写作。医学论文是医学科研成果的真实记录，是医学知识宝库的无价之宝，是贮存的信息，也是交流的内容。因此，它必须符合格式，行文流畅，措辞严谨。除了大量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外，医生还必须善于学习、勤于积累，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

四、医患晤谈中的语言学理论的临床应用

从言语行为方面来看，医患晤谈有其本身的特点，它既属于即兴的谈话，也属于有目的的交谈，次序不是特别严谨，话题也不特别突出，然而总是围绕着某个主题，按照一定的模式进行。双方的言语均表示行为，包括询问、倾听、回答、澄清、解释、评论、陈述、引证、描述、断言、要求、确信、保证、同意、反对、批评、警告、预言、暗示甚至寒暄、道谢等等。其中的内涵到外延，表层结构到深层含意，都会产生医患关系的建立和维持过程中对双方心理的影响。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医患之间的会话与社会上的普通会话有共同之处，也有其本身的特点。它不是一般的随意交流思想感情或信息，主要是医患间通过交换有关疾病方面的信息以达到找出治疗疾病的方法与措施的目的。这是一个探查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何人、在何时、为何目的、对何人、说什么、怎样说”是非常重要的。医生的话对病人的心理影响乃至所产生的对生理机制的调节至关重要；同时，病人的话也对医生作出正确诊断以及制订治疗方案有不可缺少的帮助。

语用学理论中的会话原则，尤其是“合作原则”在医患晤谈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著名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指出，为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谈话双方必须遵守会话基本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它包括四条准则，即量准则、质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按常理，谈话的双方必须遵循这四条准则才能产生会话含意，保证会话的连续性和目标的一致性。然而医患双方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违反其中的某条准则，而这种违反不但没有破坏会话的延续性和一致性，反而产生了更高一层的会话含意。病人的心理、年龄以及性别都与其量准则的遵守与违反有关，而中国传统医德概念使医生对质准则的故意违反达到了遵守保密原则并争取病人树立信心配合治疗的目的。医患之间所有的言语或非言语行为都与探查疾病这一主题相关联，同时，医生简洁明了、具体生动的比喻解释是对方式准则的遵循。因此，在规约性共选话题主旨下，对四条准则的顾此失彼现象显示了医患晤谈这一会话的特殊性，而深层的进一步合作又体现了它的自然会话的共性。语用学中另一会话原则“礼貌原则”在医患晤谈中体现不多，因为与社交会话不同，医患之间不需要使用更多的社交辞令和方式来谈话，双方需要的是科学的态度及坦诚相见。

医患晤谈是个双向的交流过程，是诊治中双方的互相表露和感知，它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整个晤谈过程中，病人和医生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这两种角色理应相互配合，以成功完成交际。但由于医生往往侧重于科学和事实方面去理解病人提供的感受信息，较少注意病人的情感，加之病人由于病魔缠身，求治心切，常常情感重于理智、愿望脱离实际，较少考虑医学科学的要求，因此容易引起交往障碍。语言中的“权威影响”可能会导致双方角色的冲突，也可以使双方相互配合。然而，医生和病人基本上处于一个文化价值观大致相同的社会，对于各种事件有相似的认识评价方式或彼此能了解对方的评价方式，从而能了解对方的情绪体验，这是医患晤谈的共同基础，再加上双方的共同目标是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医生的专家权威职业责任及职业道德感的外因作用于病人依赖求助心理这一内因，会使双方的矛盾冲突通过语言艺术这一媒介达

到新的统一。

医患晤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医患关系的改进也是个值得教与学的内容。对医患晤谈的研究是临床医学和语言学结合的产物，它与社会学、心理学、医学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有着多元的密切关系。它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语言普通规则的应用，考察了语言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功能；而这方面的知识又可用来进一步拓宽语言学领域，建立更多的学科分支；也可使医学教育和实践更加提高层次，用来测试一个医务工作者的知识、技术、交际能力和整体水平。

五、医生语言与社会文化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其表现形式无时无刻不受存在于语言系统之外的社会诸要素的制约，同时反过来它也影响着社会诸要素。医生语言与社会文化中的许多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永远相互影响，相互推进。

1. 医生语言所涉及的文化群体

对不同职业的病人，医生措辞相对不同。对知识型的病人如教师、机关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等，医生一般用词庄重、严谨、条理分明、言辞有度、语义准确、简明扼要，言谈中充分显示自己专家职业所拥有的良好教育、语言修养及儒雅风度，给病人留下医术高、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印象。由于知识分子忍耐力较差而且心理反应颇为敏感，并且不同程度地了解一些医学和卫生保健知识，除了主诉症状外，还会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含蓄委婉地表达一定的看法，对医生的诊断、医嘱或治疗计划颇有独到见解并会提出疑问，医生必须在言谈中多尊重一些病人对诊断和治疗的观点、见解，在与病人一起分析讨论的过程中适当地采用一些医学术语和科学理论以争取病人的信服，应尽量解释清楚病情，从而达到医患间在执行治疗方案时的最大配合。在中国，一般传统做法是医生为了患者的利益有意识地隐瞒较严重的病情，但出于敏感心理，知识型病人会对医生的话将信将疑，从而自己去寻求另外的结论，这样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如果能因人而异，

充分理解病人理智的要求与情感的拒绝的矛盾心态，逐步讲清道理，使病人理智豁达地正视现实，科学地看待病情，增加心理承受能力，会赢得更多的信任、参与和配合。这样做可能有悖于中国多年来的传统医德观念，但只要充分施展语言艺术的魅力，就能缩短病人异常心理阶段的时间，这样，在医生语言社会化方面就会与世界接轨。

对于体力劳动者，特别是下岗工人、农民或边远地区慕名而来的求医者，医生语言首先要表达的是尊重、关心和理解，措辞尽可能简单清晰、通俗朴实，甚至口语化，语气要坦诚、亲切、和蔼、友好，切忌咬文嚼字、态度冷淡、出言无礼或使用高深莫测的术语和理论，使病人堕人云里雾里，不知所措。由于这类病人有吃苦耐劳精神，对小毛病不太在意，他们往往觉得已有大病，希望得到明确的诊断和及时的治疗。他们大都信任医生，乐意按医嘱行事，虽没有知识分子那么敏感，但也受不了傲慢无礼的态度及突然的沉重打击，他们更因为经济的拮据而不希望承受昂贵的医疗费用。这时医生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通俗易懂地解释病情，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告诉病人自己将努力采取高效廉价的治疗方法，因为医生的话不仅会对病人产生心理、生理的影响，而且会给他们的家庭及所在社区的人留下深刻的甚至永久的印象。对于真正患了严重疾病的病人而不能直言相告的，应遵循中国传统医德，在保密中争取更大的配合治疗。

2. 医生语言针对的不同年龄层次

就诊者可粗分为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医生语言艺术中应对不同年龄层次的病人有较强的针对性。

少儿患病时父母只能悉心照料而无法清醒地面对现实，往往惊慌失措无所适从，因此，医生语言要具有教育孩子、宽慰家长的功能。医生的态度应该和蔼可亲、不厌其烦、风趣幽默，让孩子觉得医生可亲、可敬、可近。在解释病情和说服敦促时应多用一些形象化的比喻，接近他们生活色彩的例子以及孩子所喜爱的人物、动物或事物作参照，还需要用一些孩子爱听的赞美语言来鼓励他们树立起接受治疗的勇气，切忌严厉的责备或吓唬。

青年在就医人群中属少数。一般他们对小病满不在乎，不到“万不得已”不求医，容易有焦躁厌烦心理，喜欢干净利落、速战速决。因此医生语言应适应他们的性格特点，简洁创新，符合社会节奏。

中年人是社会上责任最大、负担最重的一个群体，他们最希望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和健康的体魄去担负起家庭与社会的重任，同时他们也深感“人到中年”，健康在走下坡路，一旦觉得不适，其心理压力就会较重，并且对医生所说的话特别注意、敏感，常常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猜测捕捉医生话语间的隐含语义，有时甚至心烦意乱，自控能力减弱，讲话时带有一腔怨气。医生讲话时必须斟词酌句、含蓄婉转、善解人意、体贴中肯、尊重病人、以理服人，施展自己医疗水平的同时显示自己的气度涵养，使病人信服，并畅所欲言自身对疾病的感受和体会。

老年病人数量最多，他们有很多空余时间，看病所花的时间也最长。一张“老人用药调查问卷”显示，大多数老人认为自己有病，略感不适就会求医问药，他们希望医生能认真仔细地和他们交谈有关疾病的问题，分析探讨治疗方案及药物作用。能达到情绪上的共鸣、话语的投机及思维的统一的交谈能使他们觉得心情愉悦乃至使其病情减轻。针对老年病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医生语言要符合中国的传统美德，语气中显示尊敬、关心、理解和体贴，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耐心地解释问题，使晤谈在和谐、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切忌不耐烦的神情和指责、以权势压人的口吻。同时医生必须掌握好时间，在基本上掌握了病情、解释清楚和确定了治疗方案后，要在恰到好处的时机用使病人能够接受的语言来结束晤谈。这样，老人离开诊室时不仅带着处方，也带着从医生语言里得到的宽慰、信心和满足感，继续“夕阳无限好”的人生旅途。

3. 医生语言应符合社会需求

医生工作涉及面极广，会涉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因此，医生语言势必不可分割地和社会方方面面的需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医生说话时是口齿清晰、词语丰富、因人而异、斯文儒雅、风趣幽默、令人

信服还是含糊不清、强词夺理、千篇一律、粗俗刺耳，不仅反映了一个医生本身的思想修养、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准，也折射出一个医院乃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人们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人们对生命质量的要求也相继提高，健康的概念远不是当年"无虚弱和躯体的生物性障碍"，而是"躯体、心理、生态和社会诸方面的完满状态"。医生语言不但能交流信息，还是探查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重要工具，更能跨行业、跨学科甚至跨文化、跨国境地协调人在社会上各种错综复杂关系中所产生的心理、生理不平衡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医疗卫生事业所起的辅助、促进及基点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六、结论

未来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心理医生，这并不意味着需要纯粹的心理科医生，而是需要各科医生将语言心理疗法有机地结合于各种医疗实践，实行治病、治人、治心一体化。因此，对现代医学教育和人才知识结构的确立和培养上应有新的要求，在医学院的课程中应开设专门的语言实验课或在专业课及公共课上增加语言交际方面的教学内容，将理科与文科有机地交叉融会。医生要在医疗实践中不断地完善医疗技术的同时，能在与形形色色的病人接触中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运用语言优势在病人面前树立良好的形象，搞好医患关系，提高治疗效果。"缺少语言能力无法与病人产生共鸣应看作和缺乏医疗技术一样，是无能的表现"。多种实例证明，良好的语言能力是医生成功之路上的重要基石，也是不断发展前进中的社会对医生的要求。

综上所述，医生语言的美学修养应该与医疗技术一样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重视。人们赞颂医生为"白衣天使"，而"天使"能给凡人带来福音，因此，人们希望从医生语言中得到"真、善、美"的含义，得到精神上的启示和道德上的熏陶，得到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及治愈疾病的保证。这样，医生就必须注意提高语言素养，讲究语言表达艺

术，使用语言时严格遵循医学和语言的规则，做到准确、明晰、得体，使病人及整个社会中各种文化群体不仅得到高明医术的恩惠，也享受到医生语言艺术的美感。

参考文献

[1] Fisher 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C]. The Center of Applied Linguistics, Prospect str. NW, 1987

[2] Leech G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

[3] Stewart M. & Roter L. *Communicating with Medical Patient*[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9

[4] 迈拉考修著，赵坤祥译. 与病人交谈的技巧[M].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0

[5] 霍仲厚. 医生心理学[M].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9

[6] 王孝军. 医生语言艺术表演[M]. 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89

Doctor's Language: A Breakthrough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Jiang Jin

Abstract Doctor's language is a very specific and special linguistic expression as well as the speech act for prob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Study on doctor's language is not only the description of its practical use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but also the explan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in the process of its application, which involves the principles such as psychology, physiology, medicine, sociology philosophy and so on. It is a breakthrough i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features in doctor's language, discusses the spoken, body and written language in the hospital context, sums up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 theories in doctor-patient conversation,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language and social culture and finally, concludes that the art of doctor's language should be regarded as important as medical knowledge.

Key words doctor's languag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social culture

医生语言修养之管见

姜 瑾

摘 要 医生语言修养的提高是一个值得教与学的内容，医生的语言功能和医患关系的改进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在文献检索和临床调查的基础上对医生语言艺术与医学模式、医生语言功能与医疗康复及语言教学与医德培养等诸方面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医生语言修养，医患关系，医德伦理

医患交往的主要桥梁是语言，这是在医疗过程中最显而易见然而又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重要事实。

许多掌握了现代科学和高超医术的医生很容易忘记语言在成功的医患交往中所起的作用，许多成长中的年轻医生没有把提高自身的语言修养列入议事日程。因此，自 1995 年始，笔者对医患之间的语言交流作了大量的研究，进行了门诊医患会话的现场录音后的定性分析，也作了调查问卷的定量分析，总结了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化过程中医生语言的重要性，探查归纳了医患交往中语言的基本规律，挖掘了语言对会话双方的心理说服作用，并证实医学院校教师帮助学生提高语言修养水平及掌握谈话技巧的必要性。

一、语言艺术与医学模式

1986 年秋季在伦敦召开了首届“医患交流国际研讨会”。在会

上，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一些国家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及医学伦理研究者就医患关系、医患交往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认为在现代科学和当代意识不断发展的今天，在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时代，通过学习实用语言，掌握必要的与病人交谈的技巧是通往成功的理想途径之一。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了医生语言艺术在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和在双方感情沟通中的重要作用。病人可能不会判断医生的技术水平，但是他们知道是否得到医生的认真倾听、理解尊重以及是否参与医疗决定。语言艺术也是在医疗中展现医德伦理标准的关键。对病人的谈话方式决定了是对病人采用“身心共治法”还是“见病不见人”的诊治方法。有效的谈话艺术使得医生能评估病人的价值观并帮助病人意识到自己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估标准，也可使病人对医生的治疗方案满意并增加医生在病人心目中的威望。

由于患者在各方面的差异，导致他们在求医动机、心理需求、健康评估及合作态度上千差万别，这时医生的语言艺术就体现在“对何人，说什么，怎样说”上。医生的话对病人的心理影响乃至所产生的对生理机制的调节至关重要，同时，病人的话也对医生作出正确诊断以及制订治疗方案有不可缺少的帮助。新医学模式的一大特点是强调病人的整体性。医生必须重视病人的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中的作用。因此，医生的语言艺术在新医学模式中的功能之一是针对病人的心理特点，通过语言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来说服病人，帮助病人提高与自身疾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同时它也是治疗的中介手段，是诊断处理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医德机制在医疗过程中的最佳实现。

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强调，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来源于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成功交流，不能只着眼于患者病情的一个侧面，而应该把患者当作一个整体，求得更广泛、更深刻的理解。在研究分析中我们发现，医生语言艺术体现在诊疗的方方面面，从询问病史到说明病情，讨论检查和治疗的方法及必要性，探讨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药剂

的成分、疗效、副作用及帮助患者作出决定，减轻患者的苦恼及不安，鼓励患者与疾病的抗争信心等。当今社会，随着人们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病人希望了解自己的真实病情，参与制订医疗计划，在治疗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医院的氛围正向“以病人为中心”的诊治方式转化，医生语言艺术也愈发显示出在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与新医学模式结合从而导致成功交流沟通的必要性。

二、语言功能与医疗康复

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有一句名言：“了解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病更为重要。”同一种疾病在不同性格、心理状态、年龄层次、社会背景的人身上其表现和感觉是不相同的。医患之间的语言沟通，不仅是单纯的信息交流，而且还包含着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生理心理学角度来看，积极的语言功能通过脑的第二信号系统活动转化为第一信号系统活动，经过信息传递，使体内有关器官功能变化，消除引起心身疾病的消极状态，将其转变为积极的情绪状态，调整病态生理障碍向健康的心身状态发展。

在实地调查分析中我们发现，在完成诊断评估和治疗干预两大任务的过程中，语言是建立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建立医患关系主要有言语和体语两种。在初见面时，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点头示意甚至坐的位置身姿均可作为建立医患关系的表示。急诊室里医生全身心的投入、干净利落的处理、有条不紊的安排，能使病人家属和尚清醒的病人产生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此时无声胜有声”，许多体语都能表达出丰富内涵。短暂的开场白，简洁的寒暄能给病人带来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进而培养了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感。反之，则可能在医患之间有一条鸿沟，导致信息交流不能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

交流信息是医患会谈的关键和核心，实际上也是维持医患关系的过程。信息交流是一个双向行为，双方在给予的同时都获得信息。

医生在听取病人谈自身疾病症状、体会中掌握了与疾病有关的资料，为下一步各种物理生化检查及诊断治疗打下基础。病人则在医生的询问、解释、说明中获得了对自身疾病的了解，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并逐步懂得怎样在生活中处理自身与疾病的关系，以及如何调节心理感受及生理机制的不平衡、不统一。询问与主诉、说明与澄清、提示与解释，不断的循环往复构成了颇具特色的语言双向交流过程，从而进入了诊断与治疗。这时，由于多种原因医生不一定向病人宣布诊断结果，但病人总希望医生明确诊断，告知实情。这就涉及到医生的语言艺术"如何谈"，"谈多少"，到底是直言不讳地告知，不厌其详地解释，还是含蓄委婉地点拨，闪烁其词地"转弯"，甚至于出于善意地"说谎"，这些要根据病人的体质和心理承受能力而定，以是否有益于病人和治疗为前提。

在制订治疗方案和医嘱这一点上，笔者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研究中心合作，将"病人决策意向调查表"和"药物使用调查表"分别在各种不同层次的人群中做了民意测试；对有效返回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多数病人的心愿都是想与医生商讨后再一起作医疗决定，并希望医生多谈一些病情的起因发展、解释治疗方案及药物的使用等情况，以使病人对自己所用的药物的成分、功能、主治、效应及副作用等有所了解，同时他们也将愿意自身对药物的适应性告知医生以便做适当的调整。对于"医生凭经验开处方，病人糊里糊涂吃药"的盲目遵从医学权威表示不满，显示了他们主动参与的心愿，也表达了他们希望医生"体谅病人的苦衷，了解病人的心境，治病治心治人"的要求。

总之，在语言的分析、疏导、释放、宣泄过程中，病人能改变思维方式，走出失助无望的感觉，向有信心、不向命运低头、坚强战胜疾病和战胜恶劣处境及心境的意念方面发展，使身心处于良性状态，达到康复的目的。许多医生不仅诊断出病人的疾病，而且还在更深层次上了解乃至理解患者。除了惯例问答和从病理角度来解释病情外，还在语言交流中进入病人的内心世界，鼓励他们畅所欲言，从而了解

患者的身心体验、恐惧焦虑及盼望期待等。语言交流中蕴含着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尊重与同情、宣泄与安抚、鼓励与期待，说服与开导、暗示与影响等，从中显示了语言功能在医疗康复中的巨大积极作用。

三、语言教学与医德培养

1989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医学教育联合会在其福冈宣言中指出，"所有的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共鸣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的表现"。医生的语言有其道德规范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除医疗技术外，医生语言也是医德医风的具体表现之一。因此，未来的医生在医学院的学习阶段，在打好医学基础的同时，也应该接受必要的语言规范方面的教育及语言修养方面的培养以展示其良好的医德风范。

据文献记载，在国外许多医学院校已专门开设语言训练课程。从1977年起，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Labov)和范舍尔(Fanshel)就开始着手研究医生和病人的语言感受能力；英国医学教学家斯格费尔德(Schofield)博士构设了实习医生语言交流训练课程的框架结构和评估设想，并且进行了具体实施和追踪调查研究；加拿大医学教育家兼心理学家柯尔兹(Kurts)在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医患交流技巧教育进行研究后从理论到实践上对这些国家实施的医生语言教学课程作了改进；美国医学博士，医生语言教育专职教授史密斯(Smith)多年来一直在美国和香港从事医患关系研究和医生语言教学，在语言实验室中专门开辟或成立了医生语言实验专项，让医学生和实习医生能有机会接触病人后将现场录像递回到语言实验室进行分析研究，经过实践一反馈一研究一提高一再实践的不断循环往复，逐步提高医学生的语言表达和语言说服力；国内著名语言学家王德春教授致力于社会语言学研究，并将医患对话放入此范畴研究；青年语言学者王孝军在1989年就提出了建立"医生语言学"这一边缘学科的设想。在中国，对医学学生的语言医德教育已被列入现代行为

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的一个章节。因此，对未来的医生进行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和语言艺术修养的指导是医学院各科教师义不容辞的任务。

虽然国内许多医学院尚无条件建立医生语言实验室，但作为语言教师，在语言教学共核高级阶段可以有意识地抽一定时间灌输培养语言实际应用能力。从语音、词汇、语法、书写、语义等方面进行规范性教育，要求学生口齿清晰、准确明了、通俗易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在讲话态度、语音语调，措辞用句等方面给予一定的指导，从语言的"合作原则"、"礼貌原则"等语用学及社会语言学理论出发，要求学生既要讲文明礼貌、温文尔雅显示自己的良好医德修养，也要稳妥贴切，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体现自己的业务水平和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使病人感到医生既温暖亲切又可信可靠。在了解语言共性的前提下注意语言的个性，对不同的医疗对象用不同的方式进行交谈，与直率的、内向的、年老的、年轻的、文化层次较低的、文化层次较高的，甚至男性、女性，在交谈时都应有所区别，这也涉及到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这是一种多边缘交叉的学习和研究。总之，在医学院对学生的语言教学中结合医德培养，能对未来医生良好医德医风的形成打下一个基础。在基础医学教学中，语言能力和语言艺术的培养决不能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在掌握精湛医疗技术的同时拥有良好的语言修养及高尚的伦理道德情操是一个优秀医生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

四、结论

在医院这一特定环境中，尽管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进步发展日新月异，各种物理、生化辅助诊断手段日趋先进，但医疗基础仍为语言交流。因此，医生语言修养的提高是一个值得教与学的内容，医生的语言功能和医患关系的改进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它是对医生职业语言对特殊群体（病人）在特定语境（医院）里所产生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各方面效应提出更高的要求。一名具有现代医学意识的

医务工作者，除应该不断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言语交际能力，以适应新形势对医务工作者医德和医术的全面要求。

参考文献

[1] Fisher 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C]. The Center of Applied Linguistics, Prospect str. NW, 1987

[2] Stewat M. *Communicating with Medical Patient*[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Inc, 1988

[3] 王孝军. 医生语言艺术[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4] 迈拉考修著，赵坤祥译. 与病人交谈的技巧[M].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1990

Doctor's Language Competence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Jiang Ji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some intricacie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language use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some recorded examples and the data of two questionnaires. Doctors should be good communicators by means of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language use.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to patient provides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and consequently leads to successfu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us, doctor's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tool

in prescription, a therapeutic agent in and of itself, the mechanism for implementing the most positive values for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a realization of high medical ethics. Every medical student must learn it well from the beginning.

Key words Language competence; health communication; medical ethics

医患晤谈中角色的冲突与和谐

姜　瑾

摘　要　医患晤谈是一种以治疗为目的所进行的语言双向交流。在医患晤谈中双方由于角色任务的不同经常产生某种思维方式和内容表达上的冲突，但通过在晤谈中相互了解达到相互信任及和谐合作并最终完成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任务。本文探索了医生的专家角色和病人的求医角色之间的不同之点，进行了不同角色间冲突的原因分析，详论了医患晤谈中合作原则的体现，并指出了医患关系的和谐对于“以病人为中心”的新医疗模式实施的重要性。

关键词　医患晤谈，角色，冲突，合作，和谐

一、引言

本文所指的医患晤谈是医生和患者之间以治疗为目的而进行的会谈。医患晤谈是一种语言双向交流，医生和病人带着各自的经验、经历、期望和情感进入一个共同语境，开始了相互表露和感知的过程。在言语间不时地有着由于双方不同角色任务所导致的矛盾冲突，同时双方也在不断地努力沟通以达到相互信任及和谐合作，使谈话朝着双方均能接受的目标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医患双方承担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在相互配合中完成了交流并达到沟通。笔者通过一年多在各大医院门诊科室进行晤谈实地录音并进行定性分析，对医患晤谈中双方角色的冲突与和谐的矛盾辩证关系有了初步的认识，

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医生的专家角色

医生的专家角色意味着能胜任本领域的工作，具有责任感和权威性。医生的任务是双方面的，即查出疾病及了解病人。在语言交流中，医生必须完成下列任务：

(1) 弄清病人的主要症状和体征；

(2) 查出社会因素对病人身心的影响；

(3) 处理好与各种不同性格表现病人的关系；

(4) 创造相互配合的和谐气氛以达到双方均满意的诊治效果；

(5) 有效地掌握时间。

要完成这一系列任务，首先要懂得怎样认真倾听病人的主诉。在这一晤谈语境中，听是说的前提，医生所需要的信息来自于倾听病人的诉说，因为病人是症状的亲身体验者和直接受害者，他们所谈的是医生继续提问的基础，也是诊断治疗依据的第一手资料。病人能否积极地、全面地、如实地讲述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与医生的倾听方式有关。因此，在晤谈中医生必须通过谈话进入病人的内心世界，在倾听病人的"心声"的同时，引导病人敞开心扉，畅所欲言。进入病人的内心世界是一门高深的听说艺术，需要丰富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合作处世方面的技巧，也需要真诚、耐心、理解、同情及方方面面的知识经验。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医生不重视晤谈的作用，似听非听，面无悦色，不正眼瞧病人，这些都挫伤了病人的讲话积极性，由于忽视了病人的心理需求，其结果是无法建立和谐的关系，无法进行语言交流，弄得病人欲言又止，满怀希望就诊，怏怏失望而去；同时医生也不能得到与疾病有关的重要信息。所谓"病人怕医生"，不是怕检查吃药注射或手术，而是怕医生那种冷冰冰的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相反，有的医生全神贯注听对方主诉，不时地以视力接触以示重视；点头再加"嗯"声以示理解；认真记录以示尊重病人的谈话价值；适当

地插话表示探究、鼓励、同情；在主要问题谈得差不多而不允许长谈的前提下以适当的方式开始提问或拿起听诊器开始检查以示病人结束主诉。

其次是善于提问。提问一般用的是"开放性"方式，将询问病史当作见疑、质疑、解疑的过程，有针对性地既要问出病人想讲的事，也要循循善诱，让病人谈出偶尔发现但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这些细节可能正是疾病诊断的关键。一些听起来似乎远离主题的询问往往是一步步进入中心的途径。

医生的专家角色要求医生不但掌握精湛的医疗技术，也学会使用语言的艺术性，再具专业权威的医生对病人也很少直接使用医学专业术语来解释病人心目中的病情概念。通俗易懂、形象化的比喻和阐述会使医患关系和谐，简洁明了的线条勾画会使病人对自身的发病机制有初步直观的印象。一般医生都能讲普通话，也会一点或能听懂几种方言，因为病人用方言能把症状体验描述得更清楚，同时医生也更能赢得病人的信任与合作。

三、病人的求医角色

病人的求医角色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对疾病的反应模式，正相反，个体在患病时反应差异极大，这与病人的心理状态及社会背景关系密切，这些能在晤谈中通过病人的自述表达出来。在对客观症状的描述中他们带有主观愿望、看法、恐惧及提示等。

为了用词简单，求医者一般都被称为"病人"或"患者"，但并非所有求医者都患有疾病。对一般人来说，疾病是同一概念，但对病体来说是两码事。医生诊断出的疾病用病理、生理的术语解释就是"组织器官结构和功能的异常"，也称为"器质性疾病"，就像机器某个部件出了毛病；而求医者常称的"病"是对身体某一部位感到不适的经历、体会或感受。这两种情况不一定总是同时存在。有些患有疾病未经诊断的病人可能不感到有任何不健康的、不适的感觉，但有些忧虑重重、焦急万分的病人可能感到有病却未患任何疾病。即使疾病存在

于体内，不同病人对同一疾病的经历感受及症状的描述也不可能是相似或准确详尽的，多多少少都会渗入一些主观因素。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些病人希望医生作出无器质性疾病的诊断而故意轻描淡写；也有的病人把自己的期望渗入主诉，甚至在语调中强调某点以引起医生重视，从而想把医生的假设思路引向自己早有的臆断；也有些病人精神紧张、小题大做，他们主要受心理因素支配想引起社会、亲友和周围人的关注或总是摆脱不了有病的感觉。

总之，病人的内心世界是矛盾复杂的，病人的求医角色也是各具特性的。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期望，无论何种心理状态，归根结底，他们还是想求得医生的帮助。如果医生和病人没有在疾病的本质问题上达到某种共识，就无法制订双方能共同接受的治疗计划，这样专家角色与求医角色之间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

四、不同角色间冲突的原因分析

医患晤谈可视为两种不同思维系统内含义的冲突，即现实世界中在基本常识指导下的感性认识的自然观点与在抽象精练逻辑理性引导下对客观世界科学认知的态度之间的矛盾。通过晤谈中不断的冲突，渐渐达到和谐统一，达到相互认同，这需要医生专家角色的语言艺术，也需要求医角色的配合服从，更需要双方的沟通理解。

由于病人求医时的内心压力、孤独感、恐惧感和自卑感，病人的依赖性特别强，因此角色的对话中就出现了权势地位的影响及语言的冲突，主要表现为：

(1) 病人寻找权威人士告诉他们是什么疾病，怎样处理，但医生需要与病人平等商讨后再作医疗决定，并在实践中弄清疾病性质。

(2) 相反的情况同样存在。病人希望平等地与医生讨论疾病，而医生处处显示自身的职业优越感，滥用“权威”地位，挫伤病人情感，居高临下地对待求医角色。

(3) 病人渴望倾诉感受寻得心理上的依托，但医生只是从生物角度去运用医疗技术判断诊治。

(4) 医生想用“身心共治法”将病人作整体的了解,而病人只是寻求医生技术上的帮助。

这些冲突首先来自于病人的期望目的和医生对这些需求的评估以及是否愿意或能够达成这些愿望。在门诊中我们发现,有些病人想要“诊断明确,药到病除”,而医生则认为病因复杂,不能草率定论,药物效应因人而异、无法迅速体现,只有在治疗过程中边观察边下结论。有些病人的生活环境和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希望诊断的结果两样或不需要医生为他所作出的医疗决定,而医生的业务知识和临床经验使他采取“临床超然”态度,按科学方法处理,虽然医生做事果断、讲话有效,但病人感到其冷漠、缺乏人情味;还有一些患者喜欢用一些学到的一知半解的术语来证实自身疾病的存在,认为只有吃药、注射、手术才能治疗,而医生则认为这是社会或生活压力再加上心理紧张而出现的疾病假象而非病理原因的症状。

其次是病人的语言表达由于角色地位相对较低而受阻。由于病人面临着未知,常常从严重处去考虑自己的病情,处理对生活的影响,恐惧使他们无法描述清楚症状和起因。另外,从传统上来讲,病人角色处于被动地位,他们不一定谈出全部看法,他们唯恐在医生面前说话太愚蠢或给医生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或引起医生反感;更有些病人的情感因素非常复杂,难以解释,甚至只是有某种潜意识,而医生只是利用逻辑思维推断,不去发掘病人的意图,不想或不愿深入了解,无法进入病人的内心世界,只是根据先前病例的框架制订治疗方案。结果形成了病人未能主诉清楚,医生只注意病变部位、依赖设备,舍去了病情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将自然的人与社会的、心理的、有思想的人分离开来。虽然病人内心有着特定的信念观点,但是被动依赖的角色地位使他们暂时屈服于医生的专家权威,而在事后治疗中不配合或去寻找他们心目中更能认可的不同的治疗方案。

五、医患晤谈中会话合作原则的体现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指出,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谈话双

方必须共同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特别是“合作原则”。然而在医院这一特殊语境中,在遵循合作原则的同时,医患晤谈双方往往会故意或不自觉地违反合作原则中的某些准则以避免双方从各自不同角色出发造成所表达的观点的矛盾冲突。从“会话含意”角度来看,这种违反在某种程度上会达到更高一层次的合作,因此,医患话语中合作原则也体现为对量准则、质准则、关联准则和方式准则的遵循与违反。在医院实地录音调查并进行定性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同科室,不同病例,甚至不同性别与不同年龄的晤谈双方侧重点各有不同,有意无意地顾此失彼的情况也会出现。

按正常逻辑推理,诊治疾病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医患双方应遵循合作原则,实事求是地告知病因,以科学态度分析病情,简洁明了地作出结论,一丝不苟地制订方案。只有这样的合作,才能使双方持续有意义地交谈并达成共识。然而医患晤谈这一特殊会话中双方无意或故意违反某条准质的现象能达到更好的谈话效果。具体分析如下:

1. 量准则的体现

最理想的量准则的遵守体现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信息,比如眼科医生希望病人只谈眼疾症状;普外科医生要知道腹痛患者的疼痛时间与部位。但是往往病人给予过多的信息使得医生不得不在杂乱无章的主诉中清理头绪以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而病人常常会抱怨医生给予的信息过少而无法了解自己的确切病情。如中医院消化门诊一位就诊老太太的主诉:“我这个是老毛病了,几十年了,一直受这个罪。吃点香蕉、吃点药好一点。胃口不好,嘴里发苦,上门落锁下门栓,出不出气,睡不着觉,吹点冷风就头痛,扑通扑通跳。支气管炎也发了,咳嗽有血丝,肺上有罗音,心脏也不好,胃下垂这个老毛病,关节炎发起来走路脚发抖,脑萎缩,什么也记不得……”显而易见,病人的话违反了量准则,这是常见的情况。病人认为把自己的症状和感受谈得越多就越能受到重视,能帮助医生作出诊断和治疗。但恰恰相反,这给医生的诊断评估带来一定的困难,因为医生需要排

除更多的假设。但一般来说医生已习惯了病人这种违反量准则的做法。他一方面允许患者尽量多谈，另一方面善于从中找出主要信息，再根据检查结果和自己的经验推断出症结所在。

违反量准则的现象往往大多数在病人，而他们无意中的违反是有意维护质准则，也就是他们想把所有的症状感觉全部如实地谈出来，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有时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这些是实际存在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对于这种情况，医生需要的是“宽容”和引导而病人予以配合和理解，使谈话朝着既定目标发展。

2. 质准则的体现

按格赖斯对质准则所下的两点定义来看，医患都遵照第一条“不要说自己缺乏足够证据的话”去做而常常有违反第二条“不要说自己知道是虚假的话”的现象产生。如果说违反量准则的是病人较多，那么违反质准则的，特别是违反质准则第二条定义的大多数为医生。在门诊调查中有一个典型的病例，经过病史询问及生化和病理检查，病人已被初诊为恶性淋巴瘤，病人也急于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但是医生知道如果如实相告，病人会拒绝治疗，只能加速她的死亡，因此在晤谈中数次违反质准则，有意让病人误解而达到配合治疗的目的。这种情况在门诊、病房、放射科、CT 室常见。对于恶性疾病，很少有医生如实相告，而往往说“看起来片子上有点问题，但还要确诊”，或“能开刀，你不要太紧张”，也没有医生会告诉病人能再活多久，而是说“你安心养病，药的作用没那么快”，或“今天气色好了一点”等等。这是在中国医院里的传统做法。

按常理说，有意说谎或设法制造假象这种对质准则的违反会迫使对方产生歧义误解而破坏会话的持续性，但医患晤谈中医生要病人相信他的话是真的才能产生达到目的之效果。因为这与自然会话中“托辞”的性质不同，不希望对方意识到自己讲的是善意的“谎言”，也没有必要“冒犯”对方，而相反，这种对质准则的违反符合中国传统医德中的“保密”原则，能为病人树立起与疾病抗争的信心以达到配合治疗的目的。病人除了为混病假、开紧俏药、换工作而故意伪造症

状，或意识到自己疾病的起因是由于违反社会公德伦理所致的情况外，一般很少有违反质准则的现象。

在此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医生为了患者的利益而往往有意识地违反质准则，不把疾病的真实情况如实相告，一旦变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通常做法，它就会对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患者，失去"欺骗"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就会对医生的诊断将信将疑，从而去推导另外的结论。而作为医生，如果发现病人有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则干脆如实相告或采用比较委婉的语言，这反而能赢得病人的信任和配合。可以这样指出，随着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为了在来来的医学中实现患者的更大配合和参与，医生在今后应逐渐减少对"质准则"的违反，逐渐提高"真实"的成分。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修正传统医德中某些观念的过程。

3. 关联准则的体现

"关联准则就是话语要切题"，参加会话者所说的话应该和主话题及对方前面所说的话相关联。这一点医患晤谈双方遵守得最彻底，所有的实例都显示了对这一准则的遵循，即让一些看上去与主题无关的话，在这个特殊语境中有它的特定关联含义。如"你在哪里工作"暗示着病人的症状与工作性质环境有关；"爱喝啤酒吗"提示了可能的诊断如"痛风"发作起因是喝啤酒过多；一句例行问话"你近来怎样"可以得到许多不同的回答，而答案基本上都围绕病情、用药、康复等方面，即使不是直截了当点明主题，所含话意也是这方面的内容，如"我最近感觉不太好，后脑发酥，手有点儿发麻"，"药吃完了，腿没那么痛了"，"这个块好像又大了，自己摸得出的"，"好多了，晚上睡得着，白天也能干点儿活"；甚至"十月份北京风景没话说，上香山了，怎么样？"等。根据话语的关联性，所有病人的回答都显示了自身健康状况，即使"上香山"看起来似乎与诊治关系不大的话也可以看成是病人告诉医生自己术后恢复得相当不错并能外出旅游。

除语言以外，医患任何一方的"副语言"都切贴医疗这一主题。"副语言"是指非语言声音或声调，如表示赞同的鼻音"嗯"等，它属于

"非言语"信息。例如,在社交谈话中,打嗝可能被看成是破坏谈话连续性的一种声响或行为;打喷嚏可能被视为对谈话的不尊重或干扰;咳嗽可能会被认为对谈话的不耐烦或企图打断等等。而在医患晤谈中,这些很可能被看成是对疾病的暗示,成为下轮话题的根据。

此外,医患双方的体态语言,即手势、面部表情、坐姿等都与医疗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甚至外表服装也给予治疗康复方面的语言信息。儿童医院护士服装将白色改成淡绿与粉红就对儿童的心理治疗有利。曾在门诊上看到一位老人嚷着要找"白头发的医生"看病,这是将"白头发"与医疗经验联系在一起所产生的信任感。

4. 方式准则的体现

方式准则与交谈中"怎样说"这个问题有关。医患晤谈双方都力求自己的话能让对方听明白,不会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词句让对方陷入尴尬境地。医生尽量做到用语清楚明白、简明扼要、有条有理,即使碰到个别难懂的术语,也会尽量用浅显的语言或图示直观加以解释达到理解沟通。个别病人讲话啰嗦重复,颠三倒四,只能看作是由于病痛或心理压力所产生的对语言表达的影响,而不能看作是对方式准则的故意违反。

六、医患关系的和谐

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医患间角色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有一方仍相信"生物医学模式",治某一器官的疾病而不是治疗病人。为了使角色间的冲突转化为和谐,医院的氛围正向"以病人为中心"的晤谈方式转化,医学模式也逐渐演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许多病例中我们发现,医生在晤谈中不但了解"一个人得了什么病",而且还了解"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深深挖掘病人的内心世界,了解病人的恐惧和期望,减轻病人的苦恼不安,鼓励病人增强与疾病抗争的信心,与病人共同讨论病情、治疗、疗效甚至副作用、预后等等。同时,越来越多的病人也希望积极主动参与制订治疗方案,变被动角色为主动,真正了解自己病情,增强了健康意识,努力配合医生。双方

角色都本着共同参与相互影响的意愿，一方带入技术知识和临床经验，另一方带入病情经历、健康信念和求医目的，在医生言语技巧的引导下形成相互尊重和信任。只要医生注意新的医学模式和晤谈中心，专家角色的权势影响会对病人的心理能起积极的安慰鼓励作用，病人会依赖医生的专业水平而更乐意配合。

许多实例证明，医患晤谈中角色的冲突会导致双方关系紧张，无法使谈话朝着共同目标前进，影响医疗决定的作出与实施；而和谐能使双方互相配合，在融洽的气氛中通过谈话在问题的实质上达成一致，在双方均可接受的治疗方案方面产生共识。因此，在晤谈中将角色间的冲突通过语言艺术的作用转化成和谐是成功诊治的关键之一，也是医生除医学科学知识外所应该学习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七、结论

医院这个语境是一个浓缩的社会，医生和病人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医生与病人之间的会话与社会上的普通自然会话虽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其本身的特点。它不是一般随意交流思想感情或信息的过程，而是医患之间通过交换有关疾病方面的信息以达到诊治疾病之目的的过程是一个探查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医患晤谈包含言语行为众多，信息量大，诊断评估和治疗干预过程持续时间长，要对整个完整晤谈分析篇幅有限。因此，规约性语境可使分析着重于有典型意义的片断而不破坏会话的整体感，事后调查的诊断治疗结果也为分析结论提供了可靠的事实依据。在特殊语境的规约下，相互知信的话轮替换中贯穿的鲜明特色之一便是合作原则的体现。从仔细分析中看出，这一体现始终贯穿着对四条准则的遵循与违反的辩证关系，并产生了会话的深层含义，使得有意义的交谈不断向纵深发展。这是语言艺术的魅力所在，也是医患晤谈中语言哲学的实际应用。

医生和病人处于一个大致相同的文化价值观的社会中，对于各种事件有相似的认知评价方式或彼此能了解对方的评价方式，从而

能了解对方的情绪体验，这是医患晤谈的共同基础。其间，双方的共同目标是探寻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虽有角色冲突，但往往经过相互作用和影响，角色冲突能变为角色的相互配合，而其中主要是医生的专家权威和技术职责的外因通过语言技巧作用于病人依赖求助心理这一内因，促使矛盾达到统一，冲突转化为和谐，实现“以病人为中心”的新医疗模式。

参考文献

[1]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

[2] Stewart & Roter. *Communicating with Medical Patient*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9

[3] 霍仲厚. 医生心理学[M].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89

[4] 王孝军. 医生语言艺术表演[M]. 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mpliance in the Different Roles of Doctor and Patient

Jiang Jin

Abstract Doctor-patient conversation is the communic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treatment. Confrontation in the thoughts and expressions is commonplace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ole-playing by doctor and patient, but they finally come to the compliance on the basi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 trust through the process of cooperative convers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ole of experts of doctors and the role of treatment seeking of the patients, analyses the reasons for their confrontation, details the realization of cooperative principle in the hospital background, and mentions the importance of compliance and cooper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of "patient-centered" new medical model.

Key words doctor-patient conversation; role; confrontation; cooperation; compliance

失语症患者语言康复中社会因素的临床调查

姜 瑾 葛 红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临床汉语失语症患者的话语中所表现的言语特征进行多维透视，意在从社会因素的视角对失语症患者言语交流康复过程中的运作机制进行尝试研究，在描述分析临床语料的基础上总结出有关社会因素对其康复过程的影响以及语言学研究和失语症康复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关键词 失语症，社会因素，语言康复，交叉学科研究

一、引言

失语症（Aphasia）一词由希腊语 a（not）和 phanai（to speak）构成，意思为不能说话，最初由法国医生 Trousseau 用来描述大脑损伤后患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现象，现成为一个医学术语被广泛用于大脑损伤所致的各种言语障碍（崔刚，2002）。语言康复是指对失语症患者进行语言矫治，又称为语言治疗学（高素荣，1993）。语言康复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交织、相互影响且反过来影响患者本人的过程。脑医学科学研究专家和神经科医生多年来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语言矫正师更是努力探索不同途径以使失语症患者早日克服交际障碍，恢复正常语言交往能力；近二十年来，语言学界也对此开展了系统的研究探索，国内外临床语言学界收集了大量的语料，从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研究探索失语症的康

复因素，以期能开展交叉学科研究，将人文学科的科研成果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实践中。

在对失语症患者进行系统、频繁的语言治疗过程中又涉及到多种非医学或非语言本身的因素对此起的作用，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社会因素。社会因素是社会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前人的研究表明：社会阶层、教育背景、职业习惯、性别、年龄、甚至患者的心理状态等社会变项均可以被成功地应用于描述、分析失语症患者的话语之中，从而为语言矫正师和神经科制订语言康复计划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对患者的语言表达的康复和交际能力的改善起促进作用。

本文对汉语失语症患者的话语中所表现的言语特征进行了多维透视，并力图从社会因素角度诠释失语症患者言语交流康复过程中的运作机制，在描述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社会因素对脑中风后经医学治疗处于恢复状态的汉语失语症患者的言语康复过程的影响，以及语言学研究和失语症康复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

二、文献综述

1940年，德国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逊首先将语言学的研究与失语症的研究结合起来，从那时候起对失语症的研究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有了一席之地。在雅各布逊看来，无论从隐喻还是转喻来看，失语症的研究可归入两大类型，即相似性紊乱和连续性紊乱，“前者的麻烦在于原语言功能的退化，而后者损伤了维持语言单位层次衔接的能力”(Jacobson ,1987)。国内外许多语言学家从语言学研究的各个角度对失语症的症状、起因、治疗及康复进行了探索和分析。美国语言学家莱瑟· 露斯和米尔罗伊·赖斯莉在专著《语言学与失语症——心理语言学和语用学角度的干预》一书中进行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该书在心理语言学层面上建立了模型，研究词汇构成的认知神经心理以分析失语症患者在命名事物、阅读和书写方面的障碍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交际问题(Ruth & Lesley, 1993)；皮尔斯从失语

症患者的言语前后连贯性障碍问题中探索了语言学中的语用失误问题(Piece,1988);克里斯蒂安森总结了各种失语症患者的语言产生和语言输出问题;清华大学神经语言学家崔刚则从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对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康复过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讨论,从词汇连贯、语法缺失和语用失误等语言学方面证实了语言学研究与失语症患者康复之间的关系(崔刚,2001)。本文在对大量的临床失语症文献和与此相关的语言学文献的研究后,开始从社会语言学研究着手,研究失语症患者康复过程中社会因素的影响。

三、临床调查对象与方法

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领导及医生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笔者于 2003 年在该科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调查研究,设计了检测框架并进行访谈录音。

首先是确定调查对象。随机抽样对此研究工作毫无意义,因此,作者选定了两类经医学药物治疗后效果较好并正处于语言康复过程中的布洛卡氏和传导性失语症患者,边收集病例边录音,最后筛选出各 10 例作为本文的分析依据。

根据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相关的社会因素,即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职业、种族等,笔者将 20 例调查对象的基本状况列表如下(为了保护病人的隐私权,姓名用英文缩写字母,失语症类型为布洛卡氏 BA 和传导性 CA)。

受试对象基本信息表

姓名	序列号	职业	受教育程度	性别	年龄	测试日期	利手	失语症类型
Z B J	PB1	技术员	大专	男	28	1-14-2003	右	BA
W W D	PB2	退休医生	本科	男	69	1-26-2003	右	BA
Z M Z	PB3	退休教师	本科	女	63	7-20-1003	右	BA

续表

姓名	序列号	职业	受教育程度	性别	年龄	测试日期	利手	失语症类型
M G Q	PB4	工人	小学	女	31	2-19-2003	右	BA
L Z X	PB5	农民	小学	女	50	3-11-2003	右	BA
S J G	PB6	技术员	中专	男	40	6-14-2003	右	BA
W L J	PB7	售货员	初中	男	71	4-19-2003	右	BA
C L F	PB8	经理	大专	女	45	6-21-2003	右	BA
ZXF	PB9	工人	中学	男	49	7-28-2003	右	BA
Z H C	PB10	律师	本科	男	47	9-19-2003	右	BA
Z G	PC1	农民	小学	男	58	2-17-2003	右	CA
L L W	PC2	政府官员	大学	男	53	1-31-2003	右	CA
W J G	PC3	经理	中学	男	62	2-26-2003	右	CA
D M L	PC4	政府官员	大学	女	57	4-16-2003	右	CA
Z X X	PC5	农民	小学	男	78	4-21-2003	右	CA
L L M	PC6	工人	小学	女	65	6-23-2003	右	CA
H M L	PC7	会计	中专	男	54	6-12-2003	右	CA
G P Q	PC8	退休教师	大专	男	61	8-11-2003	右	CA
G X M	PC9	工人	初中	男	73	10-18-2003	右	CA
L Z H	PC10	工程师	大专	男	56	11-2-2003	右	CA

在对失语症访谈录音中所使用的问卷主要依据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神经病学研究室的失语症检查记录中与语言部分密切相关的问题(高素荣,1993),采用的失语症检查表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谈话、理解、复述、命名及叙述。其中叙述部分是为更全面、客观地了解并研究失语症患者的语言,由笔者尝试性列入的。由于篇幅有限,文中只列出一例展示过程,患者的基本情况参见 Z M Z PB3。

1. 谈话

问:你好些了吗?　　　　　答:些好了。

问:您多大岁数啦?　　　　答:六十……六十……

问:您能不能说出十二生肖的名称?　答:会的,讲不出来……

2. 理解

问:我说二十个句子,我说得对,你就说对,我说得不对,你就说不对。你的名字叫张小红吗?　　答:不对。

问:这儿是旅馆吗?　　答:不。

问:吃香蕉前要剥皮吗?　　答:要剥……

3. 复述

问:请您跟我学,我说什么你也说什么,好吗?　答:好。

问:门。　　答:门。

问:吃好晚饭去散步。　　答:散步,吃饭……

问:办公室电话铃响了。　　答:电话,办公室响……

4. 命名

(检查者手拿实物如牙刷、钥匙、手机等让病人讲出来,进而让病人讲出各种蔬菜或水果等的名称)

答:刷牙,钥匙,机……手机,笔……

5. 叙述

问:你能讲讲自己童年时期或孩子小时候的事情吗?

答:我女儿小时候不大响的,成绩蛮好,变化很大,现在话多……

问:您能讲讲您感到高兴的事吗?

答:现在生病还有什么高兴,年纪轻时去过美国,不得了的外国人,苏州有迪斯尼,美国的,新鲜……

所有的项目测试过程都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有的病人答非所问或语无伦次,也有的病人回答得比较流利,显示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受过不同教育、不同职业和不同性别的失语症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各自言语表达的特点。作者在通过对20个病人的表达分析,找出某些特

点的共同之处，以证实在失语症言语康复中社会因素对此的影响。

四、描述性分析

根据表中列出的相关社会因素和对病人语言康复过程的跟踪调查，从笔者所观察到的病人语言表达能力和状态来看社会因素对失语症患者语言康复的影响，可以进行描述性分析。

1. 职业与受教育程度

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因而，在研究社会因素对失语症患者康复的影响中，两者可同时分析。表中列出的 20 个病例中的职业四例为工人，三例为农民，两例教师，两例经理，两例官员，两例技术员，另五例分别为销售员、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和退休医生。作者将其中四例康复情况相似的病例进行比较分析，分别为表中的 PB1，PB2，PB4 及 PC8，他们的职业分别为技术员、退休医生、工人和教师。根据失语症检查表中五个部分的谈话记录分析，PB4 的背景信息显示，该病人受到很少的正规教育，识字不多，语言表达能力有限，而且，照顾她的亲属只实行看护职责，也很少和她进行语言方面的训练交流；病案记录显示 PB1 的病情和药物治疗过程几乎与 PB4 一致，然而在几乎相同的康复时间内，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的恢复却大相径庭，不同之处就在于两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思维方式和能力。PB1 接受了高等教育，年轻，思维活跃，知识面广，而且其母亲是一位退休小学教师，知道如何开发儿童的语言能力，在护理的同时坚持进行语言初步知识训练，这也是该患者语言康复明显的一个重要因素。而 PB2 是一位退休外科医生，在检查交谈中，即使表达还不流利，无法表达清楚他的全部思想，但他不时地讲出几个医学术语，如脑溢血、失语、保守疗法等，说明了患者即使在语言康复的初级阶段，他的思维能力和表达习惯也与多年的职业有关。PC8 是退休教师，在断断续续的交谈中，他尽量把要表达的意思反复强调以使对方听懂，显示其职业素质。在所收集的病例中，PB5、PC5 和 PC6 只受过小学程度的教育，从跟踪调查的情况来看，他们的语言康复状态远

不如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失语症患者。此社会语言学分析与医学界前期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高素荣,1993)。

2. 性别

如表中所示,被调查对象中有六位女性:PB3、PB4、PB5、PB8、PC4及PC6,其余为男性。许多社会语言学者对不同性别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和能力、习惯等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因而,作者提出了假设,是否不同性别的失语症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对检查表中话题的选择及交流沟通有所区别?所获资料对此假设展示了较为肯定的答复。

在调查过程中作者对所有的患者都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您能不能讲出一些以'大'开头的词,比如说'大海'"?试举所获四例答案:

PB3:大女儿、大外孙、大人。

PC4:大儿子、大哥、大侄子。

PC8:大家一起来唱歌、大声喧哗、大吵大闹、大惊小怪。

PB10:大马路、大案要案、挣大钱。

上述病例中,PB3、PC4为女性,而PC8和PB10是男性,两种不同性别的病人答案区别很明显,其他病人的回答内容差别与上述四例很接近。在叙述阶段患者断断续续的话语中也发现了同样的差别。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即使在失语症的语言恢复阶段初期,不同性别的病人也本能地表现了思维言语取值倾向,证实了男性更关注社会大事而女性对家务琐事更感兴趣,虽然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结论,但也从一个侧面提示了语言康复师在对失语症患者进行言语矫正时话题的恰当选择能刺激提高不同性别患者的思维和表达兴趣,以进一步加速患者的语言康复。

3. 小结

在对所有选择患者的失语症检查项目中社会因素对其的影响后分析后作出下列尝试性小结:

(1) 失语症患者职业对其康复的影响在于语言训练中词汇的选择。

(2) 失语症患者的受教育水平在相当程度上与患者语言康复的

时间和效果有关，所受教育水平越高，所需康复时间越短，效果越好（令人更感兴趣的是可将护理家属的受教育水平都计算进去）。

（3）男女不同性别对话题的兴趣不同，因而言语训练过程中可选择双方不同的话题以刺激思维，有利康复。

（4）年龄也对失语症患者康复有一定的作用，总的印象是年轻患者比老年患者语言恢复得快。

五、结论

由于研究面相对较窄而且时间较短，本研究还有许多局限和不足，还有待未来对其他类型的失语症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但该研究成果显示失语症研究与社会语言学研究密切相关、互相促进。把社会因素列入对失语症患者的言语康复的应用研究中，对其言语功能的康复是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研究发现，失语症患者的职业对其失语后言语表现呈现相关多维促进趋势，主要表现在：选择词汇的应用方面；其受教育程度与失语后的言语康复呈正相关的关系；女性失语患者在康复中所选思考和表达内容与男性不同；年轻患者比年长患者语言康复较为迅速。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能为言语康复师制订失语症患者的言语康复训练计划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可根据患者不同的背景资料制订合适的计划和设计与患者本身展现的社会因素相关的问题。如果将本研究进一步往前推进，希望能缩短在医学治疗取得进展后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康复所需时间。本研究的学科交叉特点也有望为神经语言学和失语症的未来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Ruth, Lesser & Lesley, Milroy. *Linguistics and Aphasia* [M]. NewYork: Longman Publishing, 1993

[2] Jacobson, Roman. *Language in Literature* [M].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1987

[3] Piece R S. 1988,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the Effects of Context in Aphasia*[A], In Ball, M. J. (ed)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Disordered Language*[C], St. Edmundsbury Press Ltd, Bury St. Edmunds, Sulfolk
[4] 高素荣. 失语症[M]. 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1993
[5] 崔刚. 失语症患者的口语表达障碍研究[M]. 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1
[6] 崔刚. 失语症患者的语言学研究[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Clinic Study on Speech Recovery of Aphasics from the Aspect of Social Factors

Ge Hong　Jiang Jin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clinical Chinese aphasics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factors in order to find out how these soci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the aphasics. On the basis of descriptive analysis on the clinical data collected from twenty aphasic patients, more relevance between linguistics and speech therapy is to be found to benefit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as well as patients' speech recovery.

Key words　Aphasia; social factors; speech recovery;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医学英语术语概论

姜 瑾 陶 莹

摘　要　医学英语术语是专门用途英语中的一种，是研究医学术语的起源和发展的学科，它涉及到医学、语言学、词汇学、词源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英语史等多方面知识。本文着重介绍了医学英语术语的词源学和从希腊语和拉丁语起的发展史，普通英语词汇特定医学含义、英语化的拉丁或希腊词汇及含有拉丁、希腊源词素的合成词汇等医学英语术语的特征，医学英语术语的构词规则以及医学英语术语的单复数形式和读音规则。

关键词　医学英语术语，词素，构词规则

医学英语术语(Medical Terminology)是研究医学术语的起源和发展的学科，也是向广大医务工作者、医学院学生、医学科学研究人员提供科学的方法以提高对医学英语术语认知能力的一门专项技能，同时也是医学与语言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方向。它涉及到医学、语言学、词汇学、词源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英语史等多方面知识，在医学知识国际化、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它将对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对中国医学科学工作者快捷及时地掌握国际最新医学动态、准确地理解医学英语专业文献、与国际同行沟通交流起相当大的作用。

一、医学英语术语简介

医学英语术语学是一门研究学科，更是一门实践学科。在医

学英语文献中有许许多多在平时的日用英语中少见的专用术语，这些专用术语看起来似乎既冗长又难记，而且没有规律可循。然而，细分析之下不难发现大多数医学术语均包含了基本词素，它们的构成也遵循了相当固定的模式，因而从本质上来说，对医学术语的研究是对构成医学单词的部分分析以及在了解它们的结构的基础上对整套词汇的构成的研究，略举几个词例就可以从中发现其构词模式和规律。

psychiatrist(精神病医生)→psych(mind)/iatri(medicine)/ist (one who specialized in)

anatomy (解剖)→ana-(up)/tom(cut)/-y(condition, act)

physiology (生理学)→physi(nature)/o(combining vowel) / -logy(the study of)

cytoplasm (细胞质)→cyt(cell)/o(combining vowel)/plasm (liquid part, a thing formed)

chromosome (染色体)→chrom(color)/o(combing vowel) /some(body)

在医学英语术语的学习过程中应该对医学术语英语词汇进行术语学方法类的剖析，将医学专业与英语教学相结合，以使医学院学生在学习医学各科教材的过程中同步练习所有教材中的医学英语术语，熟练掌握医学英语术语的词素分析、词素合成、构词方法，同时将所掌握的剖析学习方法应用于最新医学文献的阅读之中，达到记一认十、记百认万的认知效果。这对医学生未来的专业发展中英语专业文献的阅读和翻译也能起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对已经进入专业领域的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学研究者在理解、发现、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组合新的医学复合词均有所启发，有应用价值。

二、医学英语术语的词源学和发展史

医学英语术语的词源学是研究医学英语术语的语言起源、语言形成、结构调整、语义演变、词素合成、应用方式、认知变异、内涵转

意、多语同源和多源同义的一门学科，对熟悉了解和深层掌握医学术语有相当大的帮助。医学英语术语大多数来源于古希腊语、拉丁语、盎格鲁-撒克逊语言，占约 90%左右；另外还有一些术语源于德语、法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及瑞典语。而现代医学术语受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影响最大。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底(Hippocrates)堪称西方医学之父，他最早将希腊语用于医学解剖学和生理学词汇的表达，由于这些词汇的简单性、固定性和明确性，并通过擅长医学的罗马人传向外界，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颇具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作为古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的拉丁语，也在该国对其他国家的扩张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主体为希腊语的医学词汇。而通晓拉丁、希腊两种语言的罗马医生又将某些希腊医学词汇拉丁化，撰写了相当多的拉丁语医学著作，传向文明世界。随着古罗马帝国的消亡，原占领国的各民族将本民族语言与拉丁语相结合建构了新的拉丁语支，如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拉丁语成为欧洲学术界、法律界与外交界的书面交流语言；同时，英国的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用了大量的希腊词汇和拉丁词素再结合盎格鲁-撒克逊语言的结构和词汇，创造出新的医学术语，使医学术语的数量随着医学的发展不断地扩大。

医学英语术语的发展史也包括在整个英语的发展史中。由于英国在历史上曾受到多种外来民族的侵略和统治，外民族语言不可避免地渗入其语言中并大大地丰富了它的词汇量，特别是在自然人文各学科的研究中。而医学与其他学科相比，受外来词汇的影响更深，所以医学英语术语中的一些组织器官的名称一部分来源于对希腊语的直接移用，一部分来源于拉丁化的希腊词，还有一部分沿用盎格鲁-撒克逊表达方式，少部分病名、药名和疗法名来源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1895 年，国际公认拉丁语为世界医药界的通用语言，正规的处方和药名须用拉丁语书写，大量英语化的拉丁语词汇和英语化的希腊词素被创造，各种新发现的复杂症状、疾病、发病机制、医学理论以及药物获得了由希腊语及拉丁语的词根和词缀成分所构

成的相应的医学术语表达，这些构词法沿用至今，极好地适应并推动了现代医学的发展。由于医学科学的不断延伸和发展，除临床医学外，涉及面和渗透度不但与许多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有关，而且更指向揭示人类生命本质的纵深领域。当代医学术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处于激增状态，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大致有一千五百多个新术语产生。如果要中国的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记下所有的医学英语术语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甚至电脑的 OFFICE 文档也不认识许多医学英语术语。但只要了解了医学英语术语的几大特征、读音规则和构词方法，就能在阅读医学英语文献的过程中轻而易举地在上下文中理解新产生的术语的确切含义，进而可以分析该术语的内涵和它所表达的物质意义及社会意义。因此，了解一些有关医学英语术语学的基础知识不但有益于医学院学生阶段的课程学习，更有益于未来在医学科研领域的继续发展。

三、医学英语术语的特征

与所有其他自然人文科学领域的英语术语相比，医学英语术语特征相对明显。它可初分为三大类，即：普通英语词汇特定医学含义，英语化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汇，含有希腊、拉丁源词素的合成词汇。

1. 普通英语词汇特定医学含义

普通英语词汇有相当一部分持有特定的医学含义，如：

词汇	普通英语词汇汉语意义	特定医学英语词汇汉语含义
abortion	夭折，失败	流产，早产，堕胎
administration	管理，行政	用药，注射药物，给药
angry	愤怒的，发怒	发炎肿痛的
attack	攻击	（疼痛的）发作，（疾病的）侵袭，
basket	篮，筐，篓	篮状细胞，阿耳茨海

		默氏篮
bilious	暴躁的,易怒的	胆汁的,胆汁过多的
brainstorm	想出妙计,灵活思维	脑卒病变
bypass	旁道,小路	分流术
calf	小牛,小牛皮	小腿,腓肠
cataract	大瀑布,大水	白内障
colon	冒号	结肠
complication	复杂,混乱	并发症
consumption	消耗,消费	结核病,肺结核
convulsion	震动,灾变,大笑	惊厥,抽搐痉挛
cramp	夹,钳,订,约束	绞痛,痛性痉挛
delivery	发送,交付,发表	分娩,生产
depression	沮丧,压抑	抑郁症
disorder	混乱,无序	病症,机能紊乱,失调
dressing	穿衣,梳妆,调味品	绷带,敷料
drip	水滴	滴注法
egg	蛋	卵(细胞)
eminence	卓越,显赫	隆起,隆凸
erosion	侵蚀,腐蚀	侵蚀,糜烂
extract	榨出物,文摘,摘要	浸出物,浸膏
fit	合适,安装	(病痛的)阵发,痉挛
foreign	外国的,陌生的	异质的
germ	起源,发生	微生物,病(原)菌
gum	口香糖,树胶	(牙)龈
history	历史	病史,病历
host	主人,节目主持人	宿主,基质,受移植者
humor	幽默	体液
immune	免除的,不受影响的	免疫的,免疫者
indication	指示,象征	指征,适应证

insufficiency	不足,不充分	机能不全,闭锁不全
intervention	干涉,干预	介人(手术)疗法
irrigation	灌溉	冲洗(伤口)法
knit	编织,联合	接合折骨
labor	体力劳动	分娩,生产
lesion	损害	损伤,疾病
mass	群众,团体	肿块,肿瘤
murmur	嘀咕,咕哝	心脏杂音
operation	运转,操作	手术
patient	耐心的	病人
periodic	阶段的,周期的	间歇的,间发性的
portal	大门,入口	门静脉的,肝门的
primary	第一级的,首要的,主要的	原发的,原生的
pulp	果肉,纸浆	牙髓,髓质
rash	急躁的,性急的	皮疹
remedy	弥补,补救,纠正	治疗,疗法
resident	居民	住院医生
secondary	第二的,次要的	继发的,辅助的
sign	标记,符号,招牌	体征,病症
stroke	(敲)打,(一)击	中风,心搏动,脉搏(跳动)
sympathetic	同情的,怜悯的	交感神经的
trunk	树干	躯干,大血管,神经主干
tender	柔软的	压痛
type	类型,打字	(血)型,测定血型
version	版本,译文,改写本讯	胎位倒转术,子宫(前、后、侧)倾

ward	保卫	病房,(使)入病房
whoop	高喊,呐喊	哮喘,哮咳,喘息

上述例子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在当代医学英语的表达中,大约一千个左右的普通英语词汇含有特定的医学含义,可以肯定,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更多的普通英语词汇会通过释义的转化加人医学英语术语的行列。

2. 英语化的拉丁或希腊词汇

(1) 部分的化学元素英语名称与拉丁语相同,如:

aluminum	铝
argentum	铜
barium	钡
calcium	钙
magnesium	镁

(2) 部分化学元素的英语名称和绝大部分抗生素的英语名称为去拉丁语词尾"um"或"ium"即可,如:

acidum → acid	酸
aspirinum → aspirin	阿司匹林
hydrogenum → hydrogen	氢
oxygenium → oxygen	氧
penicillinum → penicillin	青霉素
vitaminum → vitamin	维生素

(3) 词尾略经转换成英语化的生物碱、氧化物、氢氧化物、酸根等词汇,如:

atropinum → atropine	阿托品
acetas → acetate	醋酸盐
adrenalinum → adrenaline	肾上腺素
bromidum → bromide	溴化物
hydrochloridum → hydrochloride	氯化氢
iodidum → iodide	碘化物

phosphas → phosphate 磷酸盐

(4) 全盘英语化的专用术语，如：

bacteria	细菌	colon	结肠
core	心	diarrhea	腹泻
enema	灌肠法	hemorrhage	出血
nausea	恶心	pharmacology	药理学
tablet	片剂	virus	病毒

在现代医学英语中，许多拉丁词和希腊词均已英语化，读者无需对每个术语都追根溯源，只需略知其语源特点即可。

3. 含有拉丁、希腊源词素的合成词汇

含有拉丁、希腊源词素的合成词汇占医学英语术语的大部分，如果掌握了它们的构词规则和词素含义，就能非常容易地对这些看上去复杂难理解的单词进行释义，如：

bronch/o/pneumon/itis 支气管肺炎
支气管 肺 炎症
(主) (主) (谓)

bronch/o/radio/graphy 支气管X射线造型术
支气管 放射 曲线造型
(主) (主) (谓)

gastr/o/duodeno/scopy 胃十二指肠镜检查
胃 十二指肠 镜检查
(主) (主) (谓)

hept/o/cholangi/o/enter/o/stomy 肝管小肠吻合术
肝 管 小肠 吻合术
(主) (主) (主) (谓)

ot/o/rhin/o/laryng/o/logist 耳鼻喉专家
耳 鼻 喉 专家
(主)(主) (主) (谓)

如上所例，当对这些术语进行分解释义的时候，用“从后向前”及

"主谓关系"的分析方法,即在术语中后缀或复合后缀相当于此术语的谓语部分,前面的词根部分相当于主语部分,如在术语"hepatitis"中,"itis"相当于谓语"发炎",而"hepat"相当于主语"肝脏",有时主语部分不止一个,可以多主语并列,字母"o"为组合元音,是各词素的成分的构词结合点。

四、医学英语术语的构词规则

医学英语术语虽量大繁杂,但它们的构词方法相当有规律,容易掌握,从构词成分到合成形式均有规则可循。一般来说,大多数医学词汇都由下列部分组成,即:词根(或词干)、前缀、后缀及组合元音。

1. 医学英语术语的四大基本构词成分

(1) 词根(word root):

词根具有该术语的基本意义,是该医学术语的核心,它和别的词根、前缀和后缀组合,能产生许多新的医学术语单词。如:gastr/ic意为"胃的", gastr/o/scopy 意为"胃镜检查", gastr/itis 意为"胃炎",enter/o/gastr/itis 意为肠胃炎,gastr/o/enter/o/colo/stomy 意为"胃小肠结肠吻合术"。在上述术语中,只要知道了词根"gastr"意为"stomach"(胃),就可以结合前后缀通过联想来推测其合成术语的含义。因此,掌握词根有利于大量单词的记忆。

医学英语术语词根有两大起源:拉丁语和希腊语,特别是指人体部位和器官的词根都有两种不同词根,构成不同拼写的术语,但表达相同的含义,如:oculo- 和 thalmo-均表示眼睛;pulmo- 和 pneumono- 均表示肺;reno- 和 nephro- 均表示肾;naso- 和 rhino- 均表示鼻,在每对词根中,前者源于拉丁语而后者源于希腊语。略举例如下:

人体部位或器官(英语)	拉丁词根及例词	希腊词根及例词
abdomen (腹)	abdomino → abdominocetesis (腹腔穿刺术)	celio → celiscope (腹腔镜)
brain (脑)	cerebro → cerebromenigitis (脑膜炎)	encephalo → encephalocystocele (积水性脑突出)
chest (胸)	pectoro → pectoragia (胸痛)	thoraco → thoracometer (胸围计)
head (头)	capito → capitaopedal (头足的)	cephalo → cephalonasal (头鼻的)
neck (颈)	cervico → cervicaldorsal (颈背的)	tracelo → tracelodynia (颈痛)

显然,此类词例举不胜举。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两大古代语言为医学英语术语提供了大量可灵活应用并含义确切的词根,这样,就出现了相同含义、不同拼写的词根与各种前后缀结合构成大量的含义相同或不同的医学英语术语,这就是在某些医学英语表达的时候产生的"一词三式"现象,即,既可用普通英语词汇表达,也可用拉丁或希腊词源构成的词汇表达,这就是为什么在查阅英汉/汉英医学词典时会发现一种医学含义的多种术语表达方式,这是语言的多源同义现象。查阅词典者可根据文献上下文的不同需要选择相关的表达方式。

(2) 前缀(prefix):前缀位于词根之前,能赋予词根新的含义,如"epi/gastr/ic"(上腹部的)中的"epi"意为"上","sub/retin/al"视网膜下的"sub"意为"下"。

(3) 后缀(sufix):后缀位于词根之后,也能赋予词根新的含义,如:gastr/itis(胃炎)中的itis(炎症)。后缀还能赋予术语单词不同的词性,如gastr/ic(胃的)中的ic为形容词后缀,bronch/ial(支气管的)中的ial也为形容词后缀;anem/ia(贫血)中ia为名词后缀,hepat/o/tom/y(肝切除术)中y为名词后缀;后缀还可以被分为简单后缀和复合后缀,简单后缀如gastricol/ic(胃结肠的)中的ic,

arthro/sis(关节病)中的 sis；而复合后缀如 epigastr/algia(上腹痛)中的 algia，nephro/tomy(肾切开术)中的 tomy。由于复合后缀在医学英语术语中非常多见，而本身数量并非很大，因而牢记它们有助于掌握医学单词。后缀将在第三章中作详述。

(4) 组合元音 (combining vowel)：当词根与词根、词根与后缀相结合的时候，在两个辅音之间，或两个词根连接时后词根首字母为元音，需要加入一个元音，称为组合元音。它主要是字母"o"，如 cardi/o/vascul/ar(心血管的)；bronch/o/peumonia(支气管肺炎)；字母"o"已用得相当广以至于代替了字母"i""e"和"a"，在许多术语中，该字母已和词根紧密结合成了词根的一个部分，如：pathogen 中的 patho-，erythrocyte 中的 erythro-，lymphocyte 中的 lympho-，pyogenic 中的 pyo-等。然而，当一个词根与以元音起首的另一个词根或后缀组合时，组合元音需省略，如：当 nephro 和-edema / -itis / -ectoy组合时，拼写为 nephredema，nephritis 和 nephrectomy，而非 nephroedema，nephroitis，nephroectomy。同样，当 lympho-与angio-和-oma 组合时，拼写为 lymphangioma，而非 lymphoangiooma。此类词中也有例外，那就是在两个词均为平衡含义而非修饰关系时，组合元音不省略，中间可用"-"连接，如：nephro-abdominal；cadio-aotic；gastroenteric 等。

2. 术语合成基本形式

术语合成基本形式约有七种：

(1) 纯词根，如：neuron 神经元，sclerosis 硬化

(2) 词根＋(组合元音)＋后缀，如：gastr/o/tomy 胃切开术，bronch/itis 支气管炎

(3) 词根＋组合元音＋词根，如：gastr/o/spasm 胃痉挛，gastr/o/scope 胃镜

(4) 词根＋组合元音＋词根＋(组合元音)＋后缀，如：gastro/esophagos/tomy 胃食管吻合术，gastr/o/enter/ic 胃肠的；该组合也可为多词根与后缀的组合，如 gastr/o/hypo/

neur/ia 胃神经机能不足

(5) 前缀＋词根＋(组合元音)＋后缀，如：epi/gastr/ic 上腹部的，sub/pharynge/al 咽下的

(6) 前缀＋词根＋组合元音＋词根＋后缀，如：para/sympath/o/mimet/ic 类副交感神经的

(7) 前缀＋前缀＋词根＋(组合元音)＋后缀，如：sub/peri/oste/al 骨膜下的

(8) 前缀＋后缀，如：para/centesis 穿刺术，tetra/logy 四联症

3. 医学英语术语的词素释义

了解了术语的基本构词法，还可以根据其规则对医学英语术语的词素进行涵义分析。从单词的内涵来看，可根据词根、前缀和后缀将医学英语术语作相应的解剖，如：

(1) 疾病名称＝器官＋症状＝表示器官的词根或词根的复合形式＋表示症状的后缀，

例：hepat(肝)＋algia(痛)＝hepatalgia(肝痛)，

hepato(肝的复合形式)＋sis(疾病症状)＝hepatosis(肝病)，

hepat(肝)＋itis(炎症)＝hepatitis(肝炎)；

(2) 诊断技术名称＝器官＋诊断技术＝表示器官的词根或词根的复合形式＋表示诊断技术的后缀，

例：brocho(支气管的复合形式)＋scopy(镜)＝bronchoscopy(支气管镜检查)，

electro(电)＋cardio(心的复合形式)＋gram(图)＝electrcardiogram 心电图；

(3) 手术名称＝器官＋手术＝表示器官的词根或词根的复合形式＋手术，

例：append(阑尾)＋ectomy(切除术)＝appendectomy(阑尾切除术)，

arthro(关节的复合形式)＋desis(固定术)＝arthrodesis(关节固定术)。

类似的词素释义还有很多。这样，在记了一定量的医学英语术语时可以举一反三，减少在阅读过程中查阅词典的时间，理解医学文献中表达新科学发明创造的新构成名词，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创造新术语。

五、医学英语术语的单复数形式和读音规则简介

部分医学英语术语的单复数形式与普通英语单词的单复数形式一致，部分来自拉丁语和希腊语词源的医学和生物学术语，单数变为复数词尾有下列变化：

单　　复	例词英文单复数	中文意思
-a → -ae	cornea → corneae	角膜
-ex → -ices	appendix → appendices	阑尾
-ix → -ices	cortex → cortices	皮质
-is → -es	diagnosis → diagnoses	诊断
-ma → -mata	stigma → stigmata	小孔
-on → -a	protozoon → protozoa	原虫
-um → -a	atrium → atria	心房
-us → -i	bronchus → bronchi	支气管

医学英语术语单词的读音方法基本上与普通英语单词的读音规则相同，但由于大量的单词起源于拉丁和希腊词汇，一些特殊的辅音字母读音主要受希腊语的影响，如：ch 发 /k/，ph 发 /f/，ps 发 /s/，pt 发 /t/，qu 发/k/ 等，而元音字母的发音分在开音节和闭音节中的不同读音，同时也要注意到是否属于重读音节，以词典中的国际音标注音为准。要读准一个医学英语单词，记住正确的重音位置至关重要。由于医学单词较长，由相当多的前缀、词根和后缀组成，而词尾或后缀决定了重音的位置。读单词时，首先要学会分音节，一般一个元音，包括双元音及与其拼读的辅音，为一个音节，如：e/so/pha/go/je/ju/no/ga/stro/sto/mo/sis(食管空肠胃吻合术)就含有 12 个音节。重音规则为：

1. 单音节词本身就是重读音节，如：lung(肺)，heart(心脏)。

2. 双音节词重音落在第一音节上，如：s'tomach（胃），'gastric（胃的），'kidney（肾），'renal（肾的）。

3. 大多数三音节和多音节词的重音落在倒数第二音节或倒数第三音节上，由不同的后缀或词根所决定，如：gas'tritis（胃炎），gastromy'otomy（幽门切开术），'gastrofore（胃钳），但也有极少数例外，如：'gastroscope，这类词多为两个词根构成。

医学英语术语单词的发音规则和普通英语一样，读音规则相当复杂，上述例子仅仅为一些粗略简介而已。大多数医学英语词典上都注有国际音标，因此医学术语的发音还应该以词典注音为准。

六、结论

医学英语术语属于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的一种。通过对医学英语术语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英语用于任何专门的领域都有其特殊规则和构词方法。本文仅在浩瀚无垠的专门用途英语词汇的研究中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姜瑾. 医学英语术语学[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

Brief Description of Medical Terminology

Jiang Jin　Tao Yin

Abstract　Medical terminology is one form of the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It involves the knowledge of medicine, linguistics, lexicology, etymology, anthropology, sociology and English hist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etymology of medical terms and their development from Latin and Greek, the features of medical terms such as the medical meanings implied with common English words, the English form of Latin and Greek words and the formation of compound English words with Latin and Greek morphemes, the special single and plural form of the medical terms as well as the pronunciation regulations.

Key words Medical terminology; morpheme; word formation

The Use of Maxims for Cooperation in Chinese Medical Interviews

Jiang Jin

Abstract The discourse in doctor-patient interviews in China was analyzed to assess the way Leech's (1983) 4 maxims for cooperation play out in the medical context. Some violations of the maxim of quantity were found. Violations of the maxim of quality were common for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The maxim of relation and the maxim of manner were more closely followed. There was no evidence, however, that the violation of these maxims undermined the cooperativeness of doctor and patient. The medical interview may provide a context in which Leech's maxims hold more in the general than in the particular.

Key words Doctor-patient interviews; maxims for cooperation; violations; cooperative principle

Doctors and patients come together as strangers. Only through cooperation can both keep the conversation meaningful and complete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task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roles. This is a process in which both abide by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Just as in social conversation,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n doctor-patient discourse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four maxims (Leech, 1983). Usually,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follow these

four maxims voluntarily and willingly. Yet every rule has its exception. When we analyze the nature and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speaker and take the speaker's mental condition into consideration, the violation of the maxims may become a means to better achieve cooper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at possibility in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 I audio-recorded and observed more than 200 complete conversations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the clinics of six hospitals affiliated with the Suzhou Medical School in Suzhou,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lected examples we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or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The Maxim of Quantity

The first maxim of Leech (1983) is that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should be appropriate to the purpose of the conversation. For example, the opthamologist wants to know about the patient's eyes; the cardiologist wants to know about cardiovascular problems (patient =P; doctor=D).

P: Doctor, I have severe abdominal pain.

D: When did it begin?

P: After midnight last night. The pain woke me up, 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severe.

D: How about your stool these days?

P: It's normal.

D: What's the location of the pain?

P: I can't make clear. Sometimes around the navel, but sometimes in the whole abdomen. The pain causes nausea.

D: Lie down here. (palpation) Pain?

P: A little.

D: Here?

P: Pain ...

D: Here?

P: Aiyao ... very painful. I'm dying of pain.

D: No operation on appendicitis before?

P: No ...

We can see that both the doctor and the patient follow the maxim of quantity. The information is relevant to finding the problem.

P: I can't pass stool out these two or three days.

D: Constipation? For how many days?

P: This is my old disease. I've suffered from it for 30 or 40 years now. I take some medicines, ate some bananas, I felt better. I have poor appetite, feel bitter in mouth. I have stomachache and abdominal pain, and I feel bloated. I have headache when I meet cold wind, something jump hit in my head. I have bronchitis. I find blood strikes in sputum. I have rales in lung, I have pulmonary emphysema.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my heart. I am old. I have many diseases. Gastroptosis is an old disease. Arthritis makes me feel difficult in walking. It's not easy for me to go out to see doctor ...

D: When did you begin to feel like this? I mean, you can't pass stool?

P: Eh, three days ago.

D: Three days. Do you have abdominal pain?

P: Yes, but not very ...

Obviously, the patient's complaints violate the maxim of quantity. This is common with aged patients. In Western countries, old people try to prove themselves healthy and useful to society, whereas in China many old people take others' consideration

as respect and attention. This old woman believes that the more she complains, the better she can help the doctor make the diagnosis, and the more attention she will be paid. However, she actually makes it harder for the doctor to make a differenti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n. Most doctors seem to tolerate patients' violations of the maxim of quantity. Doctors allow patients to say what they want to say and encourage them by listening carefull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also good at finding the main message for the topic of the next turn and for further examinations as well as at inferring the conclusion. Patients want to tell doctors all their feelings and symptoms, whether they are real or imagined. This makes sense to patients as assisting diagnosis, not as being uncooperative. Doctors' violations of this maxim ar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Patients complain that doctors give too little information for them to know the nature of their diseases and treatment procedures. What the doctors reveal is "tolerance and guidance", whereas patients want "coope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is appears to be a special feature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The Maxim of Quality

The second maxim, that of quality, says that no untrue statement should be uttered purposefully. Both people in the conversation should be sincere and honest, speak true feelings and opinions, and tell their real purpose in the process of seek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Both hope to hear the truth as well. Doctors often violate this maxim. They want patients' cooperation in the treatment and encourage patients to have confidence in their health and future lives. The violation of this maxim is consistent with medical ethic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practice.

P: Doctor, what on earth I have? What is my disease?

D: It's not so easy to explain everything clearly in a short time.

P: Do I have to get a big operation?

D: No big operation, but you have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for a period of time for drip injection with some special medicines. You can become better gradually.

P: They say that I have got "blood cancer".

D: There is no such a term. Who told you that? Don't think too much. Don't think too bad. ...

P: But doctor, please, please tell me how many days I can live? If my disease can't be treated, I don't want to stay in hospital. Let me go home.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I don't want to spend all my money for the disease. I am old. They must live on. It's no use throwing money in this way. ...

D: Listen to me please. We try our best to treat you. This is the admission card. Ask your son to prepare. I'll come to see you in the ward tomorrow morning.

P: Doctor. ...

D: (*to her son*) Go downstairs over there. Get everything ready. Nurse will arrange when you are in section 12.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The patient was diagnosed with malignant lymphoma and was eager to know the nature of her disease. The doctor tried not to confirm the patient's suspicion because he knew that the patient came from an area with little education and mental tolerance. The only thing in the patient's mind was her responsibility to her family, a traditional value of Chinese women. The doctor felt

sympathetic but didn't tell the truth because he wanted her to have the treatment. The doctor admitted her to the hospital and discussed the treatment plan with her son. This is a traditional way of acting in Chinese hospitals. Few doctors tell the truth to the patients at diagnosis. They would rather say something such as "There seems to be some problems in the film, but further examinations are needed" or "We can operate on it, don't worry too much". No doctor would tell the patient how many days he or she can live but instead would say "The function of medicine doesn't work so fast, you will be better gradually" or "You look not so bad today". Doctors will discuss the truth with the relatives of the patient. In the pathology department, doctors are often required by the relatives of the patients to write two different reports. One reports the real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 to the physician or surgeon, whereas the other keeps the patient in the dark about the illness and makes the patient accept the treatment.

D: Did you spend your night outside about 10 days ago?

P: No. Just at home. I helped my wife with housework.

D: No?! Then what about your wife?

P: No. Surely no. We believe each other.

D: But I don't think that your wife can believe you.

P: I didn't do anything. ...

D: You'd better tell me the truth. The problem is advancing. It's no good for you. It's no good for your family. You must take proper medicine in proper time.

P: I don't understand.

D: Well, I'll keep secret for you. I must give you medicine only after I make correct diagnosis. Only when you tell me the truth can I make medical decision. If not treated in

time, the disease will do great harm to you and your wife. Early treatment is important. You are already a little late. Understand?

P: Ehr ... let me think it over. About two weeks ago, I ...

This is an example of violation of the maxim of quality on the part of the patient. The urologist had diagnosed the patient's disease, but he needed defini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ymptoms. The patient realized that his disease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violation of social ethics and was afraid of its effects on his family, his job, hi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his own reputation. Thus, he tried to mislead the doctor. The urologist saw through the patient's lie but didn't reveal it. He only tried his best to explain, guide, urge, educate, and persuade.

Generally speaking, in doctor-patient discourse, the doctor's violation of the maxim of quality i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atient's health. Patients' violations are either to hide breaking social ethics or to relieve relatives of worry. Doctors' violations of the maxim of quality are losing their special function of "benevolent deception", especially with patients with high education. The "trick" is too commonly used. Hence, some patients doubt the doctor's diagnosis and seek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through other channels. It is better for doctors to tell the truth and earn patients' trust and cooperation. As people learn more about health protection and medicine in China, doctors should gradually reduce the violation of the maxim of quality and increase truthful explanation to get patients' cooperation. This will require changes in current medical ethics.

The Maxim of Relation

The third maxim, the maxim of relation, means that whatever

the speaker says should be relevant to the main topic and to what the former speaker has said. Yet seemingly irrelevant questions may be relevant in this setting. The question "Do you drink beer?" seems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illness but is important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e disease gout. The question "Where do you work?" suggests that the patient's illness may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job. Ambiguous questions can also yield relevant answers. The following are answers to "How are you?":

1. I don't feel well. I feel a little numb in the back of my head and my right hand.

2. My eyes become more and more dim. Everything looks double even very close in the distance.

3. I have finished with my medicine. My headache is not so severe.

4. My tinnitus becomes less. I don't hear big noise since this Monday.

5. There is a little itching throughout the skin. No lump on the skin.

6. My heart jumps a little faster.

7. I feel much better. I can sleep well during the night. I don't feel very tired when I do some housework.

8. I went to climb Mount Tai last week.

9. I begin to go to work. They changed a new light task for me. I don't feel tired during the work. The company management takes care of me.

10. The mass seems larger. I can touch it myself.

These answers give a general idea about what kinds of patients are in which clinics for what. Some answers (e. g., Number 8) seem to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treatment. But in this setting, it means "I have recovered very well" after the

last operation and I am now strong enough to go out seeing and climbing mountains.

Usually, verbal and nonverbal expressions in doctor-patient discourse are all relevant to the setting and the topic. This differs from social talk. A cough during social conversation may be signal impatience or the attempt to interrupt, but in medical conversation, it may reveal bronchitis, a cold, smoking, or lung problems. A sneeze may be seen as disrespectful in social talk, whereas in the consultation it will be taken as a sign of a cold or rhinitis. A belch may be heard as a noise or interruption in ordinary conversation, whereas in doctor-patient conversation it may be a clue about dietary habits or digestion. Body language of both doctor and patient are also relevant. Proper dress or uniforms worn by doctors and nurses indicate treatment and health improvement. In a children's hospital, nurse uniforms are pink in autumn and winter and light green in spring and summer to show warmth, life, courage, and hope. An old woman in an outpatient department wanted to see a doctor with "white hair" because she related white hair with experience. So in the setting of the hospital, doctors and nurses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ir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Careless expressions might be regarded as hints about illness by some sensitive patients.

The Maxim of Manner

The maxim of manner says that the language should be clear. Clarity, simplicity, conciseness, and orderliness help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 Doctors follow this maxim by telling patients their illness conditions and drug effects using simple explanations and vivid metaphors to make complicated medical terms easy to understand. If there is a violation of this maxim, it is because the

patient's illness makes it hard for doctor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clearly.

D: How about your pain?

P: There is pain in my feet also in my waist. Foot pain connects my waist pain.

D: You just said it the wrong way. The main problem is in your waist. There is a bone hurt when you were working. Then the pain reflects to your leg. Well, in a simple way, when something electric line, no light can be turned on but when one electric bulb is broken. There will be no effect on the lights or the line. Understand?

P: At first one foot painful, but now two feet painful.

D: Legs, not feet. Mw... somewhat in the center. Do you have the history of trauma?

P: History of trauma? What do you mean by trauma?

D: Have you ever been crushed or hit by something heavy or hard, and fracture or sprain? Oh, well, I mean broken bone or twist or something.

P: Bones were not broken, but I often fell or hit by something hard. I way young at that time and didn't I mind at all. Went back to work after one or two day's rest in bed.

D: Do you do heavy work in construction site now?

P: No. Operation?

D: But the prognosis is not so good if doing operation now.

P: Prognosis?

D: I mean the result after operation is not so good.

P: But finally I have to be operated on?

D: Yes. But it's better to do operation when the pain of your bone is more severe than the pain due to the operation.

P: Then the result will be better?

D: Yes. What about some injections for a couple of weeks?

P: OK. ...

In this part of conversation, the patient had a protrusion of an intervertebral disk and an operation was necessary but not urgent. The doctor and the patient joined in the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They discussed the illness condition and possible common opinion.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both tried to explain everything clearly with simple explanations and vivid metaphors.

P: (Showing the doctor a bottle of medicine) Doctor, the more I take the medicine, the worse my stomach problem becomes. My stomach problem can't be treated any more?

D: (Studying the instruction on the bottle) You've taken the wrong medicine. Your stomach is afraid of cold food. The main components of the medicine are cold plants. How can you use the medicine?

P: I watch television advertisement, and I... .

D: Well, just like you want to go to Nanjing, but you get on the train to Shanghai. The faster the train, the farther you leave Nanjing. You must go to see doctor for medicine. You can't take medicine according to advertisement. Don't worry. How do you feel about your stomach?

P: Mm ...

P: I asked for sick leave a month ago and I've been at home since.

D: Never go out?

P: Seldom.

D: Do you have auditory hallucination?

P: What is auditory hallucination?

D: Eh ... I mean, do you hear somebody talking while alone at home?

P: Yes. I often hear someone talking about me. They are gossiping.

D: Do you know who they are? Is their voice loud?

P: Men and women. In the upper right of my head. My head is splitting with these noises.

D: Now think it over. Did you think of it or hear it?

P: I heard it.

D: Anyone around you in your house when you heard the noise?

P: Nobody at my home except for myself. Everyone went to work. Eh... yes? I couldn't see anyone then. How can ... ? How can I hear the noise? The noise is so loud that almost make my head explode. No one will be little others behind with such a loud voice. What's the matter? Why?

D: You have given a very good explanation. This is auditory hallucination. We shall try to solve that problem.

The doctor's questions followed the maxim of quantity, but the patient asked for clarification because he didn't understand the term "auditory hallucination". The doctor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induce the patient's own explanation of the problem.

Conclusion

The first three maxims are concerned with what to say whereas the fourth is concerned with how to say i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our maxims in doctor-patient discourse implements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f followed they can improve doctors' communication skill (what to say and how to say it) and make the clinical process

more satisfactory to patients. Yet contrary to Leech's argument, occasional violations in the medical context seem to produce a higher level of cooperation.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sult of purposeful violations in social talk. However, every rule has its exception. The cooperation principle is not a rule to control ordinary conversations but rather a law observed in research on social talk. The study of the use of maxims for cooperation in Chinese medical interviews has interdisciplinary usefulness. The observations in this study inform medical communication as well as disciplines such as linguistics, psychology, anthropology, and medical ethics.

China i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peoples' value conceptions are changing rapidly.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raising of the educational level, new studies will be needed to modify what has been concluded here. More and more exceptions are likely to be found in future studies.

Reference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1983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n Assessment study in Patients Preference for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Jiang Jin Zhao Binbin Liu Shuang David Smith

Abstract Health communication is a key topic in public medical care in recent year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mutual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outcome of medical treatment. This study is an assessment in patient preference for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A questionnaire is designed and distributed in the three cities in China. Data are collected and processed to answe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patients do prefer joint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to get their opinions shared by the doctors. It is concluded that better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medical outcome, but also reduce medical cost and benefit the society as a whole.

Key words Health communicatio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Since 1970's health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studies have become exciting applied area for the researchers to be concerned with examining the influences of human interaction on the provision of health care and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in the West. The studies have inquired into the rang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and among the health care providers and consumers, demonstrating how the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extended power influences on health and health care delivery and 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relationships established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the success of health care. China provides an interesting place to study health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Background of the Study

In mainland China, it seems that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lack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Patients often complain that they know neither their diagnosis nor medication when they leave their doctors office. Even when the patient is undergoing a major operation, the seemingly patient decision indicated by the signature of the person concerned is boiled down to acceptance of an informed consent on the part of the doctor. Patients are not informed of the nature of the illness, or the procedure of the treatment or the side effect of medication. They are at a loss as to what else they can do to help doctors and themselves apart from following orders. One argument which attempts to justify the continuation of passive role for patients is based on the grounds that people prefer to follow the decision made by doctors. Another argument from doctors is that patients are more compliant if they are not well-informed of the nature of the illness or the procedure of treatment. The reasons for this phenomenon are multiple.

Firstly, doctors are too busy for the whole day. The shortage of doctors limits the time any doctor can spend with any one

patient, which in turns limits doctor-patient talk. The increase in the population, the shortage of doctors and the rapid growth of specialization have made the pressure on doctor expertise even greater. Doctor's time is valuable and limited for any patient, and thus they have little time to talk to any one patient. In public hospital clinics doctors see 60 or more patients a day. Patients are expected to wait patiently and gratefully for their turn of treatment. Since the public health scheme dominates public hospitals, very few people have private doctors. Patients generally attend out-patient clinics, often located in hospitals, when they are ill. They will see whatever general practitioner is available. Repeated visits to the same general practitioners are rare. Hence, no long term relationships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can develop. There is virtually no continuity of care like that so highly prized in the British system, for example. Doctors and patients do not talk as friends, but almost always as strangers.

Secondly, several doctors may share the same examining room. Consequently, several patients may also be present and witness to the doctor patient consultation. Privacy is, therefore, limited. Personal topics are unlikely to be explored at length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is compounds the Chinese cultural reticence to discuss personal issues with others. Often, a number of patients will be waiting to see the same doctor. Occasionally they will be waiting in the examining room itself. Patients talk to each other while waiting. They compare symptoms and treatment. When visiting specialists, all may have the same problems and have much in common to share. They are almost informal self-directed support group. Patients may have visited more than one doctor for the problems or may talk about past problems cured. This talk with

other patients is often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even treatment advice for patients. Clinic communica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at between patients and practitioner. Patients practice, at least through talk, on each other. This replaces talk with the doctor.

Thirdly, doctors do not inquire into psycho-social issues as the relate to common illness. Headaches, diarrhea, sleeplessness, fatigue, etc. are treated as if they are physiological problems only, curable by the right medicines and foods. One dose not take emotional or stress problems to one's doctor. These are not topics for doctor patient communi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pertise is demonstrated by the ability to diagnose through physical examination alone. The best doctor may be able to learn the patient's problem by a sensitive touching of the pulse point on the wrist, observing the color of the eyes, noting the patient's bearing, and smelling any odor emanating from the patient. Watching, smelling, and feeling the pulse precede asking. If the doctor can make the diagnosis with no asking at all, the doctor is thought by the patient and other doctors to be especially skilled. Such an attitude toward care does not encourage communication.

Fourthly, Chinese doctors do not encourage or initiate discussion with patients. The assumption is that patients come to the hospital to seek experts to decide for them rather than to participate in decisions about their health care. When doctors have cured the previously incurable, saved previously unsavable lives, and enabled the injured and chronically ill to function again, it seems ungrateful to challenge the nature of their medical practice. Thus the issue of the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patient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 making has remained unexplored.

When we contemplate this system it would be easy to conclude that

it fits collectivist assumption. Patients matter little as individuals and defer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powerful physician. The patient's role is to follow orders respectfully. They don't feel it appropriate to ask about themselves. They don't have or expect individual privacy. Such a system should be one in which the individualistic autonomy value would be rejected by patients. Therefore the desire for participation in medical decision may be regarded as transcending cultures but still may exist in this collectivist medical system in China.

Research Purpose and Method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advance our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patient preferences for decision making in PR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certain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gender, education, income and perceived health status may affect preferences.

Research questions are posed as follows:

1. Do Chinese people prefer to make medical decisions themselves, or make the jointly with their doctors?

2. How do PRC people's preferences compared to those of people in Western countries?

3. Do subjects from different cities in the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differ with regard to decision making preference?

4. Are PRC people's preferences related to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of age, gender, income, education and marital status?

5. Are Chinese people's preferences related to other variables assessed: Their perception of their own health status and their use of western medicine o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A questionnaire of "Patient Decision Making Preference Scale"

is made in the light of a revised form of the Autonomy Preference Index.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with a few modifications. The first 9 questions are about patient personal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from the 10 to 26 are about patients opinions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A five-point scale was attached to each of these questions, ranging from strongly agree to strongly disagree. The same research was done in Hong Kong, Australian,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other members of the whole research team under Professor David Smith fro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From the year 1995—1996, the questionnaire was distributed to four hundred and forty-five subjects from community groups, retirement clubs, and individuals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by Jiang Jin in Suzhou, by Zhao Binbin in Beijing and by Liu Shuang in Harbin with Professor Smith as supervisor i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Subjects were allowed to take the questionnaires home and mark them during their spare time if they wanted. They were generally given a couple of days to do this.

Table 1 summarizes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for subjects that resulted from this data collection process. Genders were nearly balanced. Incomes were relatively low, but not out of line with usual incomes then in China. The majority were married. About two-thirds were from 25～65 with fewer of the remainder over 65 than under 25. Seventy percent had higher education. The relatively high education levels may reflect a greater inclusion of the members of university communities in the sample.

Table 1 Subject demographic

Gender	No.	Percentage
male	202	47%
female	228	53%
Age		
<25	126	29%
26～45	184	41%
46～65	103	23%
>65	31	7%
Monthly Income (RMB)		
<400	96	22%
400～600	128	30%
600～800	91	21%
800～1 000	76	18%
>1 000	39	9%
Education		
primary	5	1%
secondary	127	29%
university	248	56%
university+	64	14%
Marital Status		
widowed	6	1%
divorced	13	3%
married	269	61%
single	157	35%

Results

General Item Analysis

The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asked about PRC people's differences for who should make medical decisions. The data in Table 2 present the mean scores for the decision choices. Subjects in general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preference for joint decision making across the general items. They also preferred doctor decision to patient decision making.

Table 2 Mean score for patient, doctor and joint preference

	Doctor	Patient	Joint
Mean score	3.17	2.66	3.63
Dr. compared to Pt.	$t=10.81$	$p<0.0001$	
Dr. compared to Jt.	$t=-8.79$	$p<0.0001$	
Pt. compared to Jt.	$t=-22.01$	$p<0.0001$	
(5=strongly agree; 1=strongly disagree)			

Research question two asked how Chinese people preferences compared to those of people in Western countrie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compared data with scores obtained in a similar study done by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team in UK, US, Australia, and HK. Table 3 shows the result of the comparison.

Table 3 Comparison of mean preference scores from five sources

Source of Subjects	Number of Samples	Decision Preferences (mean scores)		
		Dr.	Pt.	Jt.
PRC	445	3.72	2.66	3.63

continued

Source of Subjects	Number of Samples	Decision Preferences (mean scores)		
		Dr.	Pt.	Jt.
HK	440	3.36	2.99	3.99
UK	143	3.09	2.82	4.25
US	285	3.03	2.80	4.44
Aust.	113	2.71	3.17	4.36

There is a general tendency towards preference for joint decision making across countries with US samples being the highest. PRC subjects are higher on the doctor score than the three Western countries but lower than that of HK samples. PRC patient and joint scores are lower than the three Western countries as well as HK.

The third research question asks if subjects in the three cities differ with regard to decision making preferences. Table 4 demonstrates the result.

Table 4 Decision preference scores of three cities in PRC

Decision choice	Harbin	Beijing	Suzhou
Dr.	3.45	3.12	3.068
Pt.	2.84	2.71	2.58
Jt.	4.12	3.52	3.53

Difference on the t test are significant, $p<0.0001$, for all within city comparisons except for the doctor/joint comparison in Beijing where the difference is $p<0.01$.

From Table 4 we can see samples from Harbin scored highest in all three choices. Samples in Beijing scored higher than samples

in Suzhou in all choices except for joint decision making. Of all the comparisons made the mean difference across three cities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5% level except for the patient and joint scores between Beijing and Suzhou.

The fourth research question asks whether PRC people's preferences are related to the demographic variables. Doctor, patient and joint preference scores for the general items were analyzed for differences in gender, age, education, income and marital status. Table 5 gives the results.

Table 5 Demographic variables and decision preference scores

Variable	Dr. score	Pt. score	Jt. score
gender			
male	3.15	2.69	3.55
female	3.14	2.64	3.71
*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0.429$			
age			
>65	3.40	2.64	3.60
46~65	3.25	2.48	3.43
26~45	3.15	2.72	3.71
<25	3.08	2.73	3.70
* difference between <25 and 46~65, $p=0.0319$			
** difference between 26~45 and 46~65, $p=0.008$			
education			
primary	4.17	3.13	3.30
secondary	3.28	2.56	3.38
university	3.15	2.71	3.71

continued

Variable	Dr. score	Pt. score	Jt. score
university+	2.97	2.64	3.83
* difference between primary and university+, p=0.202			
** difference between secondary and university+, p=0.0038			
income			
<400	3.17	2.78	3.82
400~600	3.02	2.58	3.65
600~800	3.23	2.67	3.47
800~1 000	3.32	2.68	3.52
>1 000	3.13	2.62	3.72
marital status			
widowed	3.37	3.69	3.89
divorced	3.68	2.74	3.76
married	3.20	2.60	3.58
single	3.06	2.76	3.69
* difference between divorced and single, p=0.437			
** difference between married and single, p=0.044 7			

All comparison were processed using the ANOVA and Fisher's PLSD.

The data from the demographic table are of interest. Women preferred joint decision making more than men did. Doctor preference score declines linearly with decreasing age and with increasing education. Older and less well educated patients preferred doctor decision. The joint preference score is the highest for the youngest and the best educated. The choice to decide alone and the joint preference scores are both lowest for the 46~65 age group. But

again the preference for joint decision making is strong. It is the highest for all age groups and for three of the four education groups. Only th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level prefers doctor to joint decision making, and that group has only 5 subjects, 15 of the sample.

Marital status also effects doctor and joint scores, but no patient scores. Divorced people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 than did the single group. Married people had the lowest score in joint decision making.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e absence of any differen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and decision making preference.

The last research question asks if PRC people's preferences are related to other variables assessed health status and the use of the doctor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or western medicine. Table 6 illustrates the difference.

Table 6 Health status and medication preference scores

	Dr.	Pt.	Jt.
Health status			
very poor	3.18	2.83	4.50
poor	3.60	2.56	4.06
fair	3.16	2.62	3.60
good	3.14	2.68	3.60
very good	3.14	2.95	3.86
Choice of medication			
both	3.19	2.70	3.74

continued

	Dr.	Pt.	Jt.
equally	3.01	2.64	3.60
Chinese	3.86	2.82	3.61
Western	3.25	2.64	3.60

From the data of table 5 we can see that doctor decision making preference with the declining of self-perceived health statu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very poor group. Patient decision making scores decrease as the self-perceived health status decline with the exception of very poor group. As for joint decision making, the score increases with perceived health status beginning from fair to very good but from poor to very poor it is the reversed direction. Very poor group score highest in joint decision making and rank the second in patient and doctor decision making preferences. The reason for this may be that they went to see doctor more often than others. They want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cision making because they think that they know much better about their own health condition.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that those who see doctor most often will become doctors themselves.

As for the Western medication or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for minor disease, 52% chose Western medication when they go to the clinic, 4.7% chos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21.5% chose both and 21% chose each equally often. Those who chose Western medication had a lower joint score than that of other three groups. Those who chose both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ation and Western medication had a higher mean joint score than the other three groups. Those who chose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ation had a higher mean score in patient decision, and those who chose equally

had lower doctor score than the other three groups but the difference is not as big as other mean scores.

Discussion

From the research results above,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 is that all the subjects from the three cities demonstrated a significant preference for joint decision making rather than doctor or patient decision making in medical interview. This preference looks apparently counter to what is regarded to be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 which is regarded as doctor decision making. This issue of decision making matters much in Chinese medical practice just because it reflect medical ethics in patient autonomy in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 best approach to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We had begun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mainland Chinese patient would prefer doctor decision making orientation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ecause we usually regard them accept doctor's decision in a passive way with greater power and authority on the part of doctors. However, the data apparently show that the mutual reciprocation will be the best when both doctors and patients can take part in joint decision making. Though the mean scores for the preferences are more or less different from the different cities, they are almost similar in the three cities which can to some degree represent the most parts in the mainland China. What's more, the Chinese subjects do not appear to differ much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areas in regard to the role they want to play in the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Chinese and Western societies differ as any societies do, and the ways of thinking and behaving are easy to contrast, yet here we have found some similarities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preference.

Brody argued for mutuality for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on three ethic grounds: (1) It makes medical practice more effective by reducing the traditional im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physician and patient. (2) It is consistent with a growing awareness of the limitation of clinical knowledge. (3) It benefits patient's self-esteem at a time when illness attacks just that feeling of control. (4) It enhances the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by diminishing the tendency to view patients as objects to be manipulated. (5) It provides patients with more realistic expectations. (6) It may improve the outcomes of treatment. Therefore, the idea of joint or shared decision making will be helpful in medical communication not only because it leads to better outcome but also improves medical ethics in doctor patient relationship.

The decrease of the doctor decision making preference with the increase of education level shows the power of knowledge in the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choice. The unequal roles of the doctor and patient in the clinic are the common practice in medical interview because doctor has the authority, expertise, the access to treatment and medicatio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nication becomes a goal of patients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so that they will not be kept in dark as the nature of their illness and the effect and side-effect or the outcome of the treatment. The anticipation for joint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demonstrates that the patients in the mainland China expect for more medical knowledge, they want to know what, why and how, and they want to participate and have control over themselves while they meet health problems. Wh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re on the more equal bases, they feel more comfortable and confident facing bravely their illness for better cooperation with doctors.

Conclusion

From the comparative study above we can see that the values of medicine have been changed and the conception and perception in the health care has also been altered. Respect for authority is a virtue cherish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since the Confucius time, while the desire for joint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demonstrated from the investigation transcends it.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the PRC subjects made almost the same choices as did those subjects from other four resources. They preferred joint decision making most but the size of the joint decision scores for PRC subjects seems somewhat smaller than those of the other four, which shows the degree of the desire and a greater reliance on authority. Chinese people are regarded more collectivism while Western people are looked upon as more individualism, but such concept has limited application. It may describe a general difference in societies, but may neither predict well what people will do in specific occasion, nor what they prefer in various spheres of their lives. Health may be closely tied to our lives that we cannot divorce ourselves from the involvement, and in such case, some measure of individualism will appear even in overall collectivist societies. Similarly, even the most individualistic society will show some concern for the interests of all. Health may be an area where we will find most individualism.

The preference for joint decision making demonstrated by the subjects in this study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case for mutuality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to increas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improve the treatment outcome. The power and control of the doctor over patients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paternalism, but mean the knowledge in medical field. It suggests that Chinese

ordinary people should also increas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health education. One who would control must invite control. When one is open to influence, one is more likely to be influential (Smith, 1996). Thus patient participation may allow physician to exercise greater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patient health behavior, and entering into a partnership with the patient may open possibilities for joint activity in the promotion of health. Patients prefer joint decision because they believed that they have been listened to, informed, and provid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pinions on their own health conditions and medication. They are satisfied with being involved and shared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rather than making decision by themselves. They are no more kept ignorant while facing a formidable challenge. Patient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and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s seek mutuality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The present study argues for an improvement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in China. The fact that people prefer to be involved in making medical decision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are in fact doing so, but they expect to do so,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nd explanation from their doctors. Society requires that government officials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teachers exchange ideas with students, and doctors talk to patients. Energy and effort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learning how to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 and nurturing an ethics i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Fostering pati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is not only a nice humane thing to do, but also a tool for the improvement of health care and better treatment outcomes. Health concerns are largely social concerns. If the patients in China are to take active roles in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doctors, as well as

in other health behaviors, and if, as a result, maximized their personal well being and minimized both the health risks to others and the costs to society, a change in this communication pattern could be very beneficial to Chinese society as a whole.

References

[1] Smith D. Ethics in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J], Critical Care Clinics, Vol. 12, No. 1, 1996

[2] Smith D. Bennett, K. C & Irwin, H. Hong Kong Patients' Patients Preferences for Participation in Medical Decision Making[A], in Smith D. (ed.) Working Papers in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China,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rogram of the David C. Lam for East West Studies, Hong Kong, 1997

Appendix

Patient Decision Making Preference Scale

We are studying what Chinese people think about the making of decision about their health care. Please help us by answering the question below. Thank you.

1. Age ________ 2. Sex ________ 3. Monthly income ________ 4.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attained ________

5. Are you:

   a. single b. Married c. divorces d. widowed

6. Please rate your health:

   a. very good b. good c. fair d. poor

   e. very poor

7. Circle below the response that best describe how you think about yourself.

a. very modern
b. somewhat modern
c. somewhat traditional
d. very traditional

8. Again, circle below the response that best describes how you think about yourself.
   a. very Chinese-oriented
   b. somewhat Chinese-oriented
   c. somewhat Western-oriented
   d. very Western-oriented
9. When you are ill with an ordinary illness and decide that you need to see a doctor, which is true of your choice of doctors?
   a. I usually see only a Western doctor
   b. I usually see only a Chinese doctor
   c. I see Chinse and Western doctors equally often
   d. I usually see both a Western and a Chinese doctor

Please circle the response to each statement below that represents your own view.

10. Important medical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by your doctor, not you.

strongly agree	neither agree	disagree strongly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11. Important medical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by you, not your doctor.

strongly agree	neither agree	disagree strongly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12. Important medical decisions should be made by you and your doctor together.

strongly agree	neither agree	disagree strongly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13. You should go along with your doctor's advice even if you

disagree with it.

strongly agree |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 disagree strongly
agree | | disagree

strongly agree
agree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14. If you and your doctor disagree you should talk it over and decide together.

strongly agree
agree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15. When hospitalized you should not be the one making decision about your own care.

strongly agree
agree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16. When hospitalized you should be the one making decision about your own care.

strongly agree
agree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17. When hospitalized you and your doctor should talk over decision about your care and make them together.

strongly agree
agree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18. You should make decisions about your own everyday medical problems.

strongly agree
agree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19. Your doctor should make decision about your everyday medical problems.

strongly agree
agree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disagree strongly
disagree

20. Your and your doctor should talk over your everyday medical problems and make decision together.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1. If you were sick, as your illness became worse you would want your doctor to take great control.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2. If you were sick, as your illness became worse you would want great control.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3. If you were sick, as your illness became worse you would want more discussion and mutual decision making with your doctor.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4. You should decide how frequently you need a check-up.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5. Your doctor should decide how frequently you need a check-up.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26. You and your doctor should talk it over and decide together how often you need a chek-up.

strongly agree | agree | neither agree nor disagree | disagree | strongly disagree

从"模拟国际会议"看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

姜 瑾

摘 要 本文通过对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模拟国际会议"现场的观察，分析了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强调实际交流能力的重要性，从突出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调节语言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提高交流自信心、语言认知方法的改进、增加母语的正迁移作用、强化课堂教学的促进功能、综合语言技能的改进以及测试评估方法的改革等方面，阐述了围绕着提高国际交流能力的教学指导思想进行了英语教学的可能性，探索了研究生英语教学改革的新路子。

关键词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模拟国际会议，教学改革

"模拟国际会议"是近几年来在以素质教育观指导外语教学改革和实践过程中，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学位课程考试的一个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达到研究生英语教学大纲总则所规定的"在（英语）教学中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的原则，培养提高研究生运用英语的能力"。从整个测试情况来看，这是对研究生外语教学改革实践结果的评估，有利于推动课堂教学方法的改进和学生学习自主性和积极性的提高，能促进研究生对语音、词汇、语法等英语基本语言知识的进一步准确掌握，以及听、说、读、写、译等英语基本技能的全面使用，更使研究生在原有英语基础上向专业英语方向努力，既能及时了解当今世界最新科技动态，又能将本人在专业领域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思路直接与全球同行交流。但从细节方面来看，考生的

陈述及与评委的问答之间也显示了外语教学中的许多不足之处，无论在听说方面还是在语义语用方面，或交流沟通方面，都呈现了多年来外语应试教学中的某些缺陷所产生的弊端，需要外语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来提高和改进。

一、研究生英语教学应突出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英语教学是一种在本科或硕士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教学过程，它包含基础英语技巧的进一步训练，也包含了专业英语水平的提高。研究生英语运用能力直接反映了他们的语言素质和专业素质，对其未来的科研发展有直接的影响。因此，研究生英语教学应突出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使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和论文拿到国际上发表，能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准确流利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能在世界各地毫无语言障碍地开展科研工作。

1. 缓解掌握语言系统与学会语言使用的矛盾

要突出实际语言应用能力养，首先要缓解掌握语言系统和学会语言使用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多年的外语教学中过多地追求语言系统中语法的正确，而忽视了语言表达时应有的得体，强调了教学计划的完成和书面成绩所显示的语言能力，而对语言实际交际能力注重不够。所谓的交际能力，是指“不仅能使用语法规则来组成语法正确的句子，而且知道何时何地向何人使用这些句子的能力”。交际能力包括：① 语言词汇及语法知识；② 说话规则；③ 掌握如何使用不同的言语行为，如请求、道歉、致谢和邀请等，并对其做出反应；④ 掌握如何适当地使用语言。然而，课堂教学中大量的标准语法操练使教师和学生考虑了太多的语言系统框架，稍稍偏离便认为是教学的失败。学生离此更是举步维艰，各种测试都以学生对语言系统的掌握作为评判的标准。美国教学专家 Widdowson(1990)列举了课堂教学中常用的一些句型操练模式来区别语言系统中的用法和具体使用不当对教学效果的不同影响，认为在课堂上学生和教师更多地强调语言系统中的各类用法的强记，而不注重这些用法在实际语言交际

中的流利使用，把惯用法放入语法项目或语言系统中进行比较研究或进行标准化的句型操练，却不从具体使用这一角度进行引导。

在研究生教学阶段，应避免把掌握语言知识要点当成语言学习的终点，要逐步减少以常规方式讲授语言系统基础的步骤，而应转向以语言实际应用为重点的综合语言技能培养，将精读、泛读和专业阅读相结合，注意各种文体的不同写作风格，探索语言中承载的丰富文化内涵，了解国际高新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从阅读直接进入本专业的研究领域，为学位论文的开题和撰写拓宽思路，做到读以致用，读用结合；同时加强听说课的实际功能和写作及翻译理论与技巧的强化训练，将语言用法变为语言使用，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技能，从要求应该怎样做发展为我该如何做，最终提高实际使用语言能力。

2. 调节语言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不平衡

在我国的课堂英语教学中，语言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多年来大班英语教学的满堂灌输教学法，使研究生在某种程度上习惯于被动的语言接受，缺乏积极主动的参与精神，形成了英语学习时埋头记单词、认真查语法的惯常做法。有些研究生甚至每天都在背英汉词典上的词条，将语法书上的每点细节都研究透彻，大脑里储存了大量的语言知识。书面考试，特别是考标准化多选题，很多研究生都能考出优秀的成绩。但是一旦要求现场发挥、进行直接外语对话时，他们就会感觉到所有想要表达的内容都储存于记忆的某个深处，确确实实地存在，似乎就在眼前，呼之欲出却又无从出口。在进行书面表达时，他们想用一些非常书面化的单词与较复杂的语法结合，来表达专业层次的思想，但结果是僵硬的"正确"的句子非但毫无流利的美感，且意思不确切、陈述不到位。这一切都是由于语言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的，这种现象只能在大量的语言学习实践中逐渐调节。师生双方都应该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的交流气氛，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主动参与并自我调节，尽量将大脑中的所储存的语言信息挖掘出来，准确灵活地自如运用，提高语言输出率。

3. 提高各个层面上交流的自信心

在进一步培养研究生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教学活动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高他们用英语交流时的自信心。很多书面考试成绩极好的研究生也在某种程度上“惧怕”在公共场合用英语演讲，“面子”问题是提高交流自信心的一大障碍。研究生想表达的观点往往比较深奥，而他们认为简单的常用词汇无法表达确切意义，又唯恐复杂的词汇引起歧义，在犹豫斟酌中失去了信心，索性闭口不言以避免表达错误引起的误解或让人看低自己的外语水平，渐渐地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研究生英语教学阶段一定要扭转这种局面。教师应对学生的任何表达勇气进行反馈，最佳办法是肯定的情感反馈与否定的认识反馈。这个过程应由简入难，由浅入深，从日常交际到学术交流，以提高各个层面交流的自信心。

二、课堂教学中应注重认知方法的改进

1. 增加母语对外语学习的正迁移作用

迁移现象实际上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在英语教学中，教师应该“为正迁移而教”，即把迁移当成一个教学目标，概括学习母语的经验，并用于促进、解释和观察外语学习；而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心理机制调节，努力增加正迁移作用。母语对外语学习的促进迁移不在于明显地减少某种语言错误，而是减少整体的错误率。在外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学习者能正确使用与母语特征相似的目标语特征，然后再用目标语的结构来替代，这时候母语的促进功能相当有效。但在研究生阶段，当学习者达到一定的语言熟练程度时，认知目标便涉及到某些技能的发展：观察、区分并检查语言或文化现象；收集、分类、组织信息；储存、检索资料；构造、实施、修正规则；问题推理、解析；以及目标语和目标语文化与母语和母语文化相结合，对这些思维行为应该从认知角度来激发。适当地提高目的语输入和输出的质量和数量，即增加趣味性、多样性和难度，增强学习任务的挑战性，正确评估现有的语言熟练程度，了解个体的要求和兴趣，设计出具有一定

挑战性然而又可接受的课堂交流操练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母语对英语学习的正迁移作用。

2. 强化课堂教学的促进功能

课堂教学对提高研究生英语交流能力的促进功能如下：① 对语言意义的推敲有助于外语词汇的获得；② 鼓励学习者构造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从长远看可以导致更高的语法准确率；③ 教师控制的语言教学过程有利于规范语言技巧的获得，而结合学生控制的自然交际有助于发展口语技巧；④ 学习者应该得到符合他们理解水平的高质量的输入，应该通过定义清晰的结构和调节到位的教师语言所授的课程有所收获，并组织相应的语言输出；⑤ 课堂里听其他学习者讲话并进行评估和修正错误，有利于提高自身语言表达的流利程度和得体性。

3. 语言认知方法的改进

语言学习认识方法必须随着学习阶段的不同而改变。在外语学习初级阶段，学习者应对所学单词的形式和用法有足够的注意力以确保其正确使用。而到了外语学习的中后期，特别是研究生英语学习阶段，词汇学习中应意识到一词多义变化和一物多词变化以及语境变化。一个词的意义不是词本身固有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源于人们在不同语境中对它的"利用"，这种利用不是任意的，而是来源于人的认知联想，从而形成了一个词的有联系、有规律的多义范畴。另外，词义范畴的边界也不是固定的或明确的，而是有变化的并具有弹性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和不同的时代，其原形意义不一样。这样，学习者不但能了解词义的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其演变机制，解释一些词的具体义项与抽象义项之间的联系，更能提高深层次全方位的阅读理解能力。

在语法学习方面，除了进行句型和功能分析外，还要解释句子连贯性的内在原因，进行句法篇章的信息结构分析，了解不同句法完成任务的不同功能，反映出不同的认知世界，对语言输入进行记忆、组织、比较、匹配、类推、重组、转换等语言运用技巧的训练，理解语言意

义并形成对外语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同时对已经掌握的语言单位以一定的方式加以利用，构成语言输出，提高语言的创造力，用已掌握的外语知识处理各种科学信息，将语言能力转化为交际能力，以积极自信的形象走向国际论坛。

三、从语言能力的提高到模拟国际交流实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前研究生英语教学指导思想，必须从语言能力的提高逐步向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转化，可以符合社会的需求、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的需要。研究生外语教学的各个环节都应该围绕这一指导思想进行课堂设计、教材教法研究、考核测试及检验评估。

1. 综合语言技能的不断改进

传统的英语教学注重单项语言技能的纵向发展而缺乏横向的联系、连贯或衔接，非英语大环境又使得英语学习者无法实现与其他非语言因素的自然沟通，纯粹的单项技能培训很难实现研究生国际交流演讲讨论的目的。从实际交流状况来看，英语知识和听、说、读、写、译这五项技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因此，研究生英语教学中要注意两大交叉点。

首先要注意各项技能和语言知识的横向交叉。要做到学用结合、知行互惠，缩短英语教学和实际国际交流之间的差距，加强英语文化导入，切实培养研究生适应实际交流环境的语言整体感，拓展其思维空间和知识面，提高其语言综合素质。

其次是注意日常交际和国际交流的纵向交叉。从听、说、读、写、译等基本技能着手，将已掌握的日常会话、例行公事、普通函电等交流方式巩固提高、再深入到各个专业领域，如摘要归纳、文献综述、论文的写作和发表等与国际交流有关的各个方面。这种综合性的立体交叉式英语教学，才能真正体现“学习语言的同时也从语言学习中获得知识”和学用结合、从知识到实践的英语学习宗旨。

2. 考核测试制度改革

研究生英语考试应从三个方面的内容着手：一是卷面语言能力测试，包括五项基本技能测试；二是专业英语水平，包括阅读理解、文献综述、摘要撰写及英语论文写作与发表等。还可以增加平时考查的成绩作为参考或作为组成部分，如课堂交流练习、每日新闻发布、校内外英语演讲比赛，平时参与的外事活动等等。只有这样的测评方法才能扭转研究生英语教学以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学模式，真正检验学生以英语为工具进行本专业学习和研究的程度，也才能全方位的地提高研究生语言素质，达到参加国际交流之目的，最终站在国际会议的讲坛上向全世界宣读自己的科研成果。

参考文献

[1] 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Skeham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 Widdowson H G.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Reform of Non-English Major Graduate English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Jiang Jin

Abstract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on the "Im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y the non-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s, the present paper analy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enforcement on the practic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nd study in postgraduate classe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language application competence, adjusting imbalance between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elevating confidence in communication, modifying linguistic cognitive methods, foster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language skills. 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possibilities to help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rough more active classroom functions and the new approach to the educational reform on the part of graduate studies.

Key words Non-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s; im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ducational reform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

姜　瑾　钱小玲

摘　要　随着社会的需求，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英语教学正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要求与挑战。如何根据我国研究生教学的具体情况，培养出能用英语熟练交流的21世纪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焦点。本文通过分析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生英语教学的特点，提出了学习动机与思维方式、认知差异及学习效果、学习策略的灵活应用以及教材改革等方面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问题，对策

随着社会的需求，非英语专业研究生的英语教学正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要求与挑战。如何根据我国研究生教学的具体情况，培养出能用英语熟练交流的21世纪高级技术与管理人才，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焦点。笔者在多年的研究生英语教学中作了一些探索，发现从教学目的到教学方式以及学生的学习方式等都有值得改进的方面。

一、教学目的与教学重点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已基本掌握了英语基础知识，然而，大部分研究生的实际英语应用能力与他们的学习成绩相去甚远，考试得分较高的学生不一定能熟练地进行实际意义上双语交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他们从小到大受的是英语应试教育，结果在

多年的英语学习后还无法达到用英语自如表达的水准，无法对语言的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理解，从而达到语感共鸣。其中教学目的和重点的不明确是造成该现象的因素之一。

目前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模式以及师资配备等方面基本上是本科英语教学的延续。而教育部将研究生英语课程规定为一门重要的学位课程，也明确了其教学宗旨，要求学生掌握英语这门工具进行本专业的学习、研究与国际交流，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教学中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的原则，培养和提高研究生运用英语的能力。可见，非英语专业英语教学与本科生英语教学应该有相当大的区别，不能一视同仁。

由于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已成为本科学位的必需，大多数研究生的英语水平已接近或相当于六级，这就需要在教学中避免重复性，准确定位，明确方向。再则，研究生生源较为复杂，听、说、读、写、译各项能力差异极大，再加上各种专业方向的差异，难以满足所有的需求，因而，只有想方设法找出教学的共需点和明确教学重点，才能突出实用原则以提高综合运用能力。通过研究生阶段的英语学习后，让研究生在英语交际能力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使英语成为他们在科学研究中得心应手的工具。

二、学习动机与思维方式

学习动机对英语学习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对学习过程的思维方式也有某种限制作用。研究生的学习动机大都是为了"应付考试"和"获取国际科技新信息"，这两者属外语学习动机分类中的工具型动机。这一学习动机与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取决于其原有的语言知识和社会经验，同时也受学习动机所制约。在本族语思维基础和工具型学习动机的框架下，研究生只能围绕着精心挑选的教材，利用有限的学习辅导手段(如录音机、辅导参考书籍、词典等)，先学习理解语言规则，再通过死记硬背和模拟训练，踏实而又艰难地提高英语水平。

改进办法是：走出“应试”误区，改变学习动机，跳出本国语思维框架，融人英语社会文化背景知识，不断提高英语会话能力。

在当前英语资源丰富、语言环境极好的背景下，研究生应该改变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在习惯于视觉学习和个人学习的同时，需要尝试更多的方式，如听觉学习，体验学习、动手学习和小组学习；要利用媒体学习，如利用因特网、电视、电台、英文报纸杂志等；要进行娱乐学习，如看原版电影、碟片，听歌曲声带等；开展互动学习，如因特网上热门话题的讨论、E-mail 的交往、英语沙龙的参与、客串导游的亲历等。在更多的学习方式的基础上改变思维方式，努力使自己适应并接受各种学习方式，既发展兴趣，又提高动手、动口的能力，将英语的学习和运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改变学习和思维方式必将在语用能力上有极大的突破。

三、认知差异及学习效果

多记多练是词汇学习的关键。研究生原有的英语知识、母语词汇和分析理解能力使他们掌握的词汇量很大，做考卷的词汇部分准确率较高。然而过多地依靠母语对应词，对单词的深层理解就会产生一定的限制，语感不强，无法产生语言共鸣，快速阅读量不够，信息获取量就相应减少。

近年来研究生人学考试取消了听力，因而就减弱了听力基础的扎实性。为了应付考试再强化听力，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与得到的效果不成正比，实际听力水平提高很难。由于缺乏语音基本功的训练，一个单词听到的和看到的感觉常不一样，再加上自己的错误的或不标准的发音干扰，过多地用母语对应词逐词思考，不了解所听话语的环境及文化背景知识，在几秒钟内来不及思考整体含义，因此总觉得在反应上慢了一拍。这种听力训练不能使学生适应实际英语语言交际，没有开口讲的机会更使他们无法进行面对面的国际信息交流，这是研究生英语教学中最迫切需要解决但又是较难解决的问题。

对语法规则的掌握，研究生显然是驾轻就熟，因为这符合他们的

思维方式。他们将词汇、语法和句型结合来理解句子的表层意义，再加上自身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去阐述深层含义，基本上不会造成误解。在造句作文中，语法框架痕迹明显，无原则性错误。但过多地拘泥于语法规则和句型模式束缚了他们的想象力。功能语法还无法在非英语专业学习者中推广，因此在书面翻译和写作上为追求语法正确而句型僵硬，口译不能随机应变。

由于大学英语教学环境所限，研究生首先发展的是阅读能力。他们通过联想原有知识来挖掘语篇深层含义，边读边预测，充分利用母语基础从文章中获取信息、增长知识，而这一切又进一步推动了有效阅读，这是研究生英语学习中的强项。但用这种阅读方法速度较慢，在限时限量的快速阅读中，时间不够的矛盾较突出。

在写作问题的调查中，结论基本一致，即母语思维，更确切地说，是个心理翻译过程。作文题目是指定的，列有写作大纲。所写文章层次分明，语法和拼写无大错误，但大多是英文的语法和单词按中文概念顺序排列而筑砌的“八股文”，有时对应词的使用不符合语言功能和英语文化习惯，缺乏翻译训练，句型又不符合英语交际功能的要求。

综上所述，认知差异导致不同的学习效果，研究生听、写能力较差。教师应灵活地改变教学策略，将学生的思维方式朝着有利于英语学习和实际应用的方向引导。

四、教学中的实践和参与

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首先应该倡导实践性。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学生的心理发展更加成熟，观察能力、推理能力与创造能力高度发展。他们需要一种富有挑战、刺激和自主的课堂氛围，更希望有大量的实践机会，亲身感受和体验语言的交际过程。因而，课堂教学实践必须既基于语言知识，又从语言中学习知识并超越语言知识，将语言技能、社会文化和交际行为合为一体，让学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如地畅游在语言和知识的海洋中，欣赏语言给人类带来的美感享受，吸收语言中蕴涵的大量人文科技信息，最终能兴致勃勃地用

英语与人分享交流知识技能。

参与性是研究生英语教学课堂里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根据二语习得理论，理想的外语课堂教学应能是学生获得更多直接使用目的语的场所和机会，让学生沉浸于使用目的语的环境之中并进行有意义的交际，激励学生参与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的交际活动。然而，在借鉴优秀传统经验，开展课堂活动时常常会遭遇学生的冷漠、紧张、不耐烦、甚至抵触情绪，原因之一在于成年人的特点——强烈的自尊心和面子心理害怕错误——哪怕一点小小的语法错误也会使他们觉得丢了很大面子；原因之二在于学生仅仅满足于通过各种考试获得书面证书，或者只为拿到学位证书，而不屑参与一些短小有趣的课堂实践活动。因此，教师所需要的是更大的耐心，更智慧的手段和更灵活的方法去设法创造一种安全和谐、活泼生动的课堂气氛，消除学生紧张困窘的心理障碍，让那些年龄大、生活经历丰富或很讲究面子的研究生都能感到英语学习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活动，从而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兴趣和积极性。

五、教学策略的灵活应用

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强求学生适应教学，而应扬长避短地因人施教。如何在班级大、人数多的课堂里获得语言输出与输人的平衡，通过教材这一媒介帮助学生产生更大的学习动力，达到最佳效果，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要注意教学环节的有效性。用释义、阐述、翻译、直观演示、构词分析、同义、反义、上下文等手段展现词汇教学的巧妙构思，使学生对词的结构产生无穷的兴趣和丰富的联想，并让学生对每个单词的词汇意义、结构意义、社会意义及语用意义等进行深层了解，而不仅限于对单词的表层理解和记忆，同时进一步提高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信息处理能力，加快阅读速度，形成量与准之间的平衡。在复习巩固语法知识进行强化综合训练的同时，引导学生在大量阅读中让视觉信息和非视觉信息共同起作用。充分利用阅读中的“形象思维”与情

景交融，在自己原有的社会知识和书面文字知识间架起桥梁，将中文能力与英文水平相结合，让翻译与符合解码共同起作用，扩大信息量，加快阅读速度。课堂上多进行翻译练习，以提高口、笔译及写作等实际能力。每周写一篇作文，在教师批改中纠正笔误，使语言流畅、表达清晰。

研究生英语教学中文化背景知识的引导及中西文化对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特别是在研究生阶段，没有足够的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英语文化内涵。多年来为了提高英语统考成绩，教师和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应试技巧上，轻视文化教学，没有把两者结合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有时文化差异在对应词中使两种语言与其真正含义相去甚远。例如，"农民"用"Peasant"是贬义，指未受过教育地位低下的农民，使得欧美人不理解"rich peasant"(富裕的农民)，实际上应该用"farmer"一词。英文中词的文化内涵并非像中文那样褒贬分明，而更多是在词根基本意义上加前、后缀而构成的表达抽象概念，理解中不能完全用我们多年形成的意识形态来直接对应或生搬硬套。

中英文写作中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文体上存在差异。英语文章喜欢直人主题，而中文常用归纳法。这样，用英文语法句型来绕中国文化表达法的圈子，转了半天读者还是糊涂。中文题目常"浅谈"、"初探"、"试论"等词表示谦虚，而欧美人不理解"为什么未经深入研究的课题还能有结果"。同样，口语中的委婉、感谢、道歉无须像中文那样反复强调以示真诚，而英文用简单的几个词又使中国学生感到词不达意。

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单纯强调掌握语言知识和单纯强调重复操作以求熟练是不适当的。应在不断努力中既学习英语知识又通过英语学习新的知识，重视实际意义上的语言交际能力的提高以适应不同目标的英语实际应用。因此教学过程中的灵活操作显然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听、说、读、写、译可以结合起来交叉进行，将学生最大限度地放置于立体的语言环境中，融口语练习于阅读和听力之

中，将翻译、写作和阅读、听说相结合，相互渗透、环环紧扣，这样不仅能丰富课堂教学形式，还能更具备语言的相关性，便于学生收集写作素材和口头交际素材，从而避免学生为交谈无话题或写作无内容而“煞费苦心”或“生套硬凑”的现象。

六、教材的选用

多年的教学实践证明，一本好的教材在教学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国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层次多，有正式录取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有专业学位、课程进修的研究生，其入学时英语起点水平不一样，教学的目的和要求也不同，因此研究生英语教材的选定或编写首先要把握其难易程度，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浪费资源，要层次分明才能因材施教。其次，教材应该具备使用上的灵活性，即保持传统的教材的相互衔接性、系统性，也应该有相对的独特性，以利于在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水平来调整使用。再则，研究生阶段的英语学习应该体现教材的知识性和先进性，有覆盖多学科的新颖内容。

由于近两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取消了听力，学生在考试阶段把复习的重点都放在语言难点上而忽视了听说能力，因此，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教材建设应把重点放在交际能力的培养上，难度不宜偏大，不能人为地造成太多的学习难点，避免学生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对语言难点的理解而不愿进行言语交际。最好用与学生有关、贴近学生生活、工作的话题，对学生有意义的材料，使他们课堂交流成为现实生活的交流，这样，建立于语言难点之上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才能被很好地培养，为达到研究生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用英语进行交际——提供切实的保证。苏州大学最近几年来所编写和使用的研究生教材正是朝上述目标努力的结果，使用下来也确实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而言之，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教学有其特定的目的和要求。只有通过全方位的努力，才能达到培养目标，造就英语语言能力更强的人才服务于社会。

参考文献

[1] 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Skeham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in the English Teaching for Non-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s

Jiang Jin Qian Xiaoling

Abstract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or non-English maor postgraduates is facing the increasing requirements and challe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 focus is forming as to how the future technological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can communicate with fluent English in the light of specific educational condi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roblems and the features present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or non-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s, suggests some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or the improvement in the aspect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perception methods, cognitive difference, study efficiency,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the choice of teaching materials.

Key words Non-English major postgraduates;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problems; strategies

加强翻译教学　促进文化交流

姜　瑾

摘　要　随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为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在大学外语教学界颇受冷落的翻译教学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本文对非英语专业研究生教学实践中的翻译教学与培养目标、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语体分析与表达方式、双语比较与文化交流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述了加强翻译教学在促进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　翻译教学，文化交流，语言实际应用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文化交流也日趋扩大。而科技人员与国外进行的直接交流毕竟属少数，大多数都是进行间接交流，也就是说，借助翻译这一桥梁，把国外的先进科学知识引进国内，同时把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介绍到世界各地。这是一种双向交流，也是一种双语转换过程。因此，在大学英语和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英语教学中，应加强翻译教学。

一、翻译教学与培养目标

随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翻译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翻译教学的目的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言实际应用能力，也就是学会把原语所

表达的信息材料，用译语重新表达出来，其中涉及到译者的外语水平、母语水平和知识水平。

在多年的非英语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英语教学实践中，笔者深深感到由于受应试教学的影响，多年来翻译教学一直在大学外语教学界颇受冷落，学生大量的时间都花在培养考试技巧上面，忽视了实际应用语言能力。无论是课堂教学的训练过程中的翻译，全国、全省学位英语统测时的翻译，还是科技学术论文摘要的翻译，甚至参加国际会议的论文交流，都明显地带有缺乏基本翻译技巧训练的痕迹。外语学习成功与否的标准不在于一个人记住了多少外语单词、语法规则或句型结构，而是看一个人是否能在实际工作中以外语作为工具进行交际。在翻译这一间接交际的过程中，主要是接受和发送能力，即书面或口头的理解和表达。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是词汇、语法、阅读及写作技巧的训练，这是有必要的，有利于语言知识的培养。但大量调查证明，许多学生尽管在本科阶段已通过四级考试，实际英语水平却不高，特别是语言转码能力不强。做选择题时常有"似曾相识，模棱两可"的感觉；写小短文时根据题目拼凑一些句子，甚至为了应付考试背范文；会做阅读理解却无法把一篇英语短文用地道的汉语表达出来；汉译英的段落从句型转换到用词组句或辨别文化差异方面都显得力不从心，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因此说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忽视不能不说是外语教学的一个失误。

外语教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并在英语四级统考和研究生学位英语测试中增加了翻译项目。即使大学英语和研究生英语教学中没有安排专门的翻译课课时，在精读课堂上也可以花一定时间进行翻译训练。实际上翻译教学也是对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强化和精琢，是对修辞方面的综合要求，是在听、说、读、写基础上的全面提高，是结合文化差异的正负面迁移现象，是"接受"与"表达"的双向交流，也是对语言综合能力的评估。在研究生毕业后的实际工作中，他们不一定会参加多少次"标准化"考试，然而一定会或多或少、或迟或早地遇到将英语译成汉语或将汉语译成英语的任务。测试中的低分尚

属个人的失败，而在实际工作中翻译的失误则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英语教学中的翻译培养可使研究生整体英语实际应用水平更上一个台阶。

二、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

翻译是人类交流思想过程中沟通不同语言的桥梁，使通晓不同语言的人能通过原文的重新表达而进行思想交流。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原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英语教师首先应对翻译理论有所了解和研究，在对翻译性质和标准探讨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技能指导，分析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并提出切实的办法。

翻译是用两种语言进行的双语交际活动，外语水平、母语水平和知识水平均起作用，其中外语水平是关键。在英译汉时，英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理解上。英语水平不高极易出现对原文信息理解不深不透，或者只了解表面含义，而对深层、隐晦的寓意未能理解，甚至还可能出现理解错误。在汉译英时，外语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表达，理解了原文但表达不出来，或表达不确切，与原文出入较大，或在遣词造句方面不符合译文语言习惯，译文就会读起来别扭、让人费解甚至不知所云。总之，如果没有本国语文的浑厚基础，外文基础再好，译文也是词不达意。再则，对所译材料的有关知识应有所了解，包括对时代背景、文化、国情、社会习尚等应有所了解，翻译科技文章要对专业熟悉。因此，熟悉本行业的专家能摆脱原文语言的束缚，灵活自如地表达原意。如医学科学工作者如能掌握语言翻译技巧就能比只懂外语的人翻译得更恰如其分。在精读课上抽一定的时间进行翻译实践是有必要的。例如在博士生精读课上笔者讲到美国副总统戈尔的一篇关于环境变化及生态平衡的论文。由于文章涉及的知识面广，用词深奥幽默，句型复杂优美，目光深邃远大，措施得力具体，学生翻译其部分章节时需逐字逐句地推敲理解，但译文还是让人觉得词不达

意，文句拙劣，但又难作进一步的修改，唯恐破坏原文内涵。虽然这是一个很花时间、费脑筋的过程，但对英文的阅读理解由表层浅析达到了深层挖掘，从找对等词汇转向引申意义及不同搭配，进行了从结构语法到功能语法多角度的句型剖析，使学生的英语学习上了一个新台阶。在硕士英语课上笔者要求学生进行双向翻译练习，即把课文译成汉语再译回英语，对照原文查自己的语言功底，补差提优。从近期目标来说这是帮助学生增加实践的机会以顺利完成英语学位统考的翻译题项，从远期目标来看这是培养学生将国外先进医疗科技成果引进并介绍给国内同行，同时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推向世界。同时还应找一些最近报刊上常用的时事新闻、科技发展等方面的句子让学生进行汉译英训练，将语言教学与社会实际相结合。

三、语体分析与表达方式

由于非英语专业研究生语言教学的特殊性，因此需要进行语言分析和语体分析。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不同，即用词不同，说法不同，比喻不同，句子结构不同。有时某种语言意义相同的表达方式不同，表达方式一样的意义不同。因此，既要重视句型结构理解的翻译转换，又要重视在篇章整体上的翻译教学。翻译并不只是逐词逐句地寻找对等词语，而是在对原文充分理解的前提下的再创造。在对英文长难句的翻译中，一定要分析原文的结构，进行从表面句法的分析，逐步深入到深层结构的研究，综合后再作全面的语言再创造。文体的不同对翻译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同样的一个单词在不同的文体中就有不同的译文，英文的主从复合句与中文并列名句的转换，肯定与否定的转换，即汉语的肯定句可用英语的否定句来表达，主动句型与被动句型的转换，词性的转换等等，从这些微观的转换形式最后达到一个宏观的对语体的要求，也就是做到忠实与变通的矛盾的统一。

不同的语体要求不同风格的表达方式。新闻报道与科技文章，法律文件与文学作品，书面材料与口头报告，以及书面语言口语化等语体各异，文采各有千秋。要注意两种不同的语言的文体风格才不

至于使译文与语体格格不人。研究生英语精读教材所选文章语体各异，为学生创造了接触各类语体的机会，而对不同语体的翻译中，个性思维方式和个体表达能力的差异又形成了译文的不同风格。事实证明，翻译理论加上实践融于精读教学既为实际语言应用打下了基础，也对英文写作有所推进。在研究生论文答辩时一些平时注重翻译的学生对英文摘要的写作能力有明显的提高。总之，掌握各种不同的语体特点有利于忠实通顺地翻译文献。

四、双语比较与文化交流

英汉两种语言有其共性，即表达思想的最小单位是句子，句子通常是由单词构成的主语、谓语、宾语及定语状语组成；且两种文化也存在共性，即人的生理条件，生活需求，思维活动以及感情标准（喜怒哀乐），道德标准（是非善恶）是大致相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感情、追求爱好也大体相似。因此有了这种共性，人与人之间就容易相互了解，就有了人与人交流的可能，也就有了语言的可译性。但是语言的翻译还是有限度的，语音、拼写、语法等方面的不同，表达方式、语言习惯的不同，用词、比喻、联想等的不同，都使原文与译文有一定的差距。如红茶译为 black tea，而 black coffee 又成了“不加牛奶的咖啡”，“雨夹雪”译成 wet snow，而“无可奉告”则为 No Comments，略举一些例子就可看出词的搭配及语言结构的比较。至于句子翻译，其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一句“Let us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but let us never fear of negotiate”译为“我们决不要由于害怕而谈判，但我们决不能害怕谈判”这一回文格式，比较后觉得英文回文尚可，但译文就不如汉语自身句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等首尾重复的句子灵活与规整。反之，中文“他现在是桃李满天下”这种比喻与联想在英文中没有，只能译为“His students are living and working everywhere”。

通过双语比较可看出语言交流时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一定要把语言和文化相结合，才能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从许多场合

来看，直接交际也是一种变相的间接交际过程，因为非英语专业的国内科技工作者及医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母语的习惯上，说出的话和写出的文章属于大脑思维中快速翻译的结果。因此教师的任务还应该尽量地让学生进行英汉语言对比并结合文化背景进行分析，以达到更好的文化交流的目的。

综上所述，要使英语教学更上一层台阶，翻译教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无论从所学语言的实用性还是从目标培养来看，都是极其重要的。翻译教学决不能是“被人遗忘的角落”，而应从实际效果出发，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技能实践，把语言知识教学与语言素质教育真正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范仲英. 实用翻译教程.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Classroom for Better Communication in the Future

Jiang Jin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requence in communication of world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and faster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technology, the importance of translation reveals more clearly. Therefore translation as a procedure in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in college Englis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an ever b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translation teaching in promot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 purpose, theory, practice, style, expression, bilingu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actical linguistic competen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teach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actical linguistic competence

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石化现象"之探讨

姜 瑾

摘 要 本文从掌握英语语言系统和英语实际使用之间的矛盾、语言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不平衡、学习语言的动机和态度、语言学习的负向迁移等方面分析中国各层次学生在国内英语学习过程中语言"石化现象"的内外起因,并探讨了如何从英语基础教学抓起,通过增加正迁移、减少负迁移、强化课堂教学的促进功能及语言学习认知方法的改进等来防止或缓解中国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语言"石化现象",从而提高英语学习实际效果和语言表达能力。

关键词 石化现象,英语学习,语言输入与输出,迁移

一、导言

根据《朗文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辞典》,石化(fossilization)一词定义如下:指(外语学习中)这样一个过程,有时出现不正确的语言特征永久性地成为一个人说或写一种语言的方式。发音、词汇用法和语法的各个方面在外语学习中会固定或僵化。发音特征的僵化造成一个人的异国口音。(Richard,1992)而戴炜栋教授则将 fossilization 译为"石化"。相对"僵化"而言,"石化"更为妥切,更为中性,因为在中国各层次的英语学习者的不同的学习阶段,"石化现象"不单纯为贬义的语言错误的代名词,而且"折射出学习目的语知识和具体运用的不足之处",(张雪梅,2000)这种现象存在于英语学习的各

个方面,包括语音,语法,用词及语言表达的各个阶段,是英语学习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中国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教学与实践过程中,特别是到了英语实际表达应用阶段,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当各行各业的研究人员在用英语表达或演讲自己的科研成果时或多或少都有多年来自身英语学习方法所形成的不同程度和不同表现形式的"石化现象"。笔者认为,这种"石化现象"的起因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外因,也有英语学习者本身的内因作用;有固定模式化的教育体制和不恰当的教学方法,也有英语学习者的认知心理偏差。多年学习过程中的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大脑中语言知识的固定模式,也形成了言语行为的个人特征以及语言运用中的不足之处。通过对英语学习者的内外因共同作用的正迁移的促进,相信不同阶段的不同"石化现象"也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石化"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是对某种不足的语言现象的评价,而不是一种定性结论,对教学实践中所观察到的现象难以作出是否"石化"的定论,这给个案定性分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再由于其起因的复杂性和矛盾的多方面性,更难进行量化的实验设计和控制。因此,本文只能对非英语专业各层次的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的"石化现象"作一点理论上笼统直观的分析,并探讨如何从英语学习的基础阶段开始防止、解决或缓解这一现象的途径。

二、英语学习中"石化现象"起因探讨

英语学习中"石化现象"的起因众多,目前语言教学理论界对此还没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定义,但有一点共识,那就是它是学习者的内外因的共同作用。在谈到语言石化现象时 Ellis 总结归纳了几点,认为语言石化原因有内因:① 年龄(当语言学习者到达临界年龄时,他们的大脑缺乏可塑性因而无法掌握某种语言特征),② 缺乏文化融合的愿望(由于不同的社会心理因素,学习者不努力去接受目标语的文化模式);外因:① 交际压力(当进行语言交际时,语言学习者想要表达的观点超越其语言表达能力时经常受到压力而导致的语言石化

现象），② 缺乏学习机会（学习者缺乏接受外语输入和使用二语的机会），③ 反馈性质对学习者使用二语的影响很大（肯定的认知反馈如“我懂了”导致石化，而否定的反馈如“我不明白你所说的”有助于防止石化）。（Ellis,1997）

而笔者认为除上述起因外，英语学习过程中教学模式的陈旧和师资力量的缺乏也是起因之一。很多学生英语学习的时间不算短，起步也不算晚，然而他们普遍对自己的外语水平和能力信心不足，总是抱怨在英语学习上花时最多而成效最少。细分析其原因，是内外因的共同作用，自我意识的某种偏见再加社会教育制度及语言环境对其语言能力发展的抑制所致。我们国家学生的英语学习主要是通过课堂教学和参考书的指导帮助，学习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对语言系统的接受而不将侧重点放于语言的实际应用。但到了高校学习阶段，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对他们自己的专业已掌握到了一定的程度，在许多场合，他们要表达的观点远远超出他们用英语来表达的能力，这种在交际能力的自我培养中欲速则不达的心态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这种压力若调整不当又会进一步地导致“石化现象”。下面对其起因分别探讨。

1. 掌握语言系统与学会语言使用的矛盾

首先，在英语学习者中出现的现象是语言输入与知识接受的不平衡。英语学习的最初阶段可延指到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但由于师资配给的不到位，有些偏远地区的学校老师甚至用中文的谐音来注释英语单词发音，使很多学生的初始发音没有得到正确引导或纠正；同时，由于课时量的不足和班级人数过多，也无法对学生进行连读和重读等语音基础阶段的基本训练，而一味追求大量的灌输和强记单词，完成教学计划并考出书面的好成绩，久而久之导致了对语音的忽视和成人阶段的典型的语音“石化现象”。这种“石化现象”极难纠正。僵化的或极明显母语腔的发音使许多科研工作者无法将精心准备的书面材料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准确流利地表达出来，即使表达了，这种僵化的发音和读音的不连贯也妨碍了听者的正确理解，容易

造成对文本的误解或曲解。再则，对语音教学的不重视也导致了成年后听力的偏差。由于同样的单词或句子，听到的发音和自己的发音不同，就无法理解对方所讲的内容从而引起交际障碍。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成年人学习英语过程中对听力测试的惧怕感。

其次，英语教学中追求过多的"正确"(correctness)，而忽视了应有的"得体"(appropriacy)；强调了太多的语法正确（grammatical correct)，但对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注重不够。所谓的"交际能力"是指"不仅能使用语法规则来组成语法正确的句子，而且知道何时何地向何人使用这些句子的能力"。然而，课堂教学中过多的标准语法句型操练使学生考虑了太多的语法框架，稍稍偏离便被认为是教学的失败，学生离此更是举步维艰，各种试卷也反映了这一点。Widdowson (1996) 列举了课堂教学中常用的一些句型操练模式来区别语言系统中的用法(usage)和具体使用(use)在教学中的不同功能，认为课堂上学生和教师更多地强调语言系统中各类用法的强记而不注重这些用法在实际语言交际时的流利使用，把惯用法放入语法项目或语言系统中进行比较研究或进行标准化的句型操练，而很少从具体使用这一角度进行引导。(Widdowson，1996)就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学生花时间最多并最早掌握的是英语的 16 种时态，但在书面和口头表达时却无法自如地、恰当地表达时间行为，却只会生搬硬套地将学过的词语套入语法句型。中国的教师常常把教与学的注意力放在学习者对正规的词汇语法和语言结构系统的掌握上，而忽视了让学生显示自己语言知识运用能力，再加过多的卷面测试，使外语学习者认为学会语言的标准形式已足够而不去考虑标准形式的恰当运用，(Ellis，1997)这就是我们中国学生在学习英语过程中的强项"语法结构"的某种"石化现象"。英语教师应该在教会学生语法结构的同时，加强如何恰到好处地将语法正确的句子用在适当的时间和场合的训练。

2. 语言输入与输出之间的不平衡

在中国的课堂英语教学中，语言的输入与输出之间产生了极大

的不平衡。课堂上,特别是大班教学的满堂灌输教学法在某种程度上使语言学习者成了被动的语言接收者。许多英语学习者认为学习英语主要靠大量记单词,用正确的语法结构将其连接起来。这在某种情况下似乎有效,特别是在应对各类考试中的多选题部分时。但是把语言看成为考试服务的数学公式的学习方法从长远观点来看是不可取的,纯结构加单词而缺乏社会文化知识的渗入,也不给机会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使语言能力培养课变成了内容灌输课,花一小时在教语法和词汇上并不等于花一小时在语言学习上。(Stern,1996)大量语言知识的涌入使英语学习者急于囫囵吞枣而来不及细细品味,更不用说消化吸收了,这样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语言反馈或恰当的语言表达。具体表现在学生背了大量的生词甚至是背词典,而在考试的词汇多项选择中无法通过对原句含义的推理和词的上下文搭配中判断选择正确或恰当的单词,更难于在实际的英语交际中斟词酌句并使用得当得体的表达方式。

3. 学习语言的动机与态度

在不同的学习个体身上,学习动机对学习效率和水平的提高起了极大的作用。学习动机包括学习者"对于① 目标语;② 目标语使用者;③ 目标语文化;④ 二语学习的社会价值;⑤ 目标语的特定用途;⑥ 在自身文化中的成员地位"的认识态度。(Ellis,1997)因而,有积极的学习动机,并有着屡屡成功经历的学习者将不断地强化这种学习态度;同样,消极的学习可能会由于失败而不断增加失败,形成恶性循环。语言学习常常被认为是枯燥乏味的,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来自于儿童时代的记忆,由于当时学校里不恰当的语法教学法,再加上母语教学给语法教学不好的名声。(Stern,1996)我们也看到了许多学习者的例子,开始他们有着积极的学习态度,但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经受了不恰当的学习经历,没能像预期的那样发展,结果在学习态度上就成为消极的了。目前英语教学制度中出现了某种怪圈,即在学习者的早期英语教学中考卷脱离教材,考试内容难于所教的内容,超出教学大纲的要求,这样,学生不理想的学习成绩势必会

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屡次对学习结果的失望，多次失败的交际，使学生不愿积极主动地进行思考、学习，而是消极地学习为考试做准备，尽管他们自己也努力朝积极的方向转化，但多年来形成的某种自我意象束缚了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这也是"石化现象"形成的外因之一。

4. 英语学习中的负向迁移

"迁移"(transfer)这一术语来源于教学心理学理论，是指将学会了的行为从一种情境转移至另一种情境，其中包括正向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向迁移(negative transfer)。正向迁移指在一种情境中学会了的东西有助于在另一种情境中进行的学习，而负向迁移则指在一种情境中学的东西干扰在另一种情境中进行的学习。(Richard，1992)在外语学习中，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是指一种语言对学习另一种语言产生的影响，可能会产生正向迁移和负向迁移。负向迁移也称干扰(interference)，是由于套用母语模式或规则而产生的错误或不合适的目的语形式。Ellis 对不同母语的人学习英语时所受的负迁移或干扰影响的情况作一一分析，他发现中国人在外语学习中不成功的因素 59%是受负迁移影响，(Ellis，1997)这还只是从母语的句型对语法的干扰而言。随着教学方式的变化，目前国内英语学习者母语的负迁移作用主要表现在：① 印象极深的母语对应词的干扰致使无法理解单词在语篇中的正确含义，逐词的翻译使得有意义的整段话语变成一堆平均含义的组合；② 阅读中用母语思考，分析对应话语结构，寻找对应话语结构，寻找中文对应词及逐句翻译理解导致了阅读速度的减慢；③ 写作中用母语思考，中文逻辑框架加上英文的语法规则，然后在空缺处填上一个个英文单词构成的句子。多年来在这种负迁移作用下养成的英语学习的习惯，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语言"石化现象"，特别是在非英语专业的学生群体中，这种现象比较普遍。

文化迁移模式对语言"石化现象"也有一定的影响。处在非母语环境中的学习者和使用者往往受环境和语言使用功能的限制。某些

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学校里，学生对所学外语的社会文化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感受，又没有语言环境，在学习英语时便以本土语言为基础来阐释和使用英语，结果往往学成一种带有地方色彩的英语，不是地道的目的语。有的在未来进一步的学习中会慢慢改变，但很大一部分学习者就此滞步。(陈慧媛，1999)

三、缓解“石化现象”的途径

“石化现象”并非先天固有，而是在多年的学习中慢慢形成的，这说明在一定的条件下，“石化现象”是可以缓解的。当然，这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的共同努力，不但要在技巧发展的每一阶段进行及时的比较，提供反馈和作适当调整，而且还要给予每一步骤以足够的关注，以提高学习效率，减少各时期可能出现的错误，有效地防止和缓解“石化现象”。

1. 增加正迁移，减少负迁移

迁移现象实际上是一个认知心理过程，在语言学习中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心理机制调节，努力增加正迁移作用。教师也应该“教会迁移”(teach for transfer)(Stern，1996)，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英语教学过程中，把迁移当成是一个教学目标，将学习母语的经验作出概括并用于促进、解释和观察英语学习。其中三大要素效率、认知和情感在迁移作用中较普遍地影响了英语学习。

Stern(1996)提出，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对目的语的学习效率，也必须注意到各种语言的学习中的共性策略和技巧，这代表了在教学中应该教学生学会怎样学习而不是满堂灌输有关语言的片面知识。在对知识的接收和自我表达的控制过程中，学习者个体的学习风格对母语迁移的正负方向作用极大。学习风格部分地反映了学习者的个性择优取向而非内在语言天赋；学习中过多地掌握与母语相匹配的语言结构，而不将侧重点放于怎样去做才能符合英语表达习惯，导致了更多的负迁移。在语言学习和应用中应该不断地修正学习风格，朝有利于调节认知心理过程中的母语正迁移方向

努力。同时注意语言系统结构的掌握和二语习惯用法的灵活使用，做到两者在实践中的自动转换交替，让两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以维持输入与输出的平衡，提高学习效率。

母语知识对外语学习的促进迁移并不明显地表示在减少某种语言错误上，而是减少整体的错误率。在英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学习者能正确使用与母语特征相似的目标语特征，然后再用英语的结构来替代，这时候母语的促进迁移功能相当有效。在达到一定的语言熟练程度时，认知目标便涉及到某些技能的发展：观察、区分并检查语言或社会文化现象；收集、分类、组织信息；储存、检索资料；构造、实施、修正规则；问题解析和推理以及将英语和英语文化与母语和母语文化相结合，对这些思维行为应该从认知角度来刺激。适当地提高英语输入的质量和数量，增加趣味性、多样性和难度，增强学习任务的挑战性，正确评估学生现有的语言熟练程度，了解学生的要求和兴趣，设计出对学生现有能力具有一定挑战性和可接受的练习和任务，注意教学的渐进性，避免急于求成，最大限度地从客观上减少或避免语言"石化现象"发生。(张雪梅，2000)

从情感领域来看，语言教学可以促进对其文化和社会及语言学习的积极态度。学习者应了解到语言课堂仅仅是他们整个跨文化经历的一小部分，社会经济对英语的需求是学生学习英语情感因素的极大原动力，成功的感情成分就是在学习中的自信。个人的自我意象决定他的行动和态度，而他人的评价性话语对一个人自我意象的塑造起重要作用。只有通过排忧解难增加信心才能提高认知能力。因此，防止外语学习中"石化现象"的最佳办法是肯定的情感反馈与否定的认知反馈。肯定的情感反馈鼓励学习者继续语言尝试，而否定的认知反馈示意学习者有必要在语言的学习过程和表达方式上作出一些必要的变化和修改。"这就会使不正确的或有问题的话语形式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这种不稳定状态会迫使学习者对自己的语言作修正"。(陈慧媛，1999)对英语学习实践者最大的情感支持和促进作用来自社会文化方方面面对他们的肯定。因此，作为直接

的，或者说在英语教学课堂里唯一的指导者和鼓励者，英语教师对学生的成功作及时的赞赏和鼓励，并同时适当地指出和修正其不足，对母语的正迁移作用有直接的推动。有时，课堂上一个会心的眼神，一个肯定的手势，一个赞许的微笑，或一句幽默但又中肯贴切的点拨，会对英语学习者的进步起不可估量的作用，对缓解“石化现象”也有潜在功能。

2. 强化课堂教学的促进功能

克拉申指出“规范教学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是比在大街上的学习有效得多的教学方法”。(Ellis,1997)规范的课堂教学有益于有控制的语言行为，而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既要注意语言形式又要寻求交际机会。正规的课堂教学加速了学习，即使语言学习者没能学会应用他们所教的内容，也还是提高了语言水平，将来可以在实践中运用课堂教学所得到的语言知识来处理各种科学信息。

优秀的师资是教学成功的保证。教师应从“教什么”和“怎样教”的角度来选择教材和制定教学方案，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应针对不同程度的学习者调整改进教学方法，严禁用中文甚至土语的发音来注释解英语的读音。在课堂上教师应该经常问自己“学习者是否已经学会了他们所教的内容”，要注意讲课方式、错误处理、学生参与、小组讨论、课堂气氛，为学习者提供交流机会，创造合作共鸣，提高普遍效率，使学生真正掌握表达思想的第二语言工具。

Ellis(1997)总结了多年外语教学研究者对课堂教学法的调查结果，并得出精辟见解：

(1) 对语言意义的推敲有助于外语词汇的获得。

(2) 鼓励学习者构造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从长远看可以导致更高的语法准确率。

(3) 教师控制的教学过程有利于规范语言技巧的获得；而学生控制的自然交际有助于发展口语技巧。

(4) 学习者应该得到符合他们理解水平的高质量的输入，他们应该从用定义清晰的结构和调节到位的教师语言所授的课程里有所

收获。

(5) 课堂里听其他学习者讲话可能要比学会学习直接参与更重要。(1:p.606)

由于规范化课堂教学对测试特有效而非自然语言的产生，课堂理论指导必须与语言实践中的交际行为相结合，才能保持长远的效果，防止或缓解语言"石化现象"。

3. 认知方式的改进

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认知方式随着学习阶段的不同而改变能有效地防止"石化现象"的发生。在英语初学阶段，学习者应对所学单词的形式和用法有足够的注意力以确保其正确使用。而到了语言学习的中后期，教师应使学生认识到一词多义变化和一物多词变化以及语境变化。一个词的意义不是词本身固有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源于人在不同语境中对它的"利用"，这种利用不是任意的，而是来源于人的认知联想，从而形成了一个词的有联系、有规律的多义范畴。另外，词义范畴的边界也不是固定的、明确的，而是有变化的、具有弹性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和在不同的时代其原形意义是不一样的。这样，学习者不但能了解词义的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其演变机制，解释一些词的具体义项与抽象义项之间的联系，更能提高阅读理解能力。(7:p.193)

在英语阅读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不仅要掌握丰富的英语语义知识，也要深入了解语法结构，为语义联想提供线索和方法指导，同时避免在对某些习语和固定搭配短语的理解中过多地强求寻找中文对应短语或成语，以免对习语和短语产生片面理解而影响灵活应用。除此以外，还应要求学生自觉利用图像想象和联想思维，将自身的社会文化经历和母语文化知识与所阅读的英语语篇相结合，触类旁通，以了解母语与英语在整个体系上的差别，包括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渐渐地从词汇、语法、篇章理解到思维方式、概念体系等方面容忍差异并顺应差异，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母语的正迁移促使英语阅读理解能力的不断提高。教师应引导学生将视觉信息与非视觉信息相结

合，将分析性阅读与欣赏性阅读相结合，充分利用自身原有的知识来学习英语，同时又从英语学习中获得更多的社会知识。通过不断的循环往复，逐渐提高英语学习者的英语阅读水平，日益丰富社会文化知识和生活经验。

中国的英语教学中语法教学和句型操练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或程序，但教师应当在学生掌握了一定的语言系统用法(usage)的基础上考虑英语学习者的语场、语旨和语域，即考虑实际应用(use)，并以此为基础制订教学计划。在语法教学方面除进行语法和功能分析外，还要解释句子连贯性的内在原因，进行句法篇章的信息结构分析，了解不同句法完成任务的不同功能，反映出的不同认知世界，对语言输人进行记忆、组织、比较、匹配、类推、重组、转换等语言运用技巧的训练，理解语言意义并形成对外语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对已经掌握的语言单位以一定方式来利用，构成语言输出，提高语言的创造能力以缓解外语写作中的“石化现象”。

四、结论

以上论述对英语学习中出现的语言“石化现象”进行了各种起因的分析，并从理论上作了对一些缓解措施的初步探讨。然而，这种对问题的理论探讨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语言“石化现象”的，因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众多，无论学习者年龄长幼，也无论英语学习者得到多少目的语的解释和指导，在对英语的理解和表达中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母语的理解方式、表达方式及规则系统，这些词语结构的长期重复使用就形成了“石化”，这种“石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英语熟练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直接的国际交流，在打好英语基础的前提下为自己所学的专业服务。对他们的英语学习中语言“石化现象”的防止或缓解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学习者和教学者的共同努力。从基础学习阶段做起，勇于探索并从根本上改变学习过程中的“自我意象”，积极思维，树立自信，这样才能获得理想的学习效果，提高英语语言表达和交际能力，

达到流利熟练地与国际同行相互介绍最新科研成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Ellis, Rod *The Stud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Richards, Jack C. *Longman Dictionary of Language Teaching &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92

[3] Stern, H. H. *Issues and Options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Widdowson, H. G. *Teaching Language as Communic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5] 陈慧媛. 关于语言僵化现象起因的理论探讨问题.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9(3)

[6] 张雪梅. 语言石化现象的认知研究. 外国语, 2000(4)

[7]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Study on "Fossilization" in English Learners in China

Jiang Ji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the phenomenon of "fossilization" in English learners in China in terms of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sage in language system and use of realistic language, the unbalance of language input

and language output, the motivation and attitude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negative language transfer. It also discusses the possible cognitive methods in solving or softening the problem by way of enhancing positive transfer and reducing negative transfer,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in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sults in the better mastering and using of a foreign language.

Key words fossilization;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language transfer

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学习动机及其相关因素的定量分析

陈朝晖　姜　瑾

摘　要　学习动机一直被认为是关系到语言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受到了中外研究者的重视。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了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学习动机类型及其相关因素，并对学生高考成绩、自信心、焦虑和抑制与英语学习动机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并试图从中得出一些对教学有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　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动机，相关因素

一、引言

英语学习动机历来被认为是语言学习者个体因素中最具能动性的因素之一，是影响外语学习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动机一直受到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心理学研究认为，动机是驱使人们活动的一种动因或力量，包括个人的意图、愿望、心理的冲动，或企图达到的目标等(皮连生，1997)，学习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习者能否有效利用一切机会去使用或操练外语，它也决定着学习者参与外语学习的主动程度，以及学习者克服学习困难的信心(Oxford，et al，1994)。长期以来，我国外语学习动机研究主要以调查本科在校大学生为主，对刚入校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研究较少。事实上，我国大学招生规模的扩大，不仅带来了学生数量上的增加，也导致了生源质量的参差不齐，来自不同地方的大学新生除了在语言能力、认知方式方面存在个体差异之外，在英语基础、社会背景和情

感等非智力因素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常常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机。刚入校的学生处于情感可塑性最大的时期，也是大学外语学习初始动机形成的关键时期，开展大学新生学习动机及其相关因素研究，有助于教师有针对性地开展英语教学，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效果。

二、研究概述

早期国外学者对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机的定义、组成成分和对外语学习的影响上，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多种动机类型，主要有融合型与工具型动机、内在与外在动机等(Gardner & Lambert，1972；Deci & Ryan，1985)。已有的研究表明，学习动机是关系到语言学习成效的重要因素，同一外语学习者身上可能表现出多种学习动机，只是某种动机在其中占主导地位。总体来说，影响动机的因素较多，动机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和动态性。Ramage 研究了动机因素与外语学习毅力的关系；Dickinson 研究了自主学习与外语学习动机之机之间的关系。国内近年来有关外语学习动机的研究，不再只循着经典及扩展模式的路子，探索动机对学习成绩的促进作用(高一虹等，2002；王晓旻、张文忠，2005)。秦小晴、文秋芳(2002)将心理学理论引入外语研究，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动机内在结构、动机内部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刘东楼(2002)分析了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和社会环境对学习动机的影响，认为自信心与动机的关系是线性的，缺乏自信心就无法产生强烈的动机，而焦虑与动机的关系较为复杂。但在国内的研究中，有关大学非英语专业新生的学习动机及相关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对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学习动机类型与个体差异、英语学习动机与高考成绩、自信心、焦虑和抑制等的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试图为激发大学新生英语学习动机提供有益的教学启示。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苏州大学非英语专业本科 2005 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年龄 17～20 岁，共 172 名，其中，男生 74 名，女生 98 名，英语学习时间大部分为 8 年，分布于 4 个自然班，所学专业涉及中文、数学、旅游和国际贸易。

2.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问卷的制定针对我国非英语专业新生实际，参考了 Horwitz and Cope (1986) 的 FLCAS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Scales) 和 Gardner 的 AMTB (Attitude/Motivation Test Battery)。问卷题目包括个人信息和情感因素调查两个方面。个人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开始学习英语的时间和家庭背景等；情感因素调查均为选择题，采用从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的莱科特五级记分制，分为焦虑 (24,31,32,33,34)、自信心(14,15,23,25,26)、抑制(21,30)、外在动机 (5,16,18,19,22,27)、内在动机 (3,4,13)、工具型动机(2,6,7,8,28)、融合型动机(1,9,10,11,12,29)和动机强度 (17,20,22) 等 7 个项目。

3. 过程与方法

将问卷发给学生，并说明调查目的。问卷是无记名的，以便消除学生的顾虑，得到他们的配合。问卷收回后，将所得数据全部输入电脑，并采用 SPSS 11.5，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与假设性检验，分析大学非英语专业新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个体差异及其相关情感因素。

四、结果与讨论

1. 动机类型

由表 1 可见，在所调查的非英语专业新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中，工具型动机强于融合型动机，外在动机强于内在动机，其中，工具型

动机对学生的外语学习影响最大，均值为3.51，内在动机最小，均值为2.99。图1对学生工具型动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所调查的“通过考试”、“找一份理想工作”、“出国”和“考研继续深造”中，“找一份理想工作”选项的均值最高(4.09)，出国最低(2.55)。这就表明，大学非英语专业新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主要是工具型动机，内在动机弱，“找一份理想工作”是主要的工具型动机。

表1　非英语专业新生动机类型

项目	数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外在动机	172	2.00	4.50	3.11	0.48
内在动机	172	1.00	5.00	2.99	0.88
工具型动机	172	1.80	5.00	3.51	0.62
融合型动机	172	1.17	4.83	3.33	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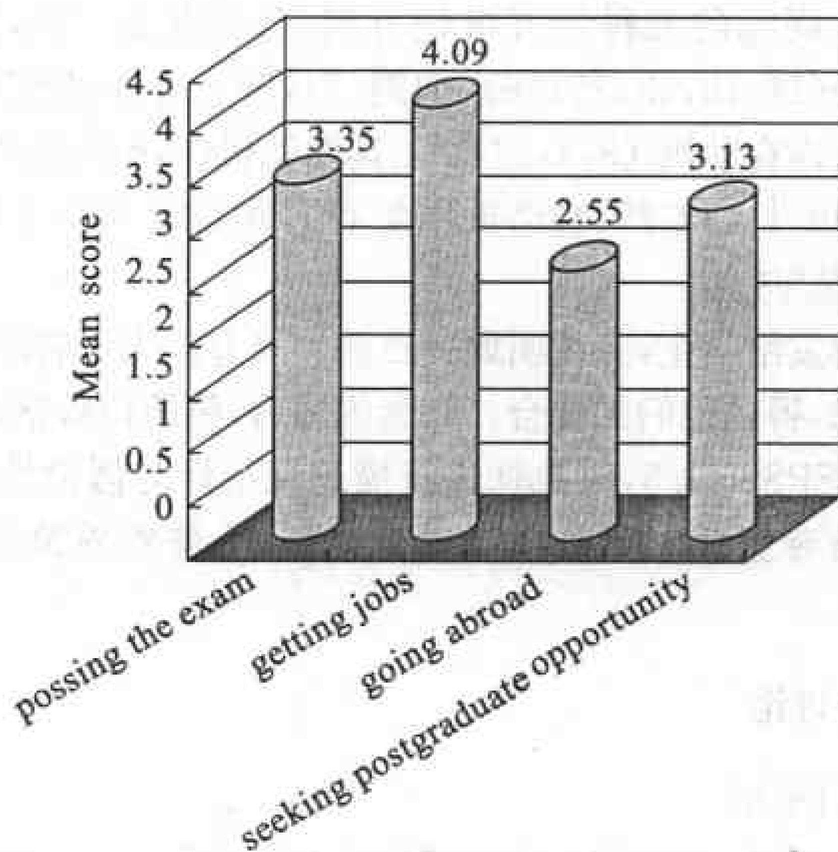


图1　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英语学习工具型动机

由表 1 还可以看出，四种动机的均值均接近 3，因此，虽然工具型动机是最重要的一种动机类型，但就学生个体而言，他们可能同时拥有多种动机，学习者的英语学习动机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教师注重新生英语学习动机的个体差异，充分考虑与动机激发有关的各种影响因素，调动新生英语学习的内在动机。

2. 高考英语成绩与学习动机

表 2 为新生高考英语成绩与学习动机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四种动机类型与高考英语成绩均无显著相关性（$P>0.05$），学生过去成绩对动机行为影响不大。秦晓晴和文秋芳(2002)采用结构方程模型(LISREL)对 500 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动机内在结构的研究表明，学生过去英语成绩对动机行为无直接影响，而且间接影响也很弱，并认为这一结果虽然与 Skehan(1989)研究结果不一致，但是可以预料的。Heckhausen 和 Kuhl 认为，动机的形成、发展各个阶段顺序之间是不连续的、分离的，高考英语成绩对于大学英语的学习而言只是一种初始阶段的状态，对学习者的动机也只是萌发因素之一，并不能决定动机发展的整个过程和结果。新生进入大学后，其学习动力会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造成过去英语成绩对动机行为的影响不明显。因此，高考成绩对新生的动机行为有影响，但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表 2　英语学习动机与新生高考成绩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个人相关性	Sig. (2－tailed)	数目
外在动机	－0.096	0.225	172
内在动机	0.042	0.593	172
工具型动机	－0.024	0.76	172
融合型动机	－0.063	0.42	172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3. 自信心、焦虑、抑制与学习动机

表 3 为自信心、焦虑、抑制与学习动机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自信心与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01$)。焦虑与内在动机呈显著的负相关($r=-0.161, P<0.05$)。除工具型动机以外，抑制与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融合型动机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 $-0.184(P<0.05)$、-0.317 和 $-0.307(P<0.01)$。焦虑被认为是最妨碍学习过程的情感因素，就其作用而言，焦虑可以分为促进型焦虑(facilitating anxiety)和妨碍型焦虑(debilitating anxiety)，前者激发学生克服困难，挑战新的学习任务，努力克服焦虑感觉，而后者导致学生用逃避学习任务的方式来回避焦虑根源。本研究有关焦虑的问卷项目是：(1) 课堂上我害怕别人嘲笑我英语口语差；(2) 我说英语时害怕说错；(3) 英语课上我总是感到很紧张；(4) 我总是认为别人说英语比我说得好；(5) 英语课上自由发言会使我感到很不安。对于学生来说，这些项目均为妨碍型焦虑。Gardner 证实与语言学习成绩呈最大负相关的为焦虑，具有高度语言焦虑的学习者很可能会减少参与，降低风险，从而避免语言学习。(Oxford)认为妨碍型焦虑可能与动机不强、负面态度、自信心低和语言表达困难有关，直接导致学习者逃避新的学习任务。本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妨碍型焦虑会显著降低学习者的内在动机，而提高学习者自信心则无论对于内在动机、外在动机，还是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非英语专业新生来说，教师应注重提高学生的自信心，降低学生的妨碍型焦虑。

表 3　自信心、焦虑、抑制与学习动机的相关性

		外在动机	内在动机	工具型动机	融合型动机
自信心	个人相关性	0.452**	0.382**	0.304**	0.408**
	Sig.（2－tailed）	0.00	0.00	0.00	0.00
	N	172	172	172	172
焦虑	Pearson correlation	－0.047	－0.161**	0.064	－0.047
	Sig.（2－tailed）	0.540	0.034	0.401	0.543
	N	172	172	172	172
抑制	Pearson correlation	－0.184*	－0.317**	0.054	－0.307**
	Sig.（2－tailed）	0.015	0.00	0.483	0.00
	N	172	172	172	172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4. 性别差异与动机行为

为进一步分析男女生动机行为的性别差异，表 4 在列出了非英语专业新生学习动机行为性别差异的同时，还给出了男女生在焦虑、抑制以及自信心方面的差异，并采用 t 测验方法，对上述差异进行了显著性检验(见表 6)，结果表明，除焦虑无显著差异外，男女生之间在动机行为、动机强度、自信心方面存在极显著差异($P\leqslant0.01$)。其中，男生外在、内在、工具型和融合型动机的分值分别为 2.92、2.63、3.45 和 3.13，女生则为 3.37、3.24、3.56 和 3.49，表现为男生的动机行为显著小于女生，相应的动机强度也表现为女生显著高于男生(男生为 2.67，女生为 3.25)，这与女生的自信心显著高于男生有关(男生为 3.25，女生为 3.42)。国外的研究者如 Dŏmyei 和 Clement

(2001)的调查也指出，女生在大多数目标语言的学习中，她们在七种动机维度(包括工具、融合型动机、与第二语言的直接接触、及文化兴趣等)的得分均比男生要高。

表4　学习动机行为的性别差异分析

项目	性别	数目	平均值	标准差
外在动机	M.	74	2.92	0.44
	F.	98	3.27	0.45
内在动机	M.	74	2.63	0.85
	F.	98	3.24	0.80
工具型动机	M.	74	3.45	0.69
	F.	98	3.56	0.55
融合型动机	M.	74	3.13	0.71
	F.	98	3.49	0.57
动机强度	M.	74	2.67	0.90
	F.	98	3.25	0.83
焦虑	M.	74	2.93	0.70
	F.	98	2.93	0.75
自信心	M.	74	3.25	0.44
	F.	98	3.42	0.41
抑制	M.	74	2.01	0.84
	F.	98	1.68	0.74

表 5　动机行为性别差异显著性分析

项目	t-test for Equality of Mean					
	t	df	Sig. (2—tailed)	Std. Error Differenc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Difference	
					Lower	Upper
外在动机	−5.108	170	0.00	0.068	−0.483	−0.241
内在动机	−4.87	170	0.00	0.126	−0.863	−0.365
工具型动机	−1.191	170	0.00	0.095	−0.301	0.074
融合型动机	−3.704	170	0.00	0.098	−0.555	−0.169
动机强度	−4.361	170	0.00	0.133	−0.844	−0.318
焦虑	−0.05	170	0.960	0.113	−0.228	0.217
自信心	−2.609	170	0.010	0.065	−0.296	−0.041
抑制	2.729	170	0.007	0.123	0.091	0.568

Note：t stands for the value of t-test

df stands for degrees of freedom

Std. Error Difference stands for standard error difference.

5. 家庭背景与学习动机

表 6 和表 7 列出了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差异。表中可见，农村和城镇学生的工具型和外在动机存在极显著差异（$P<0.01$）（见表 6），表现为城镇学生明显高于农村学生（$P<0.05$），其他动机变量则无显著差异。过去我国农村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因此在大学里农村学生往往比城镇学生更努力学习，他们渴望寻找一份理想工作的欲望比城市学生更强，工具型动机较强。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越来越多的人竞争有限的就业岗位，城镇居民更深切地感到这种压力。因此，城镇学生的工具型学习动机得到了很大激发，他们所持有的工具型动机比农村学生更强。

表 6 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学习动机

项目	背景	数目	平均值	标准差
外在动机	城市	94	3.22	0.469
	农村	78	2.99	0.450
内在动机	城市	94	3.03	0.888
	农村	78	2.92	0.853
工具型动机	城市	94	3.64	0.599
	农村	78	3.36	0.610
融合型动机	城市	94	3.41	0.665
	农村	78	3.24	0.641
动机强度	城市	94	3.13	0.942
	农村	78	2.84	0.847
焦虑	城市	94	2.88	0.772
	农村	78	2.99	0.670
自信心	城市	94	3.42	0.397
	农村	78	3.26	0.443
抑制	城市	94	1.79	0.774
	农村	78	1.87	0.831

事实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许多城镇小学就已经开设了英语课，几乎所有的城镇中学都把英语课程放在主要地位。本研究表明，城镇学生和农村学生在动机强度和自信心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P<0.05$）（见表 7），表现为城镇学生高于农村学生，这就表明教师需要在平时教学中注意提高来自农村新生英语学习的自信心，提高其英语学习的动机强度。

表 7 不同家庭背景学生的动机行为差异显著性分析

项目	t-test for Equality of Mean					
	t	df	Sig. (2—tailed)	Std. Error Differenc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Difference	
					Lower	Upper
内在动机	3.377	170	0.001	0.071	0.099	0.378
外在动机	0.847	170	0.398	0.134	−0.151	0.377
工具型动机	2.996	170	0.003	0.093	0.095	0.460
融合型动机	1.660	170	0.099	0.100	−0.032	0.364
动机强度	2.126	170	0.035	0.138	0.021	0.565
焦虑	−1.018	170	0.310	0.111	−0.334	0.107
自信心	2.671	170	0.008	0.064	0.045	0.298
抑制	−0.690	170	0.491	0.123	−0.327	0.158

Note：t stands for the value of t-test

df stands for degrees of freedom

Std. Error Difference stands for standard error difference.

五、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学习动机与相关因素的定量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学生的工具型动机强于融合型动机，外在动机强于内在动机，“找一份理想工作”是主要的工具型动机；② 学生过去英语成绩与动机行为无显著相关性；③ 自信心与外在动机、内在动机、工具型动机和融合型动机均呈极显著正相关；④ 焦虑与内在动机，抑制与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融合型动机均呈显著或极显著负相关；⑤ 女生的动机行为、动机强度和自信心显著高于男生；⑥ 城镇学生的工具型和外在动机行为明显高于农村学生。上述研究结果证实了动机变量不是孤立地作用于动机水平，而是共同构成

相互作用的因果链。大学新生虽然从身份上讲已是大学生，但由于刚从中学校园走出，他们的情感状态、学习习惯仍保留着中学生的特点，因此，根据本研究结果，我们建议，教师在试图提高学生学习动机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不同动机变量对动机行为的影响；在有意识地应用各种动机激发策略的同时，重视大学新生英语教学的基础性和特殊性，注重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自信心，以达到提高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目的。本研究所反映的只是一所学校的情况，调查的样本数量有限，研究对象单一，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教学研究中，有更多的研究者进行非英语专业大学新生学习动机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Deci E L & R M Rya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 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ur* [M]. NewYork: Plenum, 1985

[2] Dickinson L. Autonomy and motiv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J]. System, 1995

[3] Dŏmyei Z. Motivation and motivating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78. 3(1994): 273—284.

[4] Dŏmyei Z, Clement R. Moti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earning different target languages: results of a nationwide survey[A]. In: Dŏmyei, Z., Schmidt, R. (Edts.), Motiv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 University of Hawaii,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Curriculum Center, Honolulu, HI, 2001: 399—432

[5] Gardner, R. C., & W. E. Lambert.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M]. Rowley, Mass.: NewburyHouse, 1972

[6] Horwitz E K, Horwitz M B and Cope, J.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Anxiety [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86(70):125—132

[7] Oxford, R L & J Shearin.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 Expand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J]. Modem Language Journal. 1994(78):12—28

[8] Ramage K. Motivational factors and persistence in foreign language study[J]. Language Learning, 1990

[9] Skehan P.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M]. London: Arnold, 1989

[10] 高一虹，赵媛，程英，周燕. 大学本科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与自我认同变化的关系[J]. 国外外语教学，2002(4):18—24

[11] 刘东楼. 外语教学中动机问题的几点思考[J]. 外语教学，2002，23(4):58—62

[12] 皮连生主编. 学与教的心理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3] 秦晓晴，文秋芳.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学习动机的内在结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34(1):51—58

[14] 王晓旻，张文忠. 国内外语学习动机研究现状分析[J]. 外语界，2005(4):58—65

Study on the Relation of Affectivities to Motivations of Non-English Major College Freshmen

Chen Zhaohui Jiang Jin

Abstract Motiv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an essential

factor in the acquisition of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This paper reported a study on the relation of affectivities to motivations hold by non-English major college freshmen in order to gain some insight into the current teaching practice and to arouse teachers' awareness in this issue.

Key words Non-English major; college freshmen; motivation; relative factors

迁移作用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影响

姜　瑾

摘　要　本文在对大学英语学习者学习方法调查的基础上，从语言教学、思维方法及情感因素等方面阐述了迁移作用对大学英语学习的影响，并指出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该尽量引导学生利用原有的母语知识和社会经验来促进第二语言的学习，克服干扰，增加正迁移，将学习语言和通过语言学习知识结合起来，提高实际上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

关键词　迁移作用，语言能力，交际能力

迁移作用是一种心理因素，是指已学过的东西对新的思维和想象活动的影响。大学英语教学受环境条件限制，无法以交际法来产生无意识的客观的语言习得，因此，语言学习似乎是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英语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即自觉通过了解语法、扩大词汇、大量阅读、增加语感，在有目的、有意识的学习过程中学习知识，理解掌握知识，逐步提高外语能力。大学英语学习者常用的是习惯性思维，凭借现成的知识和经验，用习以为常的方式和固定的模式去寻求答案，寻求成功，这样，在思维过程中很容易产生迁移作用。迁移作用有其正负面，已学的东西对新的思维和想象起促进作用的现象称为正迁移，已学过的东西对新的思维和想象起干扰作用的现象称为负迁移。正负迁移作用对思维的影响会直接影响认知的效果。在个案研究和 500 份学习方法调查表的统计数字中发现，若能将大

学英语学习过程中的负迁移转化为正迁移，或尽量增大正迁移，减少迁移，就能使大学英语学习者提高学习效率。

一、词汇教学中的迁移作用

词汇是大学英语学习的基础和关键。中文的词汇知识对英语单词的记忆理解有很大的迁移作用。有人认为年龄小学英语容易记单词，其实则不然。英语单词量的增大随着中文词汇量的扩大而更具有其实际意义。大学英语学生原有的语言知识、母语词汇及分析理解能力会使他们的词汇认知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在个案调查中发现，词汇掌握得较好的学生往往分如下步骤来扩大词汇量：首先在句子中认识单词，用中文对应词理解单词，根据语篇分析单词，再按照词素组合来拼写，将这个单词多义现象，在掌握词的中心意义的前提下再分别理解词的具体意义和转义。对于较长的单词，首先从词干着手，再根据不同的前后缀来学会更多的派生词。在视觉概念方面，学生的理性逻辑推理有很好促进作用，潜意识中区别了认知词汇和表达词汇，有利于阅读中语义的推导和写作中用词的准确。然而，由于缺乏一定的语音条件和语音基本功能的训练，读音不规范，同一个词看到的和听到的感觉不同，特别是自己的错误发音对其有干扰时更难理解词义。另一方面，母语对应词对单词深层意义的掌握有时也会产生负迁移效果，逐词的翻译学习使得有意义的整段话语变成一堆单词含义的组合，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更来不及去思考整体含义，这是大学英语词汇学习中需要解决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应引导学生对单词的词汇意义、结构意义、语境意义、社会文化意义及语用意义进行深层的探讨，而不是限于会读会背一个单词，并且停留在对它的中文对应词的表层理解上，逐渐培养学生从构词规则及上下文中认识单词，在掌握中心意义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一定内涵的概念，再从概念范围中找出某种与客体相似的东西，分别从释义、阐述、翻译、直观演示、构词分析、同义、反义等手段作引导，按学生的具体情况分别按认知词汇与表达词汇来作不同要求和练习。这种对

词汇教学进行的巧妙构思就会使学生对词的结构产生无穷的兴趣和丰富的联想，同时也会提高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处理信息的能力，增大已知信息对新学词汇的正迁移。

二、阅读理解与母语思维

大多数学生在反馈的信息中表示阅读理解不是程度问题，而是速度问题。在词汇量日益扩大并对句法句型概念清楚的前提下，对篇章的理解并非难事。通过联想自己的经验来挖掘意义，利用语篇的内在信息边读边预测，对深层结构加以分析理解，从而在阅读过程中接受新的知识。而阅读技能的提高也能进一步复习巩固母语知识，提高二语水平。由于大学英语教学的环境条件所限，我们首先发展的是阅读能力，通过掌握语言知识和语言材料来学习英语。相对而言，阅读能力是大学英语学习中最重要的环节，与词汇句法的掌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大学英语各种测试卷中，阅读理解占比例较大，这就要求学生集中注意力于对意义的理解，有选择地对部分关键词和语段进行信息处理，而不是对材料逐词加以辨认。然而，如有母语思维的干扰，阅读速度就会减慢。调查显示，许多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用母语思考，分析语法结构，寻找中文对应词以及逐句翻译理解。平时不限时间矛盾不大，而在限时限量的测试中，时间不够这一矛盾相对较突出。很多同学抱怨："如果再给我 20 分钟，我会来得及答准确。"这说明阅读理解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与思维中的正负迁移作用有关。

在对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教学辅导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不仅要掌握丰富的英语语义知识，也要深入了解句法的结构，为语义联想提供线索和方法指导，同时避免在对某些习语和固定搭配短语的理解中过多地强求寻找中文对应短语或成语，因为这会使学生对习语和短语产生片面理解而无法灵活掌握和应用。除此以外，还应要求在无意识中自觉利用图像想象和联想思维，将自身的社会经历和语言文化知识与所学的语言材料相结合，触类旁通。尽量多地帮助学生了解母语与外语在体系上的差别，包括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渐

渐地从词汇、语法、篇章理解到思维方式、概念、系统方面容忍差异并顺应差异，这样才能避免母语的干扰，更有效地利用母语的正迁移促进作用，使英语阅读能力不断提高。要求学生将视觉信息与非视觉信息相结合，将分析性阅读与综合性阅读相结合，充分利用自身的原有知识学习语言，并从语言学习中获得新知识。通过不断的循环往复，逐渐提高阅读水平，日益丰富自己的知识经验。

三、中文句型模式与翻译写作

对语法规则的掌握，大学英语学习者显然是驾轻就熟，因为这符合他们的思维方式。调查表上学生作了一个恰当的比喻：语法是梁柱，词汇是砖，两者结合才能构筑语言大厦。他们认为，要看懂文章和句子，首先要将词汇和语法结合理解句子的表层意义，再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去阐述其深层含义。根据他们的思维方式，句型—语法—句子的演绎归纳有利于他们的阅读、翻译和写作。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不犯语法错误，不会由于不懂句型结构而误解或误用了含义"。在造句作文过程中，他们主要还是从结构主义语法着手来搭建句子框架，功能语法学对大学英语学习者感觉不太适用。至于对语言功能，他们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原有知识去了解。然而负面效应也同时产生，太多的语法框架以及用中文句型模式去套句子束缚了他们的想象力，以致对书面语的翻译和写作使用的句型僵硬，在听和说方面的反应总是慢了一步。

调查表上对写作的结论基本一致，就是以母语思考为主。写作是在书面造句的基础上进行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心理翻译过程。指定的作文题目附有要求或大纲，不会偏题，但带有明显的中文句型痕迹，似乎是中文的逻辑框架加上英语语法规则在空缺处填上一个个英文单词构成的句子，再按认识的进展进行排列。一般情况下不会偏题，但还是得不到高分。即使没有语法和拼写错误，整篇文章还是不尽如人意。

要减少这种负迁移，就必须加强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翻译练习。

翻译教学是对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的强化和精琢，是对修辞方面的综合要求，是在读、写、听、说基础上的全面提高，是结合文化差异的正负迁移现象，是接受与表达的双向交流，也是对语言综合能力的评估。其中外语水平、汉语水平和知识水平均起作用。在英译汉时，英语的重要性体现在理解上，英语水平不高极易出现对原文信息理解不深不透，或者只了解表面含义，而对深层，隐晦的寓意未能理解，甚至还可能出现理解错误。在汉译英时，英语的重要性体现在表达，理解了原文但表达不出，或表达不确切，与原文出入较大，或在遣词造句方面不符合译文语言习惯。反之，如没有中文的深厚基础，外文基础再好，译文也是词不达意，读起来让人费解甚至不知所云。再则，要了解所译材料的有关知识，包括时代背景、文化、国情、社会习尚等，翻译科技文章要对专业熟悉。因此，只要摆脱了原有知识负迁移的干扰束缚，才能灵活自如地表达意愿，同时也能减少写作过程中使用中文结构的英文单词现象，从而产生本族语思维与外文表达的语义等值，在理解知识的语言学习过程中，逐步用外文思维方式思考。

四、克服干扰、促进迁移

经过多年英语教学或学习的人都有体会，英文学到较高层次时与中文语言能力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典型的知识迁移作用。教师应该利用自己的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针对学生反馈的求知欲望、目的、兴趣和积极性以及学习方法、接受能力、母语水平和社会经验等方面情况，三者潜在地互相适应，互相配合，创造出一种激发学生将课堂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经验联系起来的课堂环境。同时帮助学生理解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方式上的异同，找出人类语言的共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的特性，设法提供各种语境，让学生通过语言知识的学习获得更多的语言经验。除此以外，再将目的语与母语进行分析对比，尽可能多地介绍两国的文化背景知识，建立起学生在听力、阅读过程中的文化感和语感。学生在大脑中储存足够的文化知识和语言知识，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而且，学生只有在实际使

用语言中,经过亲身的体验,才能克服干扰,排除负迁移,增加正迁移,学会自己学习语言,将学习语言和通过语言学习知识的相结合,提高实际上的语言能力和用语言进行的社会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 朱纯.外语教学心理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1994
[2] 夏东民.心理学基础与应用技术[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

The Effect of Transfer function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Jiang Jin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learning stratigies of the college English stud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transfer function on college English lear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of thinking, emotion and motivation with the opinions that teachers should try their best to introduce to the students the way to enhance language study with their mother language knowledge and life experience, to overcome interference and increase positive transfer, to combine learning language with learning from language, and to improve the real language a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Key words Transfer function; language ability;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双向交流

姜 瑾 施华珍

摘 要 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对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全面提高外语教学质量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论述了课堂教学中信息交流、认知交流、情感交流的方式以及双向交流对大学英语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的作用。

关键词 课堂教学，双向交流，交际能力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强调“重视培养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教学活动不但要有利于语言能力的训练，也要有利于交际能力的培养”，“不仅要重视句子水平上的语言训练，还要逐步发展在语篇水平上的交际能力”。交际能力源于表达能力，而表达能力则由各自的思维方式决定。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双向交流与了解学生的个性思维方式休戚相关，对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译的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全面提高外语教学质量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研究背景

目前在某些学生中存在着“高分低能”现象，也就是说这些学生通过了四级甚至六级考试，但不会用英语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从长远观点看，即使是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英语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使自己成为具有实际翻译、写作等能力，并能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进行交际的实用型人才。这就涉及到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

的问题。

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人们头脑中的语言语法知识，而后者是指说话、写文章等使用语言的具体行为。语言运用取决于人的语言能力。换句话说，人的表达能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大脑的思维和神经活动。每个人都具有各自的语言能力，每人都有自身的语感，表达能力因环境影响和经验作用而千差万别。因此，在以教材为媒介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应从启发学生的个性思维方式着手来提高学生的个性表达能力，为培养交际能力打下基础。

课堂教学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从根本上来说应归结于教学、使用教材的教师与学生这三方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大学英语》精读教程选材严谨，题材和体裁丰富多样，新颖有趣，语言规范，内涵深厚，既能帮助学生发展运用语言的技能，又能锻炼学生对事物进行观察、分析和判断的能力，有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创造力以及想象力。课文后面的大量练习又提供了强化记忆和运用语言的机会。教师面临的问题是：采用何种教学手段，才能使这套教材在使用过程中在学生身上产生最佳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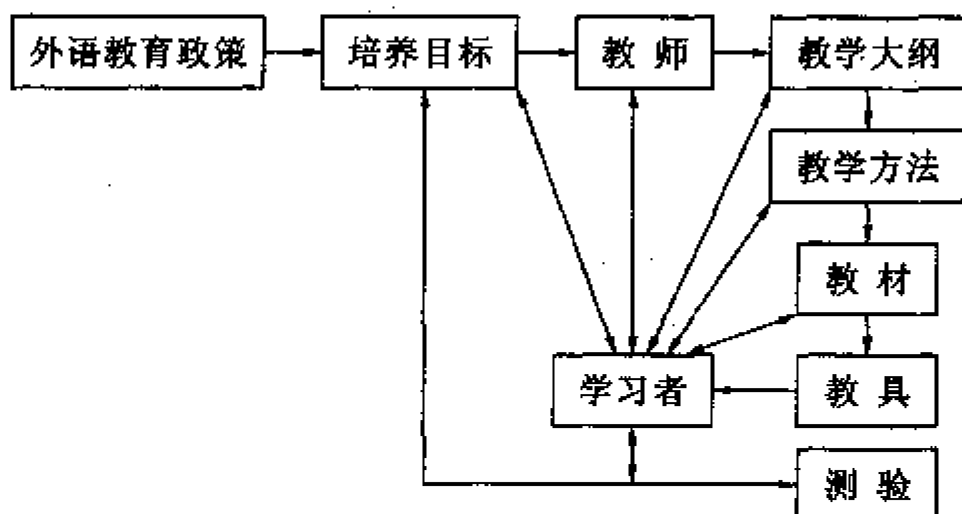


图1 （桂诗春，1984，p.220）

按照传统的教学手段，教师在课堂上要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解释词汇、语法项目及句子的表层结构，而学生只需静心地听课。这就产生了语言输出和输入的不平衡，阻碍了师生间的信息交流与感情

共享，限制了各种不同的现代外语教学法的尝试，不利于学生在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两方面同时发展。

著名应用语言学家桂诗春先生在《心理语言学》一书中提出了外语教学的复杂性，用图 1 表示了外语教学过程中诸因素的关系。他指出，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诸因素均要在学习者身上起作用。他在《应用语言学》中谈到："外语教学必须有明确目标，然后据此以确定学什么范围的外语，听、说、读、写、译有何要求，风格上又有何要求。培养目标越明确、越具体，组织外语教学的针对性就越强。"

二、课堂教学中的双向交流

《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制定了明确具体的培养目标。以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全面贯彻《大纲》中"教学活动不但要有利于语言能力的训练，也要有利于交际能力的培养"为目的，根据实际的班级规模(30～70 人)、教学时数、有限的教学辅助手段和设备，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有机地结合了各家教学法之"长"，以教材为中心，进行了精读课堂双向交流的尝试，来引导、组织并鼓励学生围绕教材进行创造性思维。师生间通过教材这一媒介，使教与学在"开放的、无威胁的环境中"达到最佳效果，帮助学生产生更大的学习动力。课堂教学中的双向交流的教学流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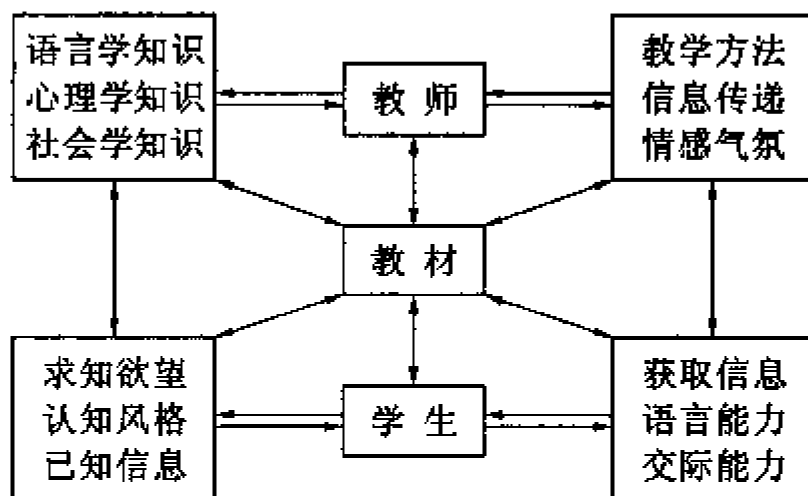


图 2

1. 信息交流

从图2中可看出，在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教与学双方通过教材开展各种活动，互相进行信息反馈。由于非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外语的主要途径是课堂，教师与教材是学生学习的唯一资源，甚至是唯一的语境与社会，因此教师就必须将几个不同领域里的许多信息组织应用到具体环境中。换句话说，教师应使用其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知识，针对学生反馈回的求知欲望即学习动机、目的、兴趣、积极性，认知风格即学习方法、接受能力；已知信息即母语水平、社会语言能力、原有语言知识等几方面的情况，确定教材的教法，三者潜在地互相适应，互相配合，创造出一种激发学生将课堂语言内容与现实生活经验联系起来的课堂环境。教师施教的风格、方法、技巧取决于对学习者学习方法的了解，也就是说，不能强求学生适应教学，而是要教学适应学生。

由于大学英语教学班级人数多，各专业课程科目多，学生时间紧，课后信息交流的余地相对较少，因此，开始教学之时，师生间的相互了解大多只能在课堂上进行，教学要根据教材内容和教学要求，围绕课文主题，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进行问答练习。通过一些简单有趣的对话，教师可从学生各具特色的回答中初步了解一些关于他们的发音状况、听力水平、语言组织能力、社会知识面、学习动机及母语知识等的情况，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回答，有意识地纠正他们组句、用词乃至发音中的错误，分析大学与中学的学习方法的不同之处，要求学生学会合理安排时间，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另外，教师要针对不同的学生灵活应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这是信息反馈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每次进行新单元教学前，先用简短的几句话或利用插图激活学生头脑中的相关知识，提出预习要求：① 通读全文，了解其主要思想、篇章结构、文体风格、作者意图。② 将文章分成几个部分，理出每部分的大致内容。③ 划出难理解的词句，在课堂上提出问题供讨论。④ 查词典，了解生词、派生词和搭配习惯，扩大词汇量。这样，学生在预习过程中就会将头脑中的已知信息及认知能力

充分用于对未知信息的理解中，教师也可以从学生对课文的预习程度上了解一些关于他们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和判断的能力以及运用语言的技巧，从而获得新的信息。同时，学生也能从教师的提问中得到某种启示，多少了解一些教师的教学风格，在相互了解、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建立向所有学习者提供平等机会的外语学习环境，保证下一步的双向交流更顺利地进行。

2. 认知交流

学生在精读课堂里不仅仅是为了获取某种信息，更重要的是将学习语言和从语言中获取知识相结合，提高语言交际能力。教师的职责是引导和促进学习，使学生学会学习，创建一个有利于学习的环境。在课堂教学中，师生间交流用得最多的是问答。教师应就文章的主题思想、表达方式，内容中的词汇意义、结构意义、语境意义、社会文化意义和语用意义等方面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

在开始学习一篇课文时，教师要改变在传统精读课上一开始就逐词逐句进行分析解释的这种"见木不见林"的做法，引导学生从总体上把握，顺着作者的思路，步步深入到每段内容乃至难句难词。根据这种"从整体到细节"的理解课文及言语交际的正常程序，帮助学生把新鲜材料与他们本人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从其已有的知识出发传授新的知识，以自己的个性思维方式和合适的话语对难句进行释义。同时，教师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难语言结构或与课文相关的社会知识问题，应适当地进行举一反三的语言点的操练。在教师有意识的语言知识输入转化为学生无意识的"吸入"的同时，提高学生语言理解能力和运用能力，培养学生独立的分析思考能力和积极主动的个性思维方式。

课堂教学途径有很多种，归纳起来为"既见木又见林"：即既要注意句子的功能结构，单词的搭配含义，句与句之间、段与段之间的上下文联系，也要注意整个语篇的结构主题、作者的写作意图、字里行间的深层意义。因此，无论采取"从木到林"还是"从林到木"的教学方法都是一种过程，也可以简单解释为教师的"输出"过程，是课堂上

对学生个性思维方式启发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可以看出，课堂设问不仅是为得到答案，而更是对知识的一种测试方法。当然学生最期望的是定义的一个方面，即根据课文的进展，老师提问，他们可按课文的内容对号入座，既正确又省事。这是需要的，但这仍属初级阶段的方式，不同的学生对同样问题回答将是千篇一律的，很难显示各人的个性。教师提问时不一定用问句而可以用陈述句，虽然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但至少句子要重新组织，表达方式各异，这样也能体现回答者的个性思维方式。这个问题更需要将语言结构与社会现象和自身经历相结合的个性思维转换成语言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表达出来。这样就进一步地完成了从语言能力到语言实践的过程。

上述步骤超过了对语言表层结构的理解。从“输入”方面看，它们包含了从“课文”到“行为”的距离：而从“输出”方面看，可以理顺上下文间的整体性、焦积点及衔接性的关系，极有利于启发学生的个性思维方式。

3. 情感交流

心理学中的人性理论非常重视情绪与感情，认为语言学习受两个因素影响：态度和自尊。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认知方式，可粗分为冲动型和思索性。前者活跃也敢讲，但不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词病句；而后者则不太愿意表露自己，容易引起教师的误解。这时两者的优点如果不被教师所发现，他们课堂交流的兴趣就会受到压抑。反之，只要教师对他们各自的认知方式充分尊重，鼓励冲动型学生在表达前稍加思索，鼓励思索型学生勇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就会受到极大的激励，自信心也会大大提高。这样，两种不同认知风格的学生就能在这种课堂气氛里取长补短，相互促进，这是“赞扬效应”在课堂教学的现实意义。教师必须时时注意到学生细微的优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把课堂英语学习当成一种负担，才能使课堂气氛活跃，有利双向交流顺畅。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唯一鼓励者，因此，情感气氛主要受教师影响。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如理解学生、关心学

生、帮助学生、尊重学生、公平对待学生、虚心想学生学习等，教师的个性，如耐心、幽默、热情、富于想象、富有人情味、友好、鼓动性，均会导致学生对教师的理解、尊重、信赖和对这门课的热爱，提高了学习积极性。同时，学生的情感共鸣也自然而然地影响着教师的施教风格和工作热情。

这种师生间的情感交流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新型师生关系；有利于形成和谐的课堂气氛；有利于相互合作和学习积极性的提高。每单元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后稍作数语中肯的评价，真诚地感谢学生的全面配合会激励学生对课堂教学中双向交流的更高的期望和更大的热情。

三、整体效应

课堂教学中的双向交流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促进其学习动力，增进其自信心，激发其智力，让学生克服困难、大胆实践，从而达到培养其个性表达能力目的。

转换生成语法理论认为，人类的脑子里有基本句型，也有转换规则，这种规则的作用就是把两个表面上看来不同而实际相同的句型的转换关系表达出来，因为在人类的脑子里这两个句型都归一类。由于人类的脑子里既有句型，也有转换规则，所以人类的语言能力不仅是说简单的句子和已经听过的句子，而是要通过大脑的分析精炼设计后造出新的句子。句子是无限的，人的思维能力也是无限的，如何以无限的思维能力将无限的句子精炼组合，在有限的时间里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是一天两天或做一、二次模拟考题能做到的，而是要通过多次甚至多年的训练才能达到这一境界。

课堂教学中的双向交流对个性思维方式的启发是为了培养个性表达能力。一般认为，语言交际能力包括三个方面：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目前学生的语法能力较强，社会语言能力可日积月累，而策略能力往往被忽略。通过各自的思维方式来调整信息是一种方法。“说其所能说而非其所欲说”，也就是说凭借已有的

语言知识和技能将要表达的意思简单化，灵活机动地跨越障碍，成功地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思。总之，课堂上师生交流、变换措辞、总结概要等活动能鼓励师生双方都明确学习中的难点要点并作出理智的决定、形成自我检校的习惯。学生不再是被动地等待教师灌输知识的"容器"，而是承担了更多责任的课堂教学的参与部分，这对于落实教学大纲，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交际水平具有眼前和长远双重效应。

参考文献

[1] Wilkins D A.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M]. Auckland: The Chaucer Press, 1987

[2] Lynch, T. Questioning Roles in the Classroom[J]. ELT Journal, July, 1991

[3] Zhu, Z. Theori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A], in Paper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June, 1984

[4] 桂诗春. 应用语言学[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5] 桂诗春. 心理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4

[6] 徐泳(译 Chery. L. Champeau de Lopez). 教师在当今语言课堂里的作用[J]. 国外外语教学，1990(2)

Two-way Communication in English Classroom Activities

Jiang Jin　Shi Huazhen

Abstract Two-way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the college English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listen, speak, read, write, and translat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roaches of communication in informa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Two-way communication on the college English students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in English classroom activities.

Key words classroom activities;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论大学英语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

姜 瑾

摘 要 高质量的大学英语教学需要高素质的英语教师，各高校应该重视对大学英语教师的综合素质培养。本文提出了大学英语教师所需的全面扎实的知识基础要点，探讨了如何获得精湛的英语教学实践技能，论述了该职业品格修养和人文素质的陶冶，并提出将科研与教学结合不断开拓创新的发展方向，得出了大学英语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有益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论。

关键词 大学英语教师，综合素质，科研，教学，开拓创新

一、引言

大学英语是各高校都开设的一门极其重要的必修基础课，教学面覆盖所有的系科和专业。在高校培养各层次与国际接轨的各类人才过程中，此课程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尤其在目前需要大量持双语的专业人员的社会里，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高低与学生未来的就业前景息息相关。而高素质的英语教师是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基本保证，因而，要在实际意义上真正提高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水平，培养出有实际应用能力、能将英语作为国际交流工具来吸取和传播新科学技术的各类专业人才，各高校应重视对大学英语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

由于外语教学的特殊性，一名理想的大学英语教师不仅应具有

一个普通教师和语言教师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素质，而且还应该具备有关跨文化交际和外语习得理论方面的知识，以及与其相关的个人品质。因此，大学英语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包括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教学业务及社会心理等综合素养和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使其高尚的品格与渊博的知识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对大学英语教师的培养途径可以从外部接受教育、培训和从内部教育培训并举，同时也应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加强自身社会文化素质的修养。

二、全面扎实的知识基础

一个大学英语教师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包括三种：第一种知识为英语语音、词汇、语义、语用等方面的知识，较高的听说读写能力及与之相关学科的知识，还包括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知识和目的语文化知识。保持和提高大学英语教师的英语语言熟练水平应该成为一个长期的主题，是大学英语教师发展的长期任务。英语语言熟练水平是指在实际生活中用目标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具有以标准为基础、以熟练为宗旨的语言技能，而该语言技能必须通过教师在教学实践或经常性的学习培训中不断巩固、提高和完善，大学英语教师语言技能的提高是教师发展的长期任务。一个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必须能够洞察两种不同文化的异同之处，有充分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能将学习语言的过程看成为接受和逐渐掌握该语言的民族文化系统的过程；对英语的专业知识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此他必须掌握相应的音系语法框架、词素词汇构成、语篇分析能力、逻辑修辞方法、翻译理论实践、课程大纲设计、语言测试构想等语言综合素质教育层面。相关学科知识有母语水平和对各种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基本知识初步的认识。教师的母语知识对学生的母语意识和外语接受影响很大，教师要充分利用母语中能导致正迁移的部分促进对英语学习的正迁移，必须对两种语言的结构和作用特点有较系统和深刻的认识。同时，大学英语教师必须不断地学习社会文化知识，包括了解与教学对象相关的文、

理、工、农、医的基础知识，这样才能在对各专业的学生的英语教学中不脱离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学语言示例才能贴近生活、形象生动、与学生的专业结合，使学生不但能学习更多的语言知识，也能通过语言学习新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使英语真正成为大学生进行国际科学技术交流的工具。

第二种是如何教英语的知识，包括教育学、教学法和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有关理论知识，循序渐进、阶段性和启发式等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以及二语习得理论等。教学的成功有赖于理论的正确指导，有赖于教师采用与实际相适应的教学手段，并根据特定学生群体具体情况发挥个人的创造性。教师应了解与外语教学有关的第一语言的功用，中介语变量，学习者个体差异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与学习者第二语言习得相关的外在因素，普遍性假设与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以及课堂教学对第二语言习得所起的作用等理论。只有在理论指导下的教学行为才属于职业性教育行为，才能提高课堂教师的职业自主性、权威性和责任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尽管授课是一种自觉的探索过程，但语言教学仍然被看作是一项在教学原则指导下解决问题的职业活动。大学英语教师必须采用分析批判的思维方式对传统的和新兴的外语教学法理论进行比较和评价，从而选出最有效的、最适合于现时教学群体的教学框架，同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大学英语教师应该为学生而知而会，需要有重点的、反思性的和连续性的教学方法培训和经常开展教学方法研讨会，在教学活动中共享教学兴趣与优势，共同设计和拓展职业目标和专业水平，分析学生行为与学习数据，并把它们作为推动教师共同帮助学生达到学习标准的媒介。电子通讯为现代化的教师网络提供了切实可行、灵活多样的交流手段，使教师可以在网络空间交流切磋，促进大学英语教师业务素质不断提高。

大学英语教师的教学技术能力必须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大学英语教学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近年来各高校的大量投资也为教师们共享这些资源提供了使用可能性。教学技术

和教学资源处于不断的变化发展中，能否跟上它们的发展决定了大学英语教师的业务是否能终身发展。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学会制作CAI课件，开发教学技能，熟悉教学软件和硬件，学会使用网络资源以及远程教学手段来丰富英语教学内容，使用互动性的软件增加英语学习兴趣，利用网上聊天、电子邮件、网上讨论等直接参与学生的英语课外教学活动。因此，大学英语教师能否掌握先进的教育技术也成为保证大学英语教师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种是对人类语言本质特征和特殊使用规律的知识，也就是语言文学基础知识。语言学的知识对语言教师有两大用处：一是使自己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人类语言的本质，提高自己的语言素养和语言使用能力；二是在语言教学活动中自觉地遵循语言习得和发展的规律，选择和使用符合语言使用规律的语言教学方法，能自觉利用语言学方面的知识指导外语教学实践。（赵艳芳，2001）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用学、及话语分析等语言学应用领域对大学英语教学均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和深层的研究开拓意义；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理论可促使大学英语教学中对语言语篇的解释向深度和广度拓展；跨文化交际理论可使大学英语教师确立课堂教学中更强烈的文化导入意识，使目标语的文化成为培养外语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使文化成为大学生除听、说、读、写外的第五种跨文化交际技能，使学生能通过英语语言实现对外国文化内在和外在的理解。总之，一个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必须是一个对该语言有较高的实际使用能力而又熟悉有关语言和语言使用理论的人。

三、精湛的课堂英语教学实践技能

除理论知识外，大学英语教师的英语表达技能，包括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对所教语言的知识、使用、文化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解释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忽视。教师也应该时刻把提高和完善自己的英语教学实践能力摆在重要的位置。教师课堂语言的质量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教师基本素质的缩影。由于缺少实际的英语

文化氛围，大部分的英语输入依靠语言课堂，教师的英语语言能力，尤其是课堂组织中使用语言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教师课堂教学的效果，因为他不仅是学生英语输入的一个重要提供者，而且是英语输入质量的控制者(赵艳芳，2001)，对教学活动和学生英语语言能力各方面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一名合格的大学英语教师应该语音准确、反应敏捷、口齿清晰、声音洪亮，善于用语调、表情和手势表达含义和情感，讲课热情饱满、风趣幽默、富于感染力，使学生乐于接受其输出的信息并进行反馈，在教学中做到信息与资源共享、语言的输入与输出平衡。

Harmer (1998)提出了良好有效语言课堂教学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投入(engage)、学习(study)和运用(activate)。投入是通过不同的活动和方法如讨论、游戏、音乐等引起学生对所学语言材料的兴趣，促使学生的参与；学习是通过联系和课堂活动，使学生掌握语音、语法、词汇、语篇结构、语言文化等语言知识；而运用则指通过练习和课堂活动如辩论、讨论、扮演角色等，使学生自由地、实际地运用语言。同时 Harmer 也介绍了由这三个基本要素的顺序变换和不同组合而设计的三种不同的课型，即：直线型(straight Arrow sequence)、反弹型(boomerang sequence) 和杂拼型(patchwork sequence)。直线型模式是教师首先激发学生兴趣，将其引入接受状态，然后学习有关内容，最后组织课堂活动，创造运用所学内容的机会；反弹型模式是教师先进行引入，然后直接进入运用阶段，教师再将运用活动中出现的语言错误和表达困难进行讲解，最后再进行练习；而杂拼型更为灵活，教师可根据所学内容和活动等将三要素交叉循环地运用到教学中。[2]上述语言教学三要素同样也适用于大学英语教学，教师可通过三者顺序的不断变化创造出多样的教学模式，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Hawley 等认为，教学有效的教师能利用五种互不相同又相互作用、且能引导学生学习注意力的行为来发挥作用。一是使学生进行有效的知识学习；二是奖励达到预期学习效果的学生；三是使学生

与教师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四是能传达并保持自己对所有学生行为的较高期望；五是利用切合任务的教学背景，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学习时间。(Richard,1990)教学实践可通过教学组织和教学实施能力的培养来不断完善。教学材料的设计大致归为开发、实践、应用。在具备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教学法方面的知识的前提下，教师应熟悉教学组织的步骤和基本的教学原则，针对学生的反馈目的、求知欲望(动机、目的、兴趣、积极性)、认知风格(学习方法、接受能力、活动能力)、已知信息(母语水平、社会知识)等方面的情况，创造出一种激发学生将课堂教学内容与现实生活经验联系起来的课堂环境；善于将语言材料的主题思想、表达手段、词汇意义、结构意义、环境文化意义和语用意义设计成不同的问题指导学生的交际活动；能运用传统的和现代化的教学辅助工具和手段如多媒体等进行教学。高效教学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多元化的提问技巧(如时机的掌握、难易问题的搭配等)，有多种答案的问题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意识，以灵活的方式提问并有效利用问题会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所教内容。“积极教学”包括课堂组织(有效组织、控制学生并顺利实施教学)、教学建构(目的明确、施教有序)、作业安排(包括次序妥当、用时适宜、能达目的、策略得当)(Richard,1990)，能避免在语言教学中把语言仅作为一种知识来传授的倾向，并注意培养学生在特定的语境下准确有效地运用语言的能力。课堂语言分心理的、人际的、教学法三个方面。心理以学生为中心。人际分为控制、组织、激发：组织指指令性计划语言，激发则指鼓励性语言。教学法又分为三部分：一是操作方式，它被教师的“指令”与学生的“行为”划为建构(设置问题)、中介(学生常识解决)、评估三阶段；二是相互作用模式，分为教师诱导与学生回答两部分；三是求知模式，口语练习与笔头练习时间安排及侧重内容，区分“信息结构”与“话语结构”，探索它们的关系以确定影响话语有效程度的因素。(Richard,1990)大学英语教师应提高意识，积累经验，有效地利用合作互动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开拓内心深处的学习动机，既要教规范的语言，又

要教不同情况下的语言使用方式，因此必须兼顾语言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可根据具体的情况，设计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语境为核心、以教材为文本的适时教学法，在对学生的语言教学和语言技能的培养过程中引导跨文化意识和实现自我价值，帮助学习者不仅熟练掌握语言技巧，而且成为新型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在一元文化的环境里从事外语教学，除较高的语言能力外，教师要经过专门化的外语教学培训，要有尽可能丰富的外语文化背景的知识，要懂得该把哪些内容带进课堂，要能与学生进行开放式对话，能推断出学生的感情和需要。因为评价学生在课堂上的文化适应水平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自己的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同时能承认并赞誉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他们必须拥有全身心的奉献精神，对学生高度的责任感，了解学生的个性，对学生有着高度期望，组织学生课堂上的积极参与，在语言教学的同时注意非语言学科知识的渗入。教师必须有能力组织引导学生参与丰富多彩社会交际形式的语言课堂和校园活动以弥补语言输入及输出的不足。

四、品格修养和人文素质的陶冶

Lange 提出了美国二语教师教育培养的七大原则，它们也适用于中国的大学英语教师培养目标。这七条原则分别为：教师的自择和选择是不间断的过程；教师在认知与经验上都能意识到该领域的知识、科学及艺术的发展过程；教师精通语言并感受到所教语言的文化背景；教师懂得如何帮助学生培养对所学语言的文化环境进行感受；教师通过实践检验第二语言教与学的进展以便在认知和情感方面去理解这些进展对学生的意义；师生共同努力以增进对语言教学的理解；师生关系能使师生双方了解彼此在开发第二语言教学方案中的需要和目标。(Harmer，1998)，教学是一种“艺术”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个人特点。

大学英语教学属于一种职业领域，课堂上教师的人文素质和言语行为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有很大的影响。较高的品格修养和令人

愉快的个人性格，谦虚好学、慷慨大方、幽默、耐心、宽容等都是一个优秀的大学英语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大学英语教师首先应具备的人文素质是高尚的情操，为基础教育作奉献的职业理想，对教育事业和学生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其次，大学英语教师也应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对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的许多方面有一定的了解，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提高充实自己，将新信息新知识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创造，使教学双方得益，这样，不仅能在教学上获得成功，而且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情感因素也是大学英语教师人文素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有的学生都希望成功，同时所有的学生都希望自己的努力和成功受到嘉奖，课堂上教师是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唯一鼓励者，对学生奖励的艺术是教师亲和力的体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受到教师情感的感染而发生与教师感情上的共鸣：当教师热爱所授学科并精神饱满、饶有兴趣地向学生传授知识时，必然引起学生对该学科的兴趣和热爱，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反之，学生对这一学科的热爱又促进教师积极地钻研教材，研究教学方法，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教师的情感品质是在师生互相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教师对每一个学生的理解、关心和爱护显著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在课堂上，教师应永远保持衣着整齐、端庄大方、精神焕发、乐观开朗、情感热烈，在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通过无言之教收到潜移默化人文素质提高的功效。课堂上教师的任何语言或体语都必须本着有利于教学、有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原则，以全面开展语言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

五、将科研与教学结合开拓创新

大学英语教师虽属教学型教师，但科学研究也是其工作的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科研大致可朝三个方向，基本上都与教学结合。在具备一定的语言学知识的基础上，了解语言的本质特征、特殊使用

规则、语言分析方法、最新的语言理论发展趋势，并掌握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使浅显易懂与抽象概括的策略并举，对外语习得和外语教学的特殊性有清楚的认识，尤其是要关注近年来有关错误分析、中介语研究和学习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语言学和教学理论指导下，以大量收集国内外教学法的资料信息为基础，教师可克服经费少、时间紧的困难，进行“自我研究”。通过观察研究他人的教学，在自己的课堂上系统地有目的地进行观察，甚至可以主动请别人来观摩自己的课堂，发现并解决问题，以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科研可采用微观方法和宏观方法：前者通过直接观察分析来研究教学，侧重对教师的具体行为即施教过程及教学结果的研究；而后者主要观察整个课堂的教与学，以弄清教师、学生、课堂任务是怎样影响学习的，侧重研究课堂行为的性质及意义，并对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归纳和概括。这两种教学研究方法的交叉结合可进行多项教学科研，如：设计问卷调查对教学情况进行分类统计后的量分析与质分析；进行教材教法的新型使用研究；正确处理语言基础知识传授和交际英语水平之间的矛盾与统一；加强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角色的合作与协调；增强教师人文素质对促进、开发学生智力因素及提高学习效率的影响作用；课堂上教师的权威性、学生的主动性、学习动机对教学效果的影响；保持语言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平衡；研究社会知识、心理因素在外语学习中的正负迁移作用；结合实际将传统的和新兴教学法进行对比较交叉使用研究等。这些研究项目对开发高校的教学理论及开拓创新教师教育原则均有助益。

除语言习得理论和教学法实践研究外，大学英语教师也可进行英语语言文学方面的研究。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等均可结合教学实践设立科研课题。认知语言学对大学英语教学颇具指导意义。在宏观上，可从学习者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过程着手，既研究教学的共性问题，又关注学习者的个性特点；既进行以普遍认知过程为重点的第二语言学习的研究，又分析第二语言学习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在微观上，可用此理论来支持词汇

教学、听力理解、语义拓展、语法分析、篇章结构、体裁文风等方面的教学细节研究。对文学作品研究分析和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能进一步提高大学英语教师的语言素质，陶冶情操，使其在语言教学中能博览取证，让东西方文化融会贯通，在知识与信息的海洋中游刃有余；在学生英语水平日益提高、教学质量要求日益严格、教学体制日益完善、社会对外语教学成果要求日益明显实际的时代里，永远处于专业和人文素质领先的地位。

在现代科学发展综合化、整体化的今天，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形成了多种多边缘交叉学科，大学英语教师可以英语为工具查阅最新资料，利用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资源结合所教学生的专业进行综合研究，如工学院的大学英语任课教师可开展计算机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法律专业的英语教师可进行司法语言学方向的探讨；医学院的英语教师可设立医患话语分析的课题；哲学系的英语教师可拓展语言哲学的纵横面等等。广博的知识和专业的理论加上实证调查使教师既扩大了知识面、充实了自我、开展了课题，又激发了其创新意识、找到新交叉点、发现新课题，还能在言传身教中使学生领略更多的创新意识、提出各种新设想，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进行语言、文化、哲学、社会、心理等方面的交叉联想。从国际科技发展的新潮流来看，这种综合交叉学科研究将会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和丰硕的科研成果，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于教于学于科研均有利，能真正做到科研教学一体化。

六、结论

以知识信息为基础的 21 世纪需要高质量的大学英语教师，他们是英语语言的施教者，是外国文化的导入者，也是各种合时的新教学法的科研者和开拓者，更是新教学理念的创导者和教育改革的促进者。教师职业将吸引一大批精英，教师行业的竞争也将会更加激烈，教师资格的标准将更严格。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是知识的提供者而不是储存者；他们必须准备着教学法和教学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变化交

替;终身学习应该是每个大学英语教师的发展理念,教学中的实验性、创新性、自主性和灵活性可导致不断的尝试、革新和创造,学校应允许教师负责作出影响课堂教学的职业决定。对大学英语教师培养必须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社会需要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高尚的人格修养、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和知识运用能力以及丰富的教育心理学知识和教学法知识的大学英语教师。大学英语教师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和业务的发展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生存质量,更可提高工作效率,使学生受益。总之,建设一支思想高尚、专业过硬、素质优秀的大学英语教师队伍是提高学生素质和未来科技建设者素质乃至未来社会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师应该活到老、教到老、学到老,时刻不能放松对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参考文献

[1] Ellis R.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2] Harmer J. *How to Teach English* [M]. London: Longman Ltditd, 1998

[3] Richard J C & Nunan D. *Second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 Skehan P.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5] Widdowson H G.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6] 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7]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On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

Jiang Jin

Abstract High quality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for non-English major university students requires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with high qualities in different aspects. They shoul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in the knowledge of English, linguistics, literature and pedagogy, and train themselves well with excellent skills in the arrangement of English classroom activities with respectable personality, devotion to the profession and love for the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combined with teaching improvement will b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ie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ers will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college English teacher;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ing; development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语言·社会·生态　　社会语言学动态应用研究
作者＝姜瑾著
页数＝２５１
ＳＳ号＝１１８７４４４３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１２

前言
目录
正文